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七）

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主 编

宋永毅

编 委

石之瑜 丁抒 周原

沈志佳 郭建 周泽浩 王友琴

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编委会 编纂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出版

2002

编制说明

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 编纂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制作及出版

主编：宋永毅

2002

编委分工

宋永毅（美国狄金森大学，主编；第一、三部分编辑并合作编辑第六、七部分）

石之瑜（台湾国立台湾大学，项目负责人，合作编辑第七部分）

丁 抒（美国诺曼学院，第四部分编辑）

周 原（美国芝加哥大学，第二部分编辑）

沈志佳（美国匹兹堡大学，第五部分编辑）

郭 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英文目录翻译）

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编辑第六部分）

本项目获下列学术机构和研究基金会的大力资助

特此鸣谢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mmittee, 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 P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Faculty Research Grant,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 Normandale Community College, Bloomington,
M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Committee, 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 PA

总导言

宋永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在中国当代史上，而且在整个世界史上也写下了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章。已故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诚如费正清所言，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与复杂性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值得世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China Wat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58）。

文革首先是一场历史悲剧。毛泽东和中共因为党内斗争而发动的所谓“革命”，使数以百万计无辜的中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又使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创巨伤重。此外，文革使知识贬值，文明扫地；还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明惨遭破坏。从这个角度，中国作家巴金早在1986年就发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的呼吁（《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166页）。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官方二十年来对这一呼吁一直噤若寒蝉，有意任其湮灭。在最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中国大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却成了巴金可能终生都无法实现的梦。

文革又出乎意料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整个政治和经济面貌。当毛泽东和中共把他们原来就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文革中推向灾难性的顶峰后，稍有良知的人不难认识到那套“主义”的疯狂和荒谬了。这也就是连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都终于被迫走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因之一。至于文革所激发的对所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怀疑和对大陆文革后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又更是有目共睹的史实。从这一角度，文革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深入持久的认真研究。

文革结束已经有近三十年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课题，海内外的文革研究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一方面是“说不尽的文革”，即文革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持久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到1996年三十年内，全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文革的著作，就达七千本（篇）（参见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Bibliographical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另一方面却是“被禁忌的文革”，即在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犯禁的独立研究课题。然而，大陆的学者和作家们仍以回忆录、报告文学等形式书写文革。但是，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文革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出版物可谓浩如烟海，但文革后中国图书馆中的许多这类收藏都无法自由查阅。另一方面，收藏在民间和海内外学者手中的不少可贵资源又因为缺少一个资料信息的共享工程，无法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由此，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进展。

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文革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七位学者和一位台湾学者于1998年组成《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的大力支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还成了合作单位。三年多来，编者们的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碟中的上万篇文献。

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文革后与文革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三千万字之巨，共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大部分。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文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

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文库光碟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

2001年12月

于美国狄金森大学

序言

余英时

宋永毅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费了整整四年的功夫，历经种种艰辛，编成了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部文库收集了一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接近三千万，真不愧为一项“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资料，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参加这项计划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先生在内，都是卓然有成的专才。他们各自在专业的岗位上，利用公余的时间，遍访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搜寻一切有关的文件。这一困苦的过程，只有“集腋成裘”的成语才能勉强形容其万一。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林（G.M. Trevelyan）有过一句名言：“去收集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吧！你一定要下至地狱，上至天堂，去把它们找回来。”（Collect the fa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无巧不成书，现在《文库》的八位编者竟在无意之间把这句名言实践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一任务上。宋永毅先生还真的下过一次地狱。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他为了收集资料，失去了几个月的自由，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国际事件。没有史料便根本不可能有史学，所以作为史学园地中的一个耕耘者，我必须在这里向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我细读了《文库》的全部目录之后，好像重温了几十年前的一场噩梦。第五部分的报刊社论是最熟悉的；这些文字当年是顺着发表的次序，一篇一篇读过的。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现在又整个地从记忆中陡然复苏了。我不过是文革的一个海外旁观者，情绪尚如此激荡，《文库》编者是曾经身历其境的人，他们在长期编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精神痛苦，更可想而知。这样看来，《文库》所收的一切文件决不能和一般所谓历史档案等量齐观，因为其中仍然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每一个文件的后面都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我们不难想象，当年每一个文件发布的前后，有多少活生生的个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体的摧残，更有多少本来很幸福的家庭顷刻之间变成“家破人亡”。研究《文库》中的文件，若不能接触到背后那些无数淹没在血河泪海中的生命，便不免空入宝山了。

宋永毅先生在〈总导言〉中指出了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即一方面是海外有“说不尽的文革”，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却是“被禁忌的文革”。1978年以后，中共官方事实上已完全否定了文革，我们只要一读《文库》第一部分有关中共文件最后十一年（1978—1988）的目录便已昭然若揭。但是在同一时期，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的规定。最明显的是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提醒全党维护毛主席形象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共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一方面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维护文革呢？答案并不难找：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班子都是被文革打倒的人，他们如果不否定文革，在党内便没有合法性了。但是文革的根源如果步步追究下去，到达其逻辑的终点，则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将成为问题了。“投鼠忌器”，这是中共不得不为文革研究设下许多限制

的根本原因。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之所以得不到官方的任何回响，是丝毫不奇怪的。

“被禁忌的文革”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怎样认识和研究文革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什么启示呢？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中共官方今天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便是有意误导我们的思路。文革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而且是革命暴力的最高阶段。但这既不是“意外”也不是“偏差”，而是革命暴力落在一个绝对独裁者掌握之中的必然结局。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有系统地进行消灭所谓“敌人”的运动，一波接着一波。正如俄国史名家派普思(Richard Pipes)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师法列宁、斯大林，而且也参考了希特勒的经验。（见，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 A. Kropf, 1993, p. 281.）列宁在建立政权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9月，正式采用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的统治方法。毛泽东一切照抄，也在1950年藉口“土改”和“镇反”，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红色恐怖”从此便笼罩着中国的大地，文革不过是最后一个高潮而已。《文库》第六部分收有红卫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鬼见愁——红色恐怖万岁”，恰好证实了文革是“红色恐怖”的必然发展。

我们衷心地欢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问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记录。但是研究文革首先必须具备历史的眼光（historical perspective）：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文库》的价值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2001年12月20日
于普林斯顿

七、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

宋永毅、石之瑜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主要是指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所谓“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程度上更有其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这些孳生流衍于民间的“异端思潮”与中共上层的权力，派别斗争并不相关，也区别与任何个人的反毛反体制的行动。如林彪追随者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篇公开和尖锐反毛的历史文献，但它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因为它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我们便另收入到文件类中。再如张志新，王申酉等文革中因反毛反体制而殉难的个人，在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中都曾名重一时。但因为他们先知先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文革中形成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也就不在这一文献汇编收录之列。简而言之，文革中的异端思潮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从而也代表了他们艰难却真实的觉醒程度的民间思潮。或许，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挞伐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这些异端思潮的代表作都表现出和文革中中共在各个阶段的统一思想和宣传口径的冲突抵触或大相径庭之处，有的更表现出了对现代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权的憧憬向往和宝贵探索。有的在运动刚开始便大胆地探索从国家体制上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还有的则第一次表达了为文革中在无规则的权力斗争与派别斗争中受政治迫害的千百万群众追求民主体制和法律保护的最高诉求。另外一些从“右”的方面抵制文革的异端思潮，更幻想着回归到文革前的十七年。

然而，人们总是在自身的历史条件和限制中认识世界。即便文革中最优秀的异端思潮的代表作，仍免不了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对外极端封闭，思想资源及其匮乏等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它们中的多数，基本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甚至仍幼稚地憧憬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所作的“乌托邦式”许诺（如“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的幻想。但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所有的异端思潮代表者们都冲破和正在冲破官方思想的藩篱，进行了勇敢的探索，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有的甚至还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仅此就非常值得我们编撰这一重要文献汇编了。

收集在这里的文献基本上来自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在流传中辗转抄录，难免以讹讹众多。因而这里的版本均由编者根据几种不同的版本重新校勘而成。这样，便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并难免与单一的常见版本有文字上的差异，在此也作一说明。

1966 年

炮轰……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李明清、赖锐锐、王晓东、李

洪瑞、刘福曾

1966.08.24

首先我们承认落后了，我们是8月18日被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我们没有能够勇敢地负起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的光荣职责，头脑中旧的规章、框框、章法多，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不但不如红卫兵小将们，也不如我院的兄弟战斗队的革命同志们！我们再不能被什么框框、清规戒律约束了，我们要造反，要造反，要造资本主义的反，要造一切资产阶级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本着对革命负责的精神，我们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某些领导单位存在的一系列做法和行为提出我们的异议。

为了能尽量了解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要提出炮轰……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一直说，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而且是由伟大领袖亲自领导的等等。但是对于派工作组这个问题却有同志说，毛主席六月份不在北京，不知道这件事情，责任完全由在京的中央常委来负。我们不禁要问：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2. 党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抓的不力、不全。可以说有偏心，据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北京为重点，而北京又据说以北大、清华为重点。陶铸同志、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负责联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薄一波同志、王光美同志负责联系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周总理也插入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经常到这两个学校做报告，了解一些情况，可以说对这些学校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也可以说就是他们在领导这两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是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和叶林为首的清华工作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犯了相当严重的方向、路线的错误，难道这些负责同志知道吗？知道又为什么不及时处理，予以纠正，对于文化大革命应负什么责任？薄一波同志还亲自参加了反蒯的大辩论。如果有人说蒯大富是真正的革命左派，那么薄一波同志又算什么派呢？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中央及文革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去北大、清华、人大、师大讲话，而对航院、矿院、地院、钢院等学校一次未来，我们是多么盼望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话，指导指导我们。在8月18日天安门城楼上我院红卫兵曾经口头上代表航院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请江青等同志来我院，江青同志也答应了，可是究竟来不来呢？还是一个疑问。我们要问，难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学生就不是生力军了，就不值得一提吗？

党中央某些同志就是有“偏心”，大大的“偏心”，老迷信什么“北大”、“清华”、“资格老”，革命传统好，革命干劲大，这本身就是一种修正主义的东西，如果不改变这种做法，我们就不同意！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注：八月二十四日贴）

给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

乔兼武 杜文革

1966. 08. 30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提出了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旧世界的汪洋中首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更把马列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天才地创造了现今改造世界的最强大最伟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它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在从旧世界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仍然大量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而且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还在产生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着修正主义思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艰巨卓越绝而又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意义的工作，还仅是开始，远没有结束。就我国的情况来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没有得到改造，还在沿用着这些腐朽的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上层建筑。因此，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应当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才一百余年，作为一种学说，是已经确立了，但是它还没有最后战胜它的顽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远没有砸烂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们国家现行的各种制度，从党政机关各种制度，到工农业生产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到商业、服务行业的各种营业制度，到教育界、新闻界、历史界、文艺界的各种制度，总之，包括一切现存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来批判、改造它们，要破字当头，在大破中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制度，以便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我们就提出三个破旧立新的大胆建议。

第一，取缔党团组织形式，代之以革命委员会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无产阶级以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动员组织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劳动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适用和必须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适用于以前的党团组织形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成了妨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旧的组织形式，应该立即取缔、改革，代之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由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式的群众性组织——革命委员会。

一、现行党团组织形式的罪状如下：

1.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应大搞特搞伟大的群众运动，但它们不利于搞群众运动，因而，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地发挥，智慧和力量得不到充分地运用。

2. 由于党组织领导政府，对党的各级组织，党外群众又无选举权，和各种特殊权利（象接受新党员的表决权等）因而实际上没有发动全民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全党在搞。

3. 由于他们不受群众监督，尤其是那些反党黑帮分子，肆意对抗党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瞒上欺下，往往以反党大帽子压人，因而，容易产生修正主义，便于他们搞阴谋，以篡党、篡军、篡政，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4. 它们疏远领导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妨碍领导与群众实行结合。因而，某些领导严重脱离群众，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当官作老爷，严重地产生官僚主义。

5. 它们不利于把毛泽东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不利于贯彻执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其他一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

6. 采取入党的方式鉴别别人、考验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科学的。思想意识的东西，不能只考验一年半载，而要锻炼一辈子、考验一辈子，采取入党的方式检[查]别人，就容易给投机分子以钻空子的机会。总之，这种组织形式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7.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沉痛的教训，使我们深思：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里的复辟与继续沿用党团组织不能是没有关系的。

8. 有些坏的党组织盗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利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把群众引入歧途，群众也往往上当，反映出保卫某某基层党组织就是保卫党中央。

二、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指导思想

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坚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它的最低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最高纲领：在全球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它的选举制：《十六条》第九条中的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制，人民才有选举权，敌人没有选举权。

它克服了党团组织所有弊病，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最好形式，是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高度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最好形式，是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针政策的最好组织形式。总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组织形式。

三、对把党团组织改革为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

1. 党中央一级不能改选，但要更名为中央革命委员会。毛主席任中央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林彪同志任副主席，由他们二人负责组成中央革命委员会，它原则上应以原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基础，只把那些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清除出去。

2. 军队各级党组织原则上也不改选，只要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适当地调配即可。

3.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可指派专人到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首先组成地区、省市、自治区两级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暂时代替这两级的原党组织的一切职权，并负责筹备成立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改革党、团组织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应立即动手作，这是由全国当前革命形势决定的。目前，各地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很多党组织不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对他们镇压、迫害，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现在全国阶级斗争形势是：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已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展开了大搏斗，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搏斗、大组合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伟大阶级斗争时代。代表反动势力一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凭借职权，占着优势，疯狂地向革命势力反扑。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资产阶级占优势的斗争形势，以使斗争利于无产阶级，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敌人越猖狂、越挣扎，就越临近灭亡，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就越临近更加伟大的新胜利。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透过貌似强大的表现现象，看到反动势力即将灭亡的纸老虎本质，狠狠地打击他们，把他们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新胜利，它将为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下可靠的基础。

第二、党政合一而为革命委员会

用党政两套组织形式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科学的，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与业务又是紧紧相联的，二者绝对不可分割，正象人体与精神不可分割，刀子和锋锐不可分割一样。这是毛泽东主义的精髓。

但是，资产阶级的党政两套组织形式，人为地使政治与业务分离，形成党组织是抓政治工作的，政府就是搞建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造成国家机构庞杂，浪费人力物力，搞繁琐哲学，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桎梏，因而应该立即废止，实行党政合一，由革

命委员会完全地担当起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任务。下设各种组织机构，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反对党政两套，而且臃肿庞大的政权组织和干部队伍。

第三、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

办公室的工作制度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制度，不是无产阶级的工作制度，而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制度，因为它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我们应该立即动手砸烂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办公室，到茅房草舍、田间地头、到工矿企业、到厂房宿舍、到军队驻地营房、到柜台边、到一切有群众的生产部门、单位、农村、工厂，把办公室牢牢地建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做既劳动又办公的人民勤务员。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一个坐在高级办公室的三脱离干部，一是听不到群众的呼声，看不到群众的一点情况，觉不出一点群众的阶级感情，不知道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二是高高在上，严重地脱离实际；三、脱离生产劳动的边。他们难道能够领导群众干社会主义？难道能领导好？他们难道能做群众的勤务员、一个普通劳动者？完全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领导只能是反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修正主义的领导，当官作老爷的领导，根据自己的意愿乱发号施令的领导，这样的领导必须彻底反掉，换上毛泽东主义的领导。办公室工作制度的罪状与党团组织一样，而且各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更要以十倍的干劲彻底捣烂它！

在办公室里是干不成革命的，只能当官作老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旦让他三脱离，他一天也呆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砸烂它！把脚跟站在人民一边，把办公室设立在群众中、实际中、生产劳动中，都变成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劳动者。

这个重大变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以上就是我们三项大胆的建议。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毛泽东主义的光辉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是毛泽东主义的红卫兵，是最高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我们就是应该造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主义，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旧东西的反，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用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一切！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最伟大、最光荣、最英明、最天才的旗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展眼观未来，定将是赤旗环球！誓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四旧”

北京大学东语系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乔兼武 杜文革

八月三十日

〔原注〕按贴出的大字报原文排印。乔兼武（原名乔俊礼）、杜文革（原名杜文忠）是东语系缅二学生。

原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编：《大字报选》（增刊六）1966年8月31日出版。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来我院检查

北京广播学院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险峰（们）

1966. 10. 12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同志亲临我院，亲自撤走了工作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的极大的关怀和支持。

但是你们在我院的某些事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十六条的。

一、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

你们解放了少数派同学，这是符合十六条的，但是同时，由于你们没有认真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却压制了多数派的革命师生。七月二十四日的会上，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夜里十二点，只让少数派控诉工作组。多数派的许多同学一再递条子要求发言，谈谈自己的看法，你们却不让发言，在此之前，你们也没有到多数派的革命师生中倾听他们的呼声。陈伯达同志还说：“有人说你们不要听一面意见，这个我们接受（实际上并没有化为行动）今天已来不及讲了，因为他们讲得很多了（那天会上没有代表多数派的意见的同学被允许发言，只有一个做检查的，不知“讲得很多”从何说起？难道因为过去大字报多，就能剥夺辩论会上的发言权吗？）这不算不公平吧？”江青，康生，陈伯达一开始就说要当小学生，来听大家的意见，可是实际上就这样把多数派的意见压下去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来我院指导，就有责任听各种意见的发言，今天没空，应该下次再来听。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再也没有来了。把多数意见置于不顾（即使是错误的，也要听，也要说服，这是毛主席交给你们的责任。）你们这样做，是相信群众的表现吗！是依靠群众的表现吗？是要当小学生吗？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中央文革小组对多数派意见的处理正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不是说服而是压服的。

毛主席说：“压而不服”。

全院有六百多名师生员工联合签名，要求中央文革重新下来检查，正是压而不服的结果。

这种正当的行动，合理的要求却被一些人污蔑为“对抗中央指示”。这种结果，中央文革小组应当承担责任。

正因为剥夺了多数人在二十四号会上的发言权，多数人的观点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并且没有好好倾听多数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说服多数，批判其中的错误，使大家有较统一的认识，以至于在这以后批判工作组的过程中又展开了越来越激

烈的辩论。加之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的会上（24号）一些事实没有澄清，因此这以后造成了同学之间，多数、少数之间越来越大的分裂。

对于这种结果，中央文革小组应当负担一定的责任。

二、包办代替，成立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临时文革会：

七月二十七日，关锋、姚文元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又亲临我院，会上，关锋同志说：“我们听到了广播学院同学的建议，（其实就是工作组在校时原系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等少数人的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这个会上原新闻系文革成员同学宣读了一些名单，在一阵掌声中就草草的通过了，这个临时文革一没酝酿，二没讨论，三没选举，完全是少数派中的某些人（基本上都是前工作组在校时的各系文革小组的负责人）“酝酿”、安排、指定了名单，趁中央首长在场的机会，宣读通过了，宣读名单以前，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当时十六条还没有出来，现在拿十六条这么光辉的镜子一照，这样的临时文革是根本违反十六条的，陈伯达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在政协礼堂接见西南等地岷革命师生讲话中指出：“不管学校单位，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凡是不符合不按照十六条的，由群众选举出来的无效，凡是指定的，后面有人操纵的，安排的，一律不算数，一律重选”我院临时文革究竟有没有权利来领导，不是很清楚了吗！

我院由中央文革小组包办代替的不符合十六条的临时文革产生以后，起初发了几个革命的公告，还是得到广大的革命师生的支持的。然而他们重蹈工作组的覆辙，利用权利，以少数压制“七·五”事件中受工作组蒙蔽给他们贴大字报的多数，把矛头对准同学，打击报复，要揪右派，要揪某某班党支部等等，由脱离群众的产生出来，沿着压制群众的道路发展下去，谁给他们提意见，提批评，他们就打出“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扶持”的招牌吓人，把提批评的，不满他们领导的打成“扼杀新生事物”、“对抗中央指示”。几百人要撤换其中不称职的委员，他们拒不讨论，不理睬群众的正当要求。陈伯达同志曾指示过：“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不称职。可以罢免再换”。又说：“成立了新的组织，你们的作风要改变，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是国民党的作风，不应是盯梢的办法，不应是专政的办法，对广大革命师生实行专政的办法应该废除。”

可是临时文革中的某些人，把中央文革小组正确的意见丢在脑后，口口声声以“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扶植的”来招摇撞骗，这都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的恶果！

我们要质问中央文革小组，你们七月二十七日来我院包办代替，关锋同志亲口同意成立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临时文革”压根就没有和群众商量，没讨论没酝酿，没选举，只是在个别系文革小组负责人那里“酝酿”了一下，就那出了名单，你们这叫走什么路线？你们这样符合十六条吗？符合陈伯达同志七月二十四号讲话精神吗？你们如果“扶植”这样的临时文革，你们就错了，你们就是违背十六条，违背毛泽东思想！

临时文革的产生本身就是违背十六条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的一个表现。中央文革小组包办代替或叫“扶植”就是受这条路线的影响，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走少数人的冷冷清清的“上层”路线！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对此事作出检查。

中央文革小组必须对我院当前的分裂局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后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造了这个临时文革的反，自觉自愿，充分酝酿，投票选举。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正是学习了十六条，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的结果，这个反造对了！

广播学院的主人是我们，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搞好我院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织由我们自己选！我们的革命由我们自己搞！谁也不能包办代替！是毛主席给我们这个权利！一切坚定不移，不折不扣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同志也决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包办代替！

三、就事论事，命令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貌，（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的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件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就没有不跌跤子的。”

工作组犯方向路线错误，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因，许多情况，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从中央就下来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提到工作组时说中央也有责任。谢富治同志说自己去了工作组也肯定要犯错误，责任大小是小事，这样一来就使大家认识到工作组的实质，也就更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到我院工作组，从运动初期的右倾以至发展到七·五事件中打击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当中就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从中央李雪峰、北京新市委一直贯彻下来，再加国务院，北京市委接待站所受反动路线的相互影响，工作组犯错误是必然的。工作组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对我院工作组的处理都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上，提到阶级斗争的规律的纲上来认识，只是就五·七事件，就“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把工作组批了一通，以至广大同学和教师对突然撤掉工作组还不知道“为什么？”以至后来批工作组总提不上纲，纠缠在某些人身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当时对工作组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上纲，批判不深刻，事后又没来“考察”，无形中画了一个框框，使同学之间也产生就事论事，在某一问题上某一事实上纠缠不休，由意见分歧发展到分裂的原因之一，直到现在，许多人对工作组的认识才开始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

中央文革小组来临我院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无比关怀和鼓舞。但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作过程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给我院文革大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一些损失和波折、中央文革小组对我院当前的情况必须担负一定的责任！

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同志，能百忙中来临我院，对我院文化大革命作出指示。并对工作组以前在我院工作时凡是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作出检查，肃清其恶劣影响。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十六条。”

《红旗》杂志十一期社论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毛主席鼓励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同志们，中央文革小组在我院做出的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十六条的事情必须批判，这种已经障碍到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必须肃清。符合十六条的，我们坚决拥护，违反十六条的，我们坚决反对，要坚决肃清，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概要）

北京师范大学 李文博

1966. 10. 17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批、改”。这里的“改”是指革新社会主义制度，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触及人们的灵魂，形成一场大张旗鼓的思想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创造了使地主阶级不能继续存在，也不能产生的条件的一种制度，无产阶级则要创造一个使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一种新制度。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来的组织形式，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仍然是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条件。这种组织形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领导机构从形式上与旧社会资产阶级专政机器是一样的。这种机构是官僚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温床、社会基础。……

由于领导机关仍然沿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方式（或者经过了某种改组），因此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在社会思想下进行的。

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马克思说：公社虽然被搞垮了，但它的原则是永存的。在无产阶级实现公社原则之前，它将一直大喊大叫。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

共产主义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了，让我们高举双手迎接它吧！

中学生问中央文革

——就中学两条路线问题

北京铁道学院附中红后代 铁血纵队

1966. 11. 00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最高统帅把文化大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

我们的革命后代要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最努力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自十三期社论发表以来，从社会上到学校，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到如今已经历时两个多月了，我们心里有话，不能不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中学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讲给中央文革小组听。

一、简单化、扩大化：我们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肃清它的遗毒和影响，彻底批判它的立场问题，掀起一场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但是，在中学里，某些组织，某些人，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行个人怨恨主义大暴露之实，对要革命的同志，要革命的组织，大搞突然袭击，进行人身攻击，采取谩骂、恐吓、讽刺、挖苦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已经把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称作革命的一方，称作始终一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一方，而把另一方当做批判对象，把无原则纠纷不负责任地上升为所谓原则分歧。重新制造和加深了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挑起大规模的整人整群众，来转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甚至有些学校发生了武斗，也有学校批判运动夭折了。

十三期社论，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人马上把一方看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把犯错误也说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这样一场严肃的斗争，已经被学校里的某些人简单化，扩大化了。

中学的运动，在这阶段，一直无人问津。中央文革对这样的现象，难道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

二、中央文革小组深入群众不够，自展览馆会议以后（10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运动是不够深入群众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经常在上边发议论，对一方是表示坚决的支持，看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对另一方表示不满意，以至形成比过去更加规模的一派压另一派的情况，更有些人把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的讲话，捧作圣书经典，大力翻印和学习，这些人一遇到什么事情，便说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是怎么说的。自7月28日后中学生对毛主席著作没有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有些同志根本就不学。十六条也没有深入学，运用的也不好。

十六条说得很明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决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的讲话，已经束缚了一部分人的思想，阻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

总之，一句话，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

我们殷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群众中走一走，听一听，“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到运动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

三、关于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工作组撤走后，前一个阶段，学生自己领导自己，对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运动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但是，自从毛主席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学应当怎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未走向正轨，而且社会上也流传着什么学校革委会和最先成立的红卫兵搞斗批改，只所谓的斗批改，是所谓的大方向正确。至使一些人以此为理，死死抓住工作组不放，而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感兴趣，对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无人过问，有些人甚至为他们喊冤叫屈，使他们坐山观虎斗、幸灾乐祸。有些牛鬼蛇神也蠢蠢欲动，想乘此机会为自己大翻其案。而革命小将的一些作法，却被另一方批判得一无是处。

这些小将看到这种作法是很难过、很痛心，他们提醒学校的斗批改能不能进行到底。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深入调查，对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怎样进行斗批改问题明确表态，指明方向。

四、中央文革小组指导不够：在这场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革命小将是没有经验的，我们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坚决跟着毛主席学会做路线斗争，但是，我们感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在按毛主席思想统一方面引导不够，（如：没有发表有关指导性社论，以致更加深了两派不和）使本来一大批敢想、敢闯、敢干、敢革命的革命小将热情挫伤很大。有的革命小将对党的阶级政策掌握不够，阶段路线调子唱得高了一些，如今也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一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在这些小将面前指责，说他们的作法是形“左”实右等等。使他们很不好说话，很被动，迫切希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加以正确引导。

我们认为这些批判的对象，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大部分是出身工、农，革干、革军、革烈的在校的学生，难道他们都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难道这些最先起来造反、同阶级敌人有着刻骨仇恨的小将们，会在革委会里制造所谓斗批改吗？大多数的干部子弟是要革命的，他们同党同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在旧社会里我们的父母受尽了鞭打和饥饿，万恶的地主和资本家吮吸着他们的血汗。他们起来反抗了！他们跟着毛主席造旧世界的反了！他们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出入枪林弹雨，用对人民的忠诚和鲜血打天下！我们一想起这些，一股子承父志的烈火燃满了胸膛，一想起这些，我们就无限感激毛主席，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

难道他们的孩子会忘掉这一切吗？会背叛党的事业吗？

不能！不能！绝不能！

我们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的一代，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第一次起来干革命，难免犯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有勇气正视，有勇气改正，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硬把我们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我们革命后代一定要做狂风怒号中挺立不拔的青松，要做惊涛骇浪中盘盘的石山，来源于对您无限忠诚的革命坚定性，就是革命后代在复杂的艰苦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可靠保证。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告诉我们：“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主席又说：“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我们最热烈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到中学去了解情况。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1966. 11. 15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

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到：

“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副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

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涤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

1966. 11. 25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 ×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在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现了一片空前未有的大好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但对运动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最近以来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感到很不理解，很不明白，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本着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一些问题：

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牢记心间。许多中央首长，像林副主席、周总理、叶剑英副主席、陈毅副主席等在接见革命师生时，总是讲主席英明、伟大、正确，讲主席怎样教导，讲自己跟不上主席思想，每次开会都不忘学习主席语录，而中央文革小组一些同志也经常接见革命师生，也经常讲话，但他们中的一些讲话很少引用主席语录，很少说主席的英明领导，很少提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经常听到是：我说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支持你们；不然的话，我就怎样怎样；我要你们做甚么甚么……为什么处处突出这个“我”字呢？

二、前一阶段由于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造成了白色恐怖。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一局面。而最近又有一些人采取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些人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保皇”，“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全国通牒，四处捉拿，封街道，查火车，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其名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质难道不是更大的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吗？更大的对立情绪不是正在形成吗？这一切究竟是由何方引起的呢？是谁在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而是偏听偏信呢？就拿我们北航来说，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就只听“红旗”战斗队一方面的意见，根本不听红卫兵一方的意见呢？为什么有些情况《红旗》反映得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中央文革小组也完全相信，根本不下来调查一下呢？例如：十月中旬，我院红卫兵赤卫队及林学院等其他一些院校的红卫兵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反映情况，等了十一天十一夜，中央文革小组也

不接见，最后还是总理出来接见的。而我院《红旗》反映情况确为什么很快到达中央文革小组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群众之上，而是深入於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於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即使我们的红卫兵有些地方不对，难道就应该采取不理不睬冷淡的态度吗？

四、中学革命小将在文化革命中，遵循主席教导，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他们最先掀起了社会上的扫四旧，是他们最先成立了红卫兵，是他们首先批判揭发工作组；是他们首先打破了校与校之间的界限，搞起了大串联；是他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很多好的倡议……在中学小将们大干特干，大闹特闹之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你们支持了没有？你们鼓励了没有？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个承认红卫兵，支持红卫兵，赞成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中学小将）当运动中中学小将在一些具体作法上出现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时，有些人藉此大骂小将们是“保皇派”，“镇压革命的工具”，“刽子手”“等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么不出来支持革命小将，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更高地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励他们更好地干革命？甚至还听说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同志也骂中学小将是“大棒子”“宪兵队”，并建议在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解散，这是甚么原因呢？

五、十一月八日有一些军事院校的学生及北航红旗部分战士冲入国防部一事引起了军委的重视，於是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军委召开在京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当时周总理，陶铸同志，军委四位副主席及许多军队首长都出席了大会，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参加？还有些人冲进国务院，中南海，直接威胁到主席安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为什么对此事不表示态度？而是由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等副总理出面表态？

可能有些人读了我们的文章后，会大骂我们是炮轰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说，绝不是这个目的，我们的确有许多问题不明白不理解，心里有话，不能不讲，说出来总比闷在肚里强。讲对了很好，讲错了。我们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们是在所不惜的！

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二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 1966. 11. 29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 ×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贴出了《一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在这个大字报中，我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几个问题。现在我们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几个我们所不理解不明白的问题，不对之处，热情地欢迎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革命群众批评指正。

一、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十月八日第二司令部和第一司令部的部分院校在北京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一个同志参加。同样都是红卫兵，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对第三司令部特别重视呢？而对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如此冷淡呢？难道只有第三司令部才有资格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林付主席说过：“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为什么不支持第一司令部还第二司令部的红卫兵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呢？为什么不相信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的几万红卫兵也是要革命的，也是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为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呢？

二、中央曾一再指示，对所有的革命组织都要一视同仁，那么为什么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对红卫兵却不一视同仁呢？为什么对航院《红旗》更是特别宠爱，多次单独接见他们呢？如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单独接见《红旗》，有些其他战斗队的人要求进场时却被拒之门外，而且会议一律不许作记录，一律不准外传，如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方针政策，为什么不敢拿出来交给群众，为什么害怕与群众见面呢？在我院《红旗》战斗队也没有联络员，有问题随时都可以找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小组有指示随时召见《红旗》战斗队，而其他一些战斗队尤其被人称为多数派的战斗队却往往等好几天也见不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难道就只有《红旗》是革命组织是左派吗？而我院其他战斗队和其他院校的许多战斗队就不是革命组织，就没有左派吗？

三、大连海运学院打响了红卫兵长征的头一炮。这是红卫兵熟悉社会了解群众进行艰苦锻炼的伟大创举，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当你们听到大连海运学院长征队的消息后。你们的态度是怎样呢？你们支持了吗？你们鼓励了吗？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首先发

现了这种新生事物，支持红卫兵去长征，首先鼓励红卫兵到社会实践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四、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后，有一些人不相信毛主席会支持长征，甚至认为鼓励长征是阴谋。於是就到陶铸那里去讯问，陶铸同志告诉他们主席是很支持长征，周总理也认为这篇社论讲的不错，他们仍不相信，却指名要求戚本禹同志接见。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陶铸同志而相信戚本禹同志？为什么呢？

五、由于前一段实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了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领导下很快认清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然而有一些人现在还揪着工作组不放，不断叫他们写检查，还有叫他们劳改……难道广大工作组的同志就不愿意革命吗？难道这部分同志就不愿意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为什么不把他们解放出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那么对于目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表示了甚么态度？难道还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吗？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时时处处都是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要认真地相信群众，真正的依靠群众，真正的放手发动群众，相信95%以上的群众是要革命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错误的！

最后让我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

“共产党员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

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林学院红卫兵长征战斗队

1966. 12. 01

我们认为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非找中央文革小组不可。对中央首长的讲话大量翻印，有时搞得出入很大。许多人光中央首长讲话就有好几册，整天看中央首长讲话，这样就不能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对群众自己的独立思考，自己解放自己是很不利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就必须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发挥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再次，首长讲话是根据某一部分人，某一具体情况讲的。但有人不问当时情况如何，不管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就大量翻印，按此照办，有时出入较大。结果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起了包办代替的作用。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

为此，我们认为：

1. 中央文革小组变成一个联络站的形式，应深入基层了解运动的情况，听取人家的反映，不要下框框，定调子，让群众在大革命运动中自己辨别是非，分清敌我，提高认识。

2. 要及时出社论，指导群众深入学习毛著，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为，这样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可靠的接班人。

我们的意见，提供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考虑。

外地革命师生同李洪山辩论整理的会议纪要

（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初“五湖四海红色造反总部”、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等单位的部分师生）

1966. 12. 01

按语

11月30日中午，原北京林学院红卫兵群众参谋部负责人李洪山在红卫战斗兵团负责人赵全来的协助下，在林院职工食堂门前的大字报栏上贴了一张“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巨幅标语。我们将与李洪山辩论的会议纪要整理如下：请同志们耐心地阅读，并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批判李洪山的言论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李洪山的“讲话”与谭力夫的发言同样是株大毒草。对于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同志在10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了，这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样的文章，从中吸取点‘油水’（菜油、花生油）。脑子里有了‘油水’就可以跟他辩，把他驳倒。你们不把谭力夫的讲话驳倒，你们还搞甚么革命”？

时间：1966年12月1日 上午九点

地址：杭大楼414室

参加者：

除李洪山外，有福建师范学院、浙江绍兴一初“五湖四海红色造反总部”、黑龙江双城县杏山中学、黑龙江省佳木斯手工（业）中等学校、林院林业系捍批队等单位的部分师生、林院部分工人参加了辩论会。

问：“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这一口号提出的理由是甚么？

李反问：“你们的看法如何？”

众：“我们的观点是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问：“写这幅标语的经过怎样？思想的指导是甚么？”

李反问：“你们为甚么说这幅标语反动呢？”

众：“我们要你说。”

李：“那我就说：先读几条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凡事要动脑筋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写这幅标语其理由有三：

（1）（先念十六条中的第九条，念到桥梁时说）中央文革小组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起桥梁作用的。虽然是权力机关但是不能领导，不管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都是经过群众全面选举的，像巴黎公社那样。毛主席制定的十六条中，并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不要经过群众选举。中央文革小组也是一样，说它是合法，没有理由，说它不合法，它还存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没经选举产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不管是谁指定的，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踢开。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可以包办代替。

（2）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面，不调查，都是蹲在北京，不到外地。陈伯达讲话“林院我现在还没有去过，以后有时间去”。到现在还没来一次。北大、清华倒是去过。小组的人不少，正组长、副组长从来不来蹲点，即是中央文革小组

为什么完全在北京。新疆、哈尔滨、广州也没有中央文革小组一个人。都是群众自己搞。毛主席说：“谁不到群众中来，就不能当领导。”毛主席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夸夸其谈，乱发议论。见到中央首长讲话就抢得要命，视为珍宝。现在已有八册不学十六条，不看最高指示，连十六条中指出的六篇文章谁学到了？有几个人看？恐怕有人现在还没学过。若看首长讲话，没有时间看最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不行，他还得当小学生，不能当领导。他只能当小学生，不能当先生。副统帅林彪同志讲，要好好听听最高统帅的话。中国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任何事物都要怀疑，怀疑一切。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的讲话都要用最高指示去分析。甚么东西都要怀疑。现在一事一物划框框，特别最近北大辩论会一开始就定调子，这就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辩论一天聂元梓就烦了，群众不干又辩论一周。变来辩去，终归还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现在北大聂元梓搞得四分五裂，有新北大红卫兵、北大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造成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总之，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谋。

（3）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十三期社论以后，北京掀起了高潮，两派是比较和睦的。如林院东方红找我们，我们也找东方红商量。但时间不长，只有三次。十月六日第三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江青说：‘要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从此两派就分开了。到今天有两个月了，仍然是分裂。追根追到中央文革小组，到11月27日有些人还是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多数派、少数派。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个月以后，还是这样。陈伯达讲话要冲垮修正主义红卫兵，这样的传单满天飞。北京这样，全国也是这样。为什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有那么多的修正主义红卫兵？现在是大民主，所以我才写这幅革命的标语。有甚么不合法的？！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我们有自由言论的权力。要在前三年，我写了就不在这里呆了。我写的都是革命的大字报、革命的标语。即使是右派，也要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呢。

另外，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谭力夫。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讲是一株大毒草。我说是革命的演说，基本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说：‘毛主席批示大量印发’（众追问）是听联络站说的，你去调查。谭力夫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是革干子弟，中共预备党员，北工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一个（复）杂的文革小组。《红旗》十三期社论後，哪个组织，哪个学校，如果不太广播批判谭力夫的，就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学校都一致，这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说：‘现在还没有把谭力夫打成反革命。’现在没有，将来没有。批判谭力夫讲话，是群众斗群众。发动了95%以上的学生来批一个普通学生，这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向群众斗群众。即使是右派现在也不能批判，要放到後期去处理。根据这三点已完全可以踢开。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全都下来。这样的文革小组不踢开行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要下来，他没有全面调查，他没有去过哈尔滨、新疆、广州（念毛主席语录）到群众中去调查……”

众问：“毛主席能不能到全国各地去呢？”

李答：“这个问题於那三点无关，我不回答。谭力夫的讲话我认为是革命的演说，不能批判。”

众问：“为什么？”

李答：“因为（A）用阶级观点分析，（B）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C）激起了群众敢想敢干的精神，基本上是符合毛主席阶级观点的。”

众问：“错在那里？”

李答：“讲阶级路线有些偏激。”

众问：“谭力夫讲主席廿年代讲的，你拿到六十年代来硬套那怎么行？这话对吗？”

李答：“这话是对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反对硬套谭力夫主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念林彪讲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

有人问：“那么你认为谭力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了？”

李答：“基本上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批判谭力夫的讲话是群众斗群众。批判谭力夫更是群众斗群众。”

看，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甚么路线？

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等

1966. 12. 02

最高指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甚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 × ×

毛主席亲自提出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但是从今年六月以来，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却是曲折地发展的。

六月一日，我们伟大的统帅批准广播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似如一颗特大的原子弹，在北京，在全国立刻爆炸，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中央，北京新市委某些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许多多的革命闯将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等等。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被熄灭了。

在这个时期，即从六月二日以来到七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扭转方向。直到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到北京，才把运动的方向纠正了。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说一不二。他们到处参加斗争、批判、辩论会。还给做些指示。在人们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的讲话比最高指示还重要似的，视如珍宝，到处传抄。指导运动。有些同志给群众定框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如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在北大广大师生员工批判张承先的工作组的大会上就给定下了调子，说张承先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扼杀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小将的首创精神。由此，目前北大师生员工四分五裂。若问一个同学：你们北大有多少红卫兵组织？他会说，“多极了！”“数不过来！”在北大至今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从十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后，北京市立刻又出现了一派沸腾的新气象，群众运动的高潮又来临了。可是时间不长。在十月六日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讲了话。从这天後，在北京市，在全国又搞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新形式。“修正主义的红卫兵”、“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等等口号满天飞。从此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并非全体同志）打着“掌握原则，掌握策略，懂得策略”的旗号搞关门主义，执行“左”倾路线，把运动又引向了邪路。

从十月三日至今已两个月。这两个月仍然是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却至今不觉悟。在十一月廿八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还讲：“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甚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混淆了矛盾性质，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左”倾路线最严重的事例：把一个青年学生提出的基本上是革命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成实际上是剥削阶级的血统论，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阶级分析相对抗的，而却忘记了目前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某个问题，在一定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只看表面，不看本质，抓其一点，不及其馀。对“谭力夫的发言”这一革命的发言，视为“大毒草”，“修正主义的”，“形左实右得很”等。有组织、有目的挑动一大部分群众（几乎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去批判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发言（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红卫兵）还说甚么“批判得好！”“应该批判！”“批判他的讲话又不是批判他这个人，又不让他弯腰带高帽子。”等等。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掀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的高潮给打了下去。

敬爱的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敬请您对此调查，尽快地拨正航向吧！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前进！我们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保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管它是以右倾出现，还是以两面派出现，还是以“左”倾形式冒出来，我们坚决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它批倒、批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坚决认真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发扬干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积极响应您的：“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鲜红鲜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赤化世界而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于生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 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战斗队
《永向党》战斗队
《永向东》战斗队
红卫兵《永向党》小组

《革命到底》战斗队
《好得很》战斗队
1966. 12. 2

三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 1966. 12. 02

毛主席语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来，我们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二份大字报，“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我们继续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动手下，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磅礴於全中国，震撼了整个世界。但是前一阶段由于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运动走了一段弯路，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及时扭转了这一局面。运动本应当更健康、更迅速地向前发展，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一、如果运动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正常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广大的革命青少年和革命群众是应该而且能够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步步深入，逐渐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周围，向同一目标共同奋斗的。但是为什么现阶段运动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呢？为什么群众之间的隔阂不是在逐渐地消除，而是在逐步地加深，对立情绪逐渐严重呢？

二、一些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曾被压制的人，今天翻过身来，本来应该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但他们却反过来去压另一部分同志，并且搞得与前一阶段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谁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呢？

三、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因此在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中都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多数派”和“少数派”大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难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多数派”提出来的吗？不是！是当时在北京的某些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来的。难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少数派”们发起的吗？也不是，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发起的。既然如此，那么是谁把“少数派”定为“左派”，把“多数派”打成“保皇派”，修正主义的呢？为什么允许“少数派”中某些人藉批判资产阶级之名去斗争“多数派”呢？现阶段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不正是由此而引起的吗？这难道执行的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个责任究竟要谁来负呢？

四、十六条明确指出：“在目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於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区别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反正只要是“当权派”就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轰”，来“烧”，来“打”。十六条中早已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但目前却如何体现呢？那还有甚么好的和比较好的呢？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这样的作法难道是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吗？符合十六条吗？你们对这种作法表示了甚么态度呢？是大力支持了呢？还是坚决反对了呢？

相反，以彭、罗、陆、杨为首的百分之几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逍遥法外，躲在一边，舒舒服服，就是混在我们的好干部中企图混水摸鱼蒙混过关。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像目前这样既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也不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的方法，能分出哪些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哪些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这样的方向和方法对头吗？

五、目前相当一部分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根本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发表，一顶顶大帽子就连续不断地扣上来。他们根本不能写大字报，一写出来就篇篇被骂成“大毒草”。这种人的处境与工作组在时被压制的那些人的处境又有甚么区别呢？还有一部分人整天无事可干，东游游，西逛逛，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根本不参加运动，目前这种人在日益增多，这种现象是由甚么原因引起的呢？这样一些现象难道还不普遍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吗？你们认为这种现象好吗？你们采取了甚么措施呢？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的运动不是健康地，深入地向前发展，而是在停止不前，很难进行下去的危险。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你们做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应该负多大责任呢？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祇能有二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不站在这条路线上，就必然站在那条路线上。凡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就一定能够使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就必然导致运动停止不前，或走弯路。那么，中央文革的某些同志们你们是站在哪一条路线上呢？你们贯彻执行的是哪一条路线呢？

最 后再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

清华939战斗小组翻印

1966.12.7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 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北京林学院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等

1966. 12. 02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在这里十六条没有说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况且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坐在上边不广泛深入下层，不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到处游说，发议论，作指示。他们的讲话不管对与否，到处传抄翻印，拿到手里视为珍宝，去指导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主要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

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拿了律己已害了自己，拿了鲛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所以象今天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儿行呢？不解散哪儿行呢？目前它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

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把它搬开，自己起来闹革命，紧紧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猛前进。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 《一·二九》战斗队、《永向党》战斗队
红卫战斗兵团 《永向东》战斗队、《革命到底》战斗队
红卫兵 《永向党》战斗队、《好的很》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原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第四期（一九六七年一月）

也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野战兵团

1966. 12. 02

前言

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贴出一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后，立刻跳出一些人，破口大骂：“混蛋”“王八蛋”“一小撮顽固保皇派”……“你们胆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刹那间，大帽小帽、大罪小罪一起堆上来，看来这些平时口口声声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并未认清反动路线的所在。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就应该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受批评呢？为什么别人刚提出几个“问号”，就立即打来一个“惊叹号”的大棒，将人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鬼蛇神呢？“言者无罪”就只能由你们这些人独享吗？其他群众就没有这些权力了吗？！中央文革小组不能完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官气十足的关锋、戚本禹就根本不能代表毛主席了。为这些人敲下警钟，且莫再复蹈：“院党委是代表党的”“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老路。

今天我们也来问几个为什么？

一、是充分相信群众吗？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了“少数派”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而对于“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至今没有肯定？这实质就是否定了“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呢？这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虽然“多数派”同学受了一些错误路线的影响，做了一些错事，但是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心是真的，是火红的，他们对牛鬼蛇神的仇恨是刻骨的，他们要改革旧教育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心情是迫切的，否定“多数派”同学的大方向，这叫相信群众吗？“大方向始终不错”只适用于“少数派”吗？中央文革小组某一些人高高在上，少数派同学随时能得到他们的接见，授以密计，而“多数派”同学要求接见则是难上加难。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于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是这样做的吗？不是！不是亲近他们，而是疏远他们，不到他们中间去了解情况，不愿听他们反映问题，不是团结他们，而是指责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另一派的领导，不是尊重他们，肯定这部分群众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看不起他们，以恩赐的态度说：“我叫他们‘少数派’不要叫你们‘保皇派’”，而不是肯定地说：“你们就不是保皇派”。由此观之，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的相信群众就没有做到“充分”，如何判断“多数派”群众的大方向呢？送给你们一段最高指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是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二、是放手发动群众吗？

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不努力解放“多数派”，使他们也轻装上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们是受蒙蔽”，恩赐了一个“不叫你们保皇派”的酸菜包子（似乎原来就应该叫保皇派似的）。当一部分人大骂某些红卫兵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是保皇派，大肆攻击一些红卫兵组织，抄总部，打人、开私信，撬他人箱子，开逼，供，信所谓“澄清问题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听而不闻？当别人一反映情况时就说：“你们要看人家的大方向。”虽然给说了两句好话，却是完全站在偏护肇事者的立场向多数派塘塞一下，安抚安抚。这实际上是放纵肇事者，鼓励他们大造一部分群众的反。这些人见有依仗便大打出手，全国各地有抄总部，抄群众的家，抢档案，打人的现象发生，以至发展到冲军委、冲中南海（因为原来封机关，封报社并没有受到文革小组的批评，实际上等于纵容）这些都有中央文革的责任。更有甚者，戚本禹竟蛮横指责一部分红卫兵为什么不去投拜第三司令部足下，谁是左派就凭你戚本禹一张嘴就定了吗？告诉你，你所宠爱的某些左派，我们不“感冒”，许多群众也不“感冒”。尽管他们总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总是以左派自居，你又总是替他们涂脂抹粉，但是大家却总看他们不象。要相信群众，是左派他们自己会去争取群众，群众是讲理的，也会主动团结在他们周围，不用你们去劝说，不需要你们给几个钱，不是左派的，你再怎么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中央文革小组现在放手发动群众了吗？没有！他们是双手紧紧扶着少数一些人去批判另一部分群众，去击垮另一些战斗队，另一些红卫兵组织。表面上一些人大会小会轰轰烈烈，大字报，大标语满城飞舞，实际上真正参加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是少数，多数人都被拒之门外。中央文革也要负责任。因为他们对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感兴趣（例如，第一司令部开批判反动路线的大会，中央文革就一个人也没来。以后戚本禹甚至说：“你们批判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的，而是从本身利益出发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不是采用依靠少数的左派去团结多数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而是采用了宗派主义的作法，把政策方针先交给一些人，去批判另一部分人，这样一部分群众就总得不到上面的正面教育，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总是解放不出来。企图用错误路线去解决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团结问题怎么可能呢？送给你们两条毛主席语录：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线也在这里。”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

三、是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吗？

当某些地方的少数派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了群众时，当某些人对其他群众战斗队采取攻击、谩骂、报复、整垮的手段时，群众提出了意见，表示不满，指出这是以错误路线批判错误路线，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却总以：“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理解他们的心情”等等理由不让批判。其实这正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你是真左派吗？你就应该从大局出发，注意政策、策略，团结群众，就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相信群众都是讲道理的，你的言行真有理，并向群众说明了，群众是会支持你的，没有道理，群众就要不满，就要反对。正确的领导，对待群众不应该偏一边，你做得对就支持，做错了就应批评，而不应该为其圆场。左派还用得着你上级去保吗？有错误，就老老实实到群众中去听听意见听听批评，能改正错误的是好样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肯定不是左派。

当群众反映强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一看不行，就在后面摇一摇羽毛扇，暗地里给一点批判，作些指示。不让群众批评，却暗里指点，这不是十足的诸葛亮训导阿斗的政策吗？扶着拐杖走路练不出左派来！

据传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又暗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开始了”。

就我们来看，这传说是可能属实，因而现在航院红旗等战斗队正大喊“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发现了一个法则，看准了红旗战斗队的方向，就可分析出中央文革小组的气候。

有人以“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口号来反对我们，但是你们用错了。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如果你们宽宏大量的话，请在你们写的标语后面也签上我们的名字。我们所反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同志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不这样就不能解决全国革命师生的团结问题，不这样就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最后提一句话，伟大的群众运动必须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而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却是突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思想，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谈，再见！

最高指示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判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丢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

1966. 12. 2

原载《反面材料》（油印，1966. 12. 14），中国人民大会堂函授学院红十月联合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教研室支队《长缨》战斗组编。

三问中央文革问得好

——支持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

北京女二中八一纵队

1966. 12. 04

北航红卫兵对中央文革提出的“三问”出世了，他们把心里疑惑问了出来、问得有理！有理！！毛主席说：“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提意见……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

然而，有的人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对“三问”却极力加以压制、批驳，说什么这是“放屁”、“狗胆不小”、“立场错了”、“这是反对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这些人的谩骂没有说出他们丝毫道理，难道问中央文革“疑问”就是“放屁”，就是“立场站错了”？还是什么反革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把话讲完？要知道谩骂是最无能的、无理的表现。这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径。毛主席说：“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碍真理，凡是真理都不装样子，他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作下去。”希望你们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作下去。

有的人说什么“狗胆不小”，我们说又有那些怕钉子，怕受打击、怕遭报复的人才胆小如鼠，不敢提问，无私才能无畏，就算你们说对了，我们干革命推翻旧世界就是要胆大包天。凭借你们那可怜的鼠胆够用吗？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把它拉下马！

有人说什么“你们立场站错了”老实告诉你们，正是因为我们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站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要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疑问问出来。主席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如果你们对他们的疑问可以解答，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你们也不知其然的话，请不要老子自封为“天下第一”。

有的人说：“这是反对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如果你们记性不好的话，还会记得当初有人给工作组提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压制群众，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难道你们还要重蹈覆辙吗？照你们的逻辑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叫“反革命”！

那反革命会满天飞的，你中央文革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不管你是哪一级领导，他不执行主席的正确路线，不符合主席精神，为什么批评不得？主席说：“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群众给领导提意见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哪有马克思主义者怕老百姓的道理的呢？毛主席说：“我还是一个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做为我们政策的基础。”更何况八一纵队只是提了几个问题。我们就何致把他们说成反革命呢？这够用吗？

北航红卫兵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反对盲从，坚决打倒奴隶主义，向中央文革提了三问，“三问”问得好！好得很！“我们中国人民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脑筋来思考并且我们

自己来定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土地上生长。”请谩骂者们记住这句最高指示，又要暴跳如雷，还是冷静下来想想运动以来的问题。“三问”是否问的合理呢？是不是也触及了你们的灵魂呢？同志们！让我们在主席思想指导下同打倒各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那种更隐藏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来示众。

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性错误必须批判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雷战斗队

1966. 12. 04

中央文革小组长期以来犯了路线性错误，必须加以批判！

（一）不贯彻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的是头头路线。坐听头头汇报，对头头指示，抓头头的司令部，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广大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则很少宣传鼓动，不蹲下去，不抓活思想，对于群众中的分歧，不是提倡用四大方法，自己去解决，而是以支持一边，不支持另一边的办法，弄成一边倒，一言堂，不了了之。对于受蒙蔽的大批群众更是不关心，不过问，“一边等着”。极个别人的讲话还暴露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戚本禹同志在接见第二司令部时说“……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支持你们成立组织？花这么多钱？主要是让你们去作工作……”。

（二）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突出四个第一，而是就事论是地应付具体问题，当群众中对立情绪很大时，不是提倡辩论、分析，不说团结的基础——共同的革命利益、革命目标，共同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充分讲清道理，而是急于解决问题。重物质支持轻精神支持。对于群众中的活思想抓得更是无劲。

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然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态度举动、大家作为榜样。他们的讲话有许多人视为珍宝，因此他们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主要是：

（一）运动至今冷冷清清，各红卫兵组织头头脱离群众，两派红卫兵间对立情绪很大，互相视为仇敌，老死不相往来。而各红卫兵内部，政治局面都是死气沉沉，战士跑不出头头们的框框。思想相当“一致”，铁板一块。结果是形势倒来倒去，总是一边倒，一言堂，各种意见不能充分交锋，总有一“派”的革命朝气被禁锢在闷葫芦里。

（二）群众中间对立情绪得不到解决。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是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宣传、互相辩论，而是互相提防，互相瞧不起，互相压。红卫兵是个新生事物，第一步哪能都走对？不论受过压制的，还是受了骗上当的革命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都是革命的阶级弟兄。错误在于推行反动路线的人。群众有什么错误可指责的呢？内部不团结，你要我认错，我要你认错，弄来弄去只能叫亲者痛仇者快。

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群众就不能真正得到解决，那末请问，不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不能紧密团结起来，又能靠谁去打倒它呢？

总之，中央文革小组只有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立足于广大群众，放眼于广大群众，着手于唤起广大群众的自觉，突出四个第一，才有资格当好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之间的桥梁。否则，就要变成运动的绊脚石！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清华大学《动态报·号外》（油印1966. 12. 5）《孺子牛》战斗组主办

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毒草
——评陈伯达同志二个月运动的总结
北京林学院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永向党战斗队
等

1966. 12. 05

最高指示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

“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甚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序言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的。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既然陈伯达同志作为文革小组的组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报告，那么就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就具有历史性的文献。那就要根据文化革命的客观规律，用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来总结，将要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关键性问题来总结，即（1）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於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2）就应该分析运动的形式，找出运动的特点、规律性，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经验，有甚么教训，今後的任务是甚

么，如何去做等等。以用来指导运动，使运动蓬勃发展。可是陈伯达同志的两个月运动总结又是甚么货色呢？现在剖析如下：

一、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形势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表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而陈伯达同志是怎样去做的呢？

陈伯达同志在他的总结第一个问题“形势大好”中第一句话就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正的宣告失败了吗？事实将给陈伯达同志一个很好的回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以新的形式继续。虽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深入人心，但是在当前运动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没有完全占统制地位。在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左”倾路线所霸占。

林彪同志是怎样分析当前运动的形势的呢？

十月一日的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正在继续。”十一月三日的讲话指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同志们注意：林彪同志讲的是“破产”而不是“失败”。）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路线的批判。”

林彪同志的讲话中，根本没有否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而是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破产并不等于失败。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须要一个长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过程。”

在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的宣告失败了吗？否！

为甚么从十月六日以后，几乎在全国全北京市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修正主义红卫兵总部”？为甚么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至今已经两个月，各学校各单位仍旧是分裂局面，各学校中分成两派或几派，团结不起来？为甚么在各学校中那“左派”也批不下去呢？而“保守派”批判也批不下去？为甚么一部分人被某些人捧上了天，而另一部分人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为甚么各学校几乎一大部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想出去串联？好些学校成班成班的一个人也不剩，而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走，走一个人就几个人，愿甚么时候走就甚么时候走？为甚么各学校的大字报栏冷冷清清，没有几张大字报呢？即使是有，中央首长的讲话确占70—80%以上呢？……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当前的两个战线斗争”一段指出“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需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

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可能有人会说，毛主席在这段不也讲了反对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吗？这不正和江青同志讲的“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不是一样吗？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毛主席指的团结，是团结各抗日党派，即这些抗日党派在抗日中可以合作。如果不是抗日时期，就是我们的敌人，如国民党。而江青同志讲的对象是学生，团结对象也是学生。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学生在学校里是党的依靠对象而不是团结的对象。看问题必须用两点论。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必须从中找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方面，加以分析，抓住本质的东西，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又不会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观察运动的形势，必须要有革命的远见，不仅观察到运动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眼光远大，决心大，干劲足，才能站在运动斗争的最前列。

而陈伯达同志对运动的分析，除了盖了一顶大帽子“形势大好”之外，只是罗列了运动的现象，毫无具体内容，使人看了不知所向。难道这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就只是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吗？没有其他成绩吗？既然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为甚么不指出两条路线斗争的成绩、经验和教训？

真正的没有成绩吗？不是的。

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北京市立刻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批判了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北京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破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人两面派的代表陶鲁笏等等，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而陈伯达同志却看不到这些广大群众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不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吗？

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戚本禹）对这些成绩不仅闭眼不看，反而对广大群众起来揭露批判两面派陶鲁笏时骂群众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马列主义的态度出发的，把功劳归於自己。

难怪陈伯达同志在总结中不提这些成绩。

二、 把运动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是方向性路线的错误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又明确指出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後期酌情处理。

陈伯达同志在总结中，用了一个不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谈甚么“八月八日通过《决定》还只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注：真是官僚主义！不是文革委员而是前文革小

组长)就跳出来(请注意这里之跳)提出对抗纲领(请注意这里是对抗)对他的纲领为之翻印、广播、不亦乐乎。……”虽然这里陈伯达同志谈的还很阴(隐)晦,其实指的是谭力夫和“谭力夫讲话”。谭力夫是一个甚么样的“大人物”呢?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三年级的学生,中共预备党员,革干子弟,北京工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谭力夫在一次辩论会上发了言,整理成稿,转抄北京各校及全国各地。只要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看到一个青年学生勇敢地、洋溢地抒发自己内心(的)话,能在这样大的运动中,基本上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能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学校中的具体问题,无不兴奋、无不称赞。

可是《谭力夫讲话》传达到各单位、各学校确吓昏了一些人,他们抓住了《谭力夫讲话》中的缺点大叫大骂,说甚么谭力夫是工大的小吴晗。《谭力夫讲话》比吴晗的《海瑞罢官》毒还大等等。说谭力夫是一个“修正主义红卫兵”,还造谣谭力夫有两个秘书,出门坐小卧车,外出串联住招待所等等。在各学校中,原来在“扫四旧、立四新”(中)的革命先锋、革命闯将立下了不朽功劳的红卫兵组织,几乎被骂成“修正主义红卫兵组织”、“修正主义红卫兵总部”、“修正主义红卫兵”等等。他们这些人可以说没有权利革命,不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若批,那是假批判,真包庇;你若不批,就说你顽固;你若讲团结起来批判,那是假团结,若是团结那是右倾;当你揪出两面派陶鲁笱,说甚么“你们那是从本身切身利益出发,别人出去串联是点革命之火,而你出去串联就是放毒。即使是很革命的同志吧,受了“修正主义红卫兵”地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闭眼想各学校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了。没有否认这个“修”字,说甚么《谭力夫讲话》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谭力夫是修正主义红卫兵”。即使是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应该批判”或是“谭力夫发言形‘左’实右得很”。总而言之,无论甚么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修”字。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左”倾路线,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把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引向歧途。在北京各学校,一天不骂谭力夫,那简直不算甚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没有一个不贴谭力夫的大字报的,而且谭力夫同学外出串联每到一城市,还没有落脚,全城消息已经传开“谭力夫已到××市”。

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发言,却吓了中央某些首长,急急忙忙抛出《谭力夫发言》是“修正主义大毒草”,挑动了一场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如果同志们正视一下现时之后,就看一看、想一想自己学校的真实现状吧!

目前,在学校中,还有多少学生和教师,开了几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有多少人参加,开的效果如何?学校的大字报栏是空的还是贴得满满?大字报的内容是甚么?准备外出串联的同学是真出自真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是学校没有甚么事可干没有兴趣?他们出去准备几个月的粮票,准备出去多长时间?你们学校的文革运动轰轰烈烈,还是冷冷清清?你们学校的两派或几派团结起来了没有?分歧是甚么?属于甚么性质?请同志们想一想这些问题,再问几个问题?我想对自己参加运动还是有点益处的。

陈伯达同志对于群众斗群众倒很感兴趣,而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示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确只字不提。

陈伯达同志这句话倒还不错：“有些人口头上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真龙，六神无主。”这句话太美了。用这句话描写陈伯达同志自己我看适当极了。

三、以讲“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为名，行大骂群众运动之实

红卫兵是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新事物，当时被一些打成反革命组织，是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扶植和抚育下茁壮地成长的，如汹涌的海涛，冲刷着一切害人虫。

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每个革命者必须明确地表示他的态度。毛主席早就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就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陈伯达同志是怎样对待红卫兵运动呢？

陈伯达同志任中央文革小组长，不全面深入下层，不做广泛的调查研究，对运动无统筹安排。大学的运动搞不起来，中学的运动冷冷清清，处于停滞状态。从十六条公布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窃取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威信，到处发议论，做指示，“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是指导文革运动似的，而对十六条指出的毛主席的六篇文章不感兴趣，每天学习几乎是学习首长讲话。甚至有人说甚么“你们辩论就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条件的第三条来说”，而他自己却找不出一条主席语录作为自己的论据。

由于以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使一些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广大党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被一些人视为“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派”，甚至被中央某些首长视为“保守派”（注：周总理说的），压力很大，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谈。许多红卫兵和同学响应毛主席号召，进行徒步串联，熟悉接触工农，锻炼意志。但是有的同学由于受压力大，含着热泪出去串联，甚至有的同学看到学校这般冷冷清清的情境，一气之下借出八九个月的粮票，准备出去到明年开学再回来。也有的同学不想再念书了，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到农村去落户。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卫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可是，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却危在旦夕。敬爱的统帅毛主席！您的红小兵是多么期望听一听您的伟大的声音啊！

在陈伯达同志的总结中，高谈阔论党的阶级路线，以迷惑群众。其实是给那些真正敢说敢闯、敢革命、干造反的革命小将泼冷水。破口大骂说甚么“青年天真地提出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迷惑学生。”

从这句话中，充分暴露出陈伯达对这件事根本不了解。这幅对联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提出这幅对联的青年学生是北大附中高三四班的。大约在七月初，看到高三二班一个女同学打出身好的男同学，他气不过，出于对阶级兄弟的爱而贴出了这幅对联。这个女同

学，她父、母亲都在香港，个人表现即为落后。这难道是一些青年天真地提出的吗？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为甚么这幅对联会出於北大附中呢？而传出後，一般在中学辩论得那么激烈呢？请看一下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一些班级学生的阶级出身吧！

在北大附中，出身成分最好的是初二五班，全体40人，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烈属家庭出身的21人，占45%，职员出身11人，占24%，家长是历史反革命、右派、现行反革命、黑帮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共计14人，占31%，而最次的一班，40多人，出身【此处5个字不清楚】人。

而清华附中呢？举高五（五）班为例。全班48人

家庭出身 占全班%

工人 4 8.3

革干 11 23

职员 12 25

资本家 2 4.2

反动军官 3 6.3

小业主 1 2.1

叛徒 1 2.1

高级知识分子 10 21

人数

这班团支部干部几乎全是出身不好的。如：团支书出身资本家，支委三人，一个的父亲是叛徒，一个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另一个的父亲是工程师。

过去在黑帮分子陆平统治下的北大和黑帮分子蒋南翔的统治下的清华园，我们出身好的不去夺取最去夺权，自己不去树立阶级的优势，难道还等那些黑帮分子去树立吗？在这样的修正主义统治下学校中，出身好的抬不起头来，受到压抑，而出身不好的却耀武扬威。有些同志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前北京市委贯彻了严重的违反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好几年，看不出问题，不去反抗。而对我们革命小将的过激一些的行动却万分注意，这是为甚么？毛主席早就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对於修正主义的校党委，还能用改良的手段吗？

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所写的“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的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

陈伯达同志，当你听到这些话不觉得刺耳吗？看到这些情况不觉得刺眼吗？

陈伯达在总结这破口大骂这幅基本上是革命的对联，说甚么这些是一种“自来红”的谬论。甚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抗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革命青年最勇敢，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你扣一个大帽子吗？吓不死人，就你这一招，是逃不脱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的，赶快休矣！

陈伯达还认为骂得不够劲，所以，他又说：“现在学校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自己不想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这句话真可谓睁着眼睛说瞎话，老给我们扣上一顶“捣乱分子”的帽子吗？扣不上！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讲“自来红”这个词，向来是带引号的，而且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改造，也没有否定别人能革命。

在学校中到底是甚么样子呢？到底谁在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和学习？又是谁能响应毛主席向雷锋、王杰、刘英俊等英雄学习？谁最爱毛主席，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而又是谁反其道而行之？在学校到处找政治避风港，又是谁不上课去逛大街，一男一女走人工湖？……

请陈伯达同志睁开眼睛正视一下现实吧！不要被一时的表面现象迷惑了视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听一听毛主席的教导吧！“你对那个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通。……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要不得！要不得！反对瞎说！”

我们也知道这幅对联有些偏激，但是横批是“基本如此”呀！群众自己慢慢地会改的，现在不就流传着比较完善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了吗？

这幅对联一传出来，绝大部分出身好的同学无不拍手称好，觉得自己又翻了身一样，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并非就抬不起头来呀！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同学说：“这幅对联就是革命的！如果不承认就是混蛋，还有甚么改造的价值呢？我不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我就是混蛋。”

在这里赠给陈伯达同志几段毛主席语录：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

“我们应该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比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这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通过对陈伯达同志总结的初步的，不完全的剖析，我们越觉得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向《红旗》十三期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这条路线的某些负责人，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搬出国民党‘训政’来对待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

像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行呢？不把毛主席脚下这块绊脚石搬开哪行呢？不散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就半途而废，就会流产、夭折。红卫兵同志们，革命

的同志们！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於极其危机的时刻，我们必须停止内部枝节问题的争论，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 红卫战斗兵团《一二·九》，《永向党》战斗队
红 卫 兵《永向东》

1966.12.5

十二月五日晚在林学院辩论会上的发言

易振亚，万会秦

1966. 12. 05

为什么我们提出抗议呢？因为我们早就写条子要发言，因为这个辩论是一言堂，除了李洪山同志一个人发了两次言，其他全是反面派。因为我们是比较支持李洪山的，所以我们要求发言，但轮到我们要发言了，我们看人走得太多了，我也不打算讲了，我既提出抗议了。……那我就讲一点，因为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没有准备辩论。可是根据我们自己商量的结果，谈一些问题。如果我讲的不够的，还有万会秦同学来补充。首先我要读一段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怕有人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我们和李洪山同志一样，怀着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心情。带着无限崇拜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对不管什么人，他只要有缺点错误，我们就要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李洪山同志的发言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当然有个别的地方我们允许保留。但是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觉得和李洪山一样必须踢开。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有许多若干问题是原则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本来准备写文章批判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清华人少，也没有搞，这次我们刚串联回来，也没有时间，因为有些地方整理了一下，结果没带来，所以我想谈几个问题。

第一点：我们对文革小组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党中央。其余，尤其是第三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我们觉得是反动的，就是他们说：“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他的狗头。”我们说现在像以前，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应该和党中央分开来，结果，他们完全一直到现在还违背这个精神。本来中央文革小组就不是党的组织，更谈不上什么党中央的问题，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毛主席了。有人说据内部的可靠消息，说蒯大富是个代名词，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主席，这种才是……对个……好像……我不说了，你们估计，你们自己是了解。（群众纷纷质问是谁说的）我再说一遍，有人说这是可靠消息，恐怕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说的，蒯大富只是一个代名词，我的记忆力差，可是不是完全照原话，就是意思是这样蒯大富只是一个代名词，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毛主席等等……（万会秦接着说：我们没有听中央文革成员说，这本来是不该讲的，既然已经出来讲了，那就讲吧。实际蒯大富已经成了代名词，他代表一种革命造反精神，有人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那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党中央就是党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文革小组，这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群众发言：王力同志在十一月份接见了第三司令部的同志，就是说关于蒯大富的个人问题。第三司令部和我们的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有些争论，不管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也从来没有说过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就是反对党中央。他的意思是蒯大富现在是少数派，或者是清华的一些耀派，或者是全国的一些少数派一个像徽，或者是一个代表，是这样意思，这是王力同志说的，从来没有说过像他们说的那样话，如果他们说过这样的话，请他说，甚么时候，甚么地点，听甚么人说的。）（群众高呼：对！掌声）关于这个问题，他刚才已经做了解释了，蒯大富做为代名词，这有传单可证。（群众：把传单拿出来看）但是，这个传单比较少，我现在不能给你看（群众打断他的发言，要传单）他说：好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尤其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话说完。（群众：让他把话讲完）对！即使是右派分子也要到运动后期处理。我有言论的自由，也可以讲，也可以不讲，我的态度我现在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我现在就是不讲。（插话：我来澄清一下，我是清华的一个教师，关于中央文革讲的这个话，我听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他们有一个传达，他们是这样讲的，这是我听说的一个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接见井冈山红卫兵的一个同志。因为蒯大富同志有些作法脱离群众，违反了党的政策，所以中央文革小组这么讲，因为蒯大富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有缺点有错误，你们要好好帮助他。我听到的传达是这样的意思，根本不是甚么反对蒯大富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我根本就没有听到这样的传达，这是我们学校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联合同志给我传达的。不是他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这样讲的，让他拿出证据来！）（热烈掌声，众呼造谣可耻，拿出证据证据来！）对！造谣可耻，我完全赞同。但是，大家看，我是不是带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讲话的，我的话仅一半还不到，你们就来了几个人发言了。我实际上发言，一个发言，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发言，是不是这么回事？（群众言：让他好好说）大家这样做，我很感谢，让我把话说完。好！最高指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甚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们和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整天忙於事务性，不调查研究。这个问题李洪山同志已经清楚说过了。所以我今天这里就不再仔细说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根本问题是篡改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毛主席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现在我们就是要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大家可以思考。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等等经常告诉我们么！你要革命就要有一个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来领导，那么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中也说过（……听不清）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把党的领导说的没有了，把我们的党，也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把党说成一团漆黑四分五裂修正主义，就是说不堪设想了。我们当然有事实，摆事实讲道理。首先第一点我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听不清）但是中央文革没对这种意见，这个谈话就流传于全国。没有进行肃清，实际上助长了这个讲话，戚本禹11月12日讲话实际上比这个同志讲话更厉害，这个谈话人是谁呢？就是陶鲁笏，陶鲁笏已正式被批判了，但他这个讲话已影响了全国，中央文革小组不闻不问，最近（……）说多数派是党团员，他（陶）问大家是不是？大家说是！问：“多数派为什么是党团员，这说明甚么问题？”“保自己”（此时有人轰动，有人提让他

讲完）讲完可以批判么！你们这样啊！我讲不完了！陶鲁笱说：“过去我们依靠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当时党团员保守相当严重。工作组，陶鲁笱及中央其他人说犯了错误是由于依靠了党团员才造成的。我们认为总的来说，就是目前左派中，党团员应该说是大多数的。他们应该是左派的核心，紧紧地依靠他们，才能壮大左派队伍，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的顽固派。他（陶）说，把大多数党团员说成是保守的落后的，相当严重，如果不批判，对……（听不清）那不就是大多数都是反革命，都是修正主义？又是甚么呢？这种提法完全是和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论说相对立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章里也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家也很清楚，工人阶级是先锋队。毛主席重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又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这么说来，大多数党团员都是保守落后的，相当严重的，不是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戚本禹11月12日说：“学生……（不清）”他的意思这样说，他说……还说62年中国的方向变了，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这个是甚么话，中国的方向变了吗？这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绝大多数来说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有些人个别的犯错误。（念条子，要求说明身份）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要讲，我们有权利。我们现在整个党坏了，大多数坏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当然应该解散，因为中国共产党既然不好，那么中共当然应该解散。他们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解散。同志们你们允许解散吗？他说共产党员不好，团员不好，他们是保守落后，大多数工人农民是受欺骗受蒙蔽了，是保守、保皇，当然大多数学生也是保皇小丑，大多数是红五类出身，也是五保户等等不一样，情况多啦……就是黑五类，现在不说黑五类了，就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的人。陶鲁笱同志说：……（众轰）为什么谭力夫是个学生要到处批判？为什么这个流毒这么广，而且流毒这么大？下面请看谭力夫的发言……。27号，他又在北工大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陶铸说，现在哪级党委都可以反对，祇要你不革命，这样一来那个组织就可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党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小组祇要执行党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众：就是体现党的领导）对“体现”。可以说是原来中央的领导，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把党的领导抽象成毛主席的领导，现在变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甚么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凡是不正确的就反对，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抽象成了空中楼阁了……说他是正确的，这个推论的结果呢？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需要成立，毛主席也不需要缔造中共。根据他们的谬论，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只有一个毛泽东主席，那么甚么事都可以了，革命就可以胜利了，完全是一个谬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们承认的是时势造英雄，伟大的领袖对革命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说领袖决定了一切，他检查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假如是符合……但是要反问一句，毛主席虽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是溃败，支部建设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甚么原因呢？毛主席肯定过说，我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严密的党的领导，即使内战时期也只是团里才有了党的领导，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北伐战争是最后失败了。不管各级党的组织是不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领导，是不是执行了毛泽东思想……都说成是黑帮都说成是反革命。这是片面斗争。我们

在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可以体现党的领导，如果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可以体现党的领导，那么还要党章党纲做什么呢？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革命风格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代表者，而红卫兵是甚么组织呢？社论谈得很清楚，是革命群众的组织，不是甚么阶级的先锋队。请问大家，如果一个小学生加入了红卫兵，他连党纲党章都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可以在汽车上读语录，难得这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吗？我认为按你们那个说法就等於谁都可以体现党的领导，谁都是一样，只要有一个组织，党组织是这样，不是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那么红卫兵，党组织是平等的，这样一个概念谁也不会承认。我们说难怪陶铸曾经说过好的领导，党委好的领导，一般的可以放在一边，搞搞伙食，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党委，我看也没有几个真正好的，起码是一般坏的，一般的没甚么祇能搞伙食，我觉得即使不能领导文化革命，也可以参加文化革命，干嘛要放到一边去搞伙食，那么他文化革命之后思想要落后到何等程度？

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还有人民的敌人存在……”请问，我们大家如果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阶级敌人？帝国主义消灭了吗？国内地富反坏右一切牛鬼蛇神都消灭了吗？我们说没有，所以说在这个形势上一定要有党的领导，而且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而现在各级党组织没法领导，无论那个单位那个学校，都不受领导了，我们要大家好好想想有人说文化革命时间可以改变，不同于一般，我们说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好好思考。列宁教导我们“一个想存在下去的政党是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的，是不能允许和那些可能把他埋葬的人做任何妥协的。”所以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好好想想，再说几句话，现在我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敌人比任何敌人凶恶几倍，他们是潜入我们肝脏的敌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脸涂红，涂包龙图，而把革命群众革命党员，革命干部，革命人脸上摸黑，打成反革命，打成牛鬼蛇神，打成保卒，保皇派，保守派五保户；还有甚么，反正多了吧！名词很多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是应该想想看，现在陈伯达说要冲垮的修正主义红卫兵，就是指有不同意见第三司令部观点的同他们差不多的红卫兵组织。我们说全国和第三司令部不同观点的人，其是多数还是少数。当然我们根据我们初步来看（与中央文革小组原则上的分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再三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阶级者、大资产阶级者最深刻的区别。毛主席在识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中也说一切言论要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所以我们说在有阶级的社会存在内巩固加强还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很大分歧，很重要的分歧，因而在目前无产阶级专政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对派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所以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因而现在恰恰是甚么回事，现在提倡所谓——陶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实际上我的看法，这个就和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搞的糊里糊涂，结果搞了个无政府的东西。陶铸是怎么说的，大家可以听听嘛！还有（？）的问题现在的劳动群众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民主的问题，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苏家坨的贫下中农到人大去进行关于郭影秋的问题辩论，陶铸同志是怎样说的，贫下中农不了解学校的情况不要参加辩论。可是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我们说用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聪明的，是孙悟空，是齐天大圣，不了解情况就不能分析了吗？这样说来，人民群众是一无所知，睁着眼瞎说，糊里糊涂，这不是把群众看成糊涂虫又是甚么呢？苏家坨贫下中农要和人大同学辩论，他们对（同一个人）同一首诗有原则分歧，人大同学说郭影秋的诗是反动的，苏家坨的同志说这书是革命的，是好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广大工农群众，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允许不同意见，允许辩论。为什么说不不要辩论呢？他们各有各的立场，贫下中农由于出身利益所在，他有他一定的特殊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打上一个阶级烙印，所以说每一个话都有阶级烙印。毛主席这样分析过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几的人是熟悉马列主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大多数是不熟悉的，左右摇摆。工农群众他们眼光是亮的，所以我们要听，究竟听谁的话，是否被迫把工农，贫下中农打成反革命，陈伯达说：敌我不分的人并不是革命者，并不是马列主义者，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我们许多红五类，许多革命干部的子。，他们父母究竟是甚么出身，在解放后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谁最革命，谁敢革命，谁跟党最紧。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是谁立场最坚定，谁先看出右派的真面目？是知识分子吗？不！是贫下中农，是工人，我们说谁的眼睛最锐利？希望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当时的的确确有大多数知识分子犯了错误，不少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退一步说，不了解学校的情况，那么省委市委地问题，是工农最了解，还是学生最了解？我们说工人、贫下中农最了解情况。而现在那个地方祇要工农一出来说话，就要说领导挑动群众斗学生，工人斗学生。我问问大家，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苏家坨贫下中农来人大辩论是谁挑动的呢？没有人挑动吧？（人大同学：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郭影秋在苏家坨了吗？

（我是人大的，最有发言权——人大同学插话）

我说话都有片面性，实际上没有完整无缺的东西，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说简单一些是可以的。

我去过青岛，青岛市委书记，张敬涛同志是60年调到青岛去的，以前刘少奇曾在那里，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张做市委第一书记，几年来各方面工作搞得很好，谭启龙也承认工作搞得好，这几年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当然这是毛主席的领导。但是也要有人贯彻嘛。由于他平时比较深入群众，比较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的身体平时也很坏、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现在由于对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了几句话，被青岛医学院学生戴了高帽子。打得很重，而后来工农知道了，就起来辩论，中央文革也没有去做任何深入调查，就彻消了张敬涛的一切职务。这样一来一个是党内成份，对党内斗争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希望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能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把这些同志搞臭搞得抬不起头来？【青医同学插话：我是从青岛来的，他说张敬涛罢官是由于对派工作组问题说了几句错话，根本不是这样，张敬涛在8.25—8.26号他继续组织许多不明真像的工农，打电话调来人，一次电话一个单位，工农停止生产，围了青医、山海、山化三大院校的革命学生，打伤了一些人，（在山医敲锣打鼓宣传十六条……吓死了一个心脏病病人）这个情况很严重，找谭启龙解决这个问题，他搜集材料，经中央批准，撤销一切职务，青岛市某些人不甘死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甘心撤销张的一切职务，於9.1牛鬼蛇神造谣说：党中央毛主席来电话恢复张同志一切职务，结果9.1祇一次反复挑动几十万人。连郊区的也来了，据说有的生产大队进城围攻学生还有工分。这个消息不确实。这时已罢了张的官，於是谭启龙出来辟谣，这些谣言当时一般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说青

医打了张敬涛，把张膀子上刺满了大针，戴上高帽子，七十多斤重，残酷斗争四个小时，造谣很多。工农（听了）不明真相很气愤。九月一日又围攻了一次学生，张敬涛罢官决是因为说了句错话。】

易振亚接着说：要按十六条办事，骂人是不好的，所以不许挑起骂人，不好，现在不要骂。（他念递上的条子）“清华二丑，清华第二个谭力夫式的人物。我们感到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调查材料嘛！为了节约时间就不再举例了，有些地方的工人农民根本没有受人家的挑动就起来了。西安西边有一个八桥，当时我为了调查这个情况，当时同去的还有一个造反派，他们说那个地方谁最活跃？就是地富反坏右最活跃，还有“四清”中被罢官的四不清干部。我们专门找贫下中农出身的老太婆，不识字的。他们几个人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我们单位中把第三司令部说成是革命左派，我感到这是不妥当的，一部分人是为了革命利益，一部分是为了混水摸鱼，把造反都说成左派是不对的。工农受了挑拨蒙蔽欺骗。毛主席说：工农眼睛最亮……这么多都受了欺骗，这就不行，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兵。毛主席说：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工农兵，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这个根本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请问大家，在现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起来革命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起来革命，所以广大工农基本群众力量的忽视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专政是对谁专政，把第三司令部捧得这么高，简直是革命左派，红五类被打成修正主义的，打成保皇派，保刘（？）派，保××派，或者五保户等等反革命的名称，现在广大工农群众都是受骗，这么多都是……（听不清）好像第三司令部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第三司令部的成员是复杂的，有……有……。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但是也要有阶级观点看问题嘛！清华大学蒯大富是左派吗？我认为算不了左派。反革命？我没有这样说，起码蒯大富不是革命左派，因为他做了不是一个左派所能做的好事，撒谎造谣的事情，他说他是贫农，后来又是上中农，现在也不说上中农了，现在又说是革命干部了，其实是反动军人（被俘虏后）44年参加共产党，后来犯了错误，我看不一定是革干，我看不一定是甚么革干，所以说，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拉拢一批打击一批，我们好好想想，为什么拉一批，为什么打击一批呢？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很大的问题，都是和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他不是对广大群众最大限度的民主。其他关于党内斗争问题说几句，实际上采取了一种的确是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动不动就这是黑帮，那个是黑帮，这是保皇，那个有严重错误。这个也要搞臭，那个也要搞臭，毛主席一贯主张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毛主席说过：党内斗争应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现在我们的同志……不说了，现在就是唯恐别人批评不倒，唯恐别人不是反革命，唯恐别人犯了错误改正错误，这一点你们想想有没有党内斗争问题。由于时间问题就不按毛主席的说了。

关于林彪同志的领导问题，刚才有人说林彪可不可以怀疑的问题，我和大家不同，我的看法是林彪也可以怀疑怀疑，为什么，文化革命一开始，陶铸就定调子说林彪不可以怀疑，我认为是不对的。这是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他是我们党内受拥护的，是副主席。我听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一场反修大战役，所以将来如果产生了修正主义领导，还应不应该反对，如果将来产生修正主义不能怀疑，这样修正主义怎么打倒？而且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每一事情都要采取批判，为什么我们不怀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呢？就是因为毛主席经过多年斗争的考验，做为全党统一的承认，经过

斗争考验的，他完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林彪同志我们了解的比较少，他的地位实际上也和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以前的地位一样，刘少奇那个时候谁知道他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而刘少奇在党内文件上，多少次决议都写得很清楚，确定了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中国马列主义的代表，而且还说毛主席是红区工作的模范，刘少奇是白区的模范，所以说，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起码从……（听不清）以后是党内第二号人物。许多文件中都确定了刘和毛主席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还说毛主席是红区工作的模范，刘是白区工作的模范，是抵制了“左”右倾路线的杰出代表，现在还能犯这么大的错误。林的革命经验比刘少，刘在二零年在上海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组长，历史经验比林彪多，而林呢？我们在全党了解的根本不太多。我们也对林怀疑，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怀疑，如果有了根据就一定要怀疑。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无根据地怀疑。

【众问：有甚么根据？甚么地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易答：在现在我还不能说林怎么样，根据一贯的历史教训就应该这么看，刘那个时候大家不能怀疑，现在有事实，大家怀疑对了，毛主席经过多年斗争的考验和全党的公认，最了解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他完全正确。不能犯错误，林彪没有那么多的根据证明他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马列主义的，党的决议中没有说过这样，我反对无根据地给林彪贴大字报，而有了根据就应该坚持到底，不怕死，斗争下去。（以上根据录音整理，语句不通处亦未加改动。）

整理者：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鏖未残》战斗组等七个单位

（注：此发言是他们在十二月五日晚，林院与李洪山的第二次辩论会上的发言。）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1966. 12. 05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 ×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 颜晓东

1966. 12. 09

敬爱的毛主席：

值此给您写信之际，我祝福您老人家——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愿您老人家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自从您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文化革命大军有了方向。文化革命正蓬勃於中国大地。但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保皇派们，他们阳一套，阴一套，极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号召全国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一个空前的文化革命高潮就要来临，全国革命群众就可以团结起来，实现大民主，这真是好得很！

可是很遗憾，十月三日之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陈伯达同志说：有修正主义红卫兵（虽然后来改正了）。本来要求搞本单位文化革命的同志们（以后称“多数派”）都被骂成“修”字号，“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派”。少数派把错误全都推给多数派，把自己打扮得绝对正确。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少数派不是把矛头对准工作组和原党委的领导（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贯彻者），而是对准同学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少数派力图挤垮多数派的红卫兵组织，进行谩骂、污蔑、抢劫等种种违反十六条的活动。多数派的红卫兵一时手足无措，纷纷检查自己，而不是指向反动路线贯彻者，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犯严重错误的党内领导人员。红卫兵组织也松懈了，分裂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同学、群众之间的鸿沟，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深了。其实，运动初期，同学中有不同意见，因而有些互相压制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完全可以运动慢慢解决的。根本不必要用批判多数派的办法来解决。多数派也根本谈不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这样做，祇能重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覆辙。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全国打架情况严重，伤人、死人也增多，难道当地领导机关都是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全国的干部差不多是变质了。人们不能不深思。多数派被骂得抬不起头来。抢广播台，抢黑材料，唯我革命。别人都是保皇派，假批判，真包庇。对于这些违反十六条的错误行动，有人不仅不制止，反而说这是革命行动。这怎么会不流毒全国呢？（国务院要求大家保卫国家机密，档案等，有人又说抢黑材料是革命行动，这怎么能不发生冲突，造成损失呢？）

十月以后，关锋、戚本禹等人，挑动少数派斗争多数派，他们对多数派施加压力。似乎多数派就是只有向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似乎多数派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不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似乎多数派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可恶等等。戚说：你们（指多数派）为什么低不下头？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老人家领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您老人家救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戚本禹有甚么权力要我们低头。难道我们有搞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有罪吗？难道我们没有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戚本禹的这句话挑动了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全国有多少革命闯将惨死在戚本禹的一句话之下，给文化革命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多

少的损失？十六条中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藉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任何”这二字是不可忽略的，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必须执行的。十六条中又说：“……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戚本禹就是利用别人的“错误”去挑动群众斗群众。十六条中说：“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这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关锋在11.20说：资产阶级攻击三司，实则攻我们。关锋的这句话，就是不许任何人对三司的作法提意见·就是挑动三司的革命师生去斗争“攻三司的资产阶级”。企图文过饰非。怪不得大街上大标语说：“攻击三司就是攻击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要被关锋、戚本禹等人扼害了。十月三日之後，他们根本没有接见过多数派，企图对多数派施加压力。老实告诉关锋等人，没有你们，我们照样闹革命。十六条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祇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关锋、戚本禹是变相的工作组，是裸母，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出发，不先当群众的学生，後当群众的先生。这里划框框，那里定调子，不但愿听群众的呼声，反而根据想当然胡说八道，挑动群众斗群众。多数派打成“修正主义”和“要低头的人”。

关锋、戚本禹无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更是令人发指，关锋11.20说：如果我们文革小组垮了，你们将会怎样？在座的有多少被打成反革命？运动还会有反复，假如敌人得手，那你们还会被打成反革命，我们也会，而且还会被杀头。

且不说关锋把多数派和对他提意见的人打成“敌人”，在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关锋根本不相信十六条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关锋把自己说成是救世主，把自己置於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您老人家之上，把功劳归於自己。关锋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化身。绝对正确，并准备对对他们提意见的人大打出手。关锋把全国说成漆黑一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摇摇欲坠，散布流言蜚语，企图镇压革命左派，还自以为得意。其实，关锋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挑动全国性群众斗群众的祸首，他们企图挑动三司革命师生来保他们。关锋、戚本禹很可能是野心家、阴谋家。他们从来不号召三司学习毛主席著作，更不提学习“老三篇”，破“私”立“公”。在他们的讲话里，从来没有引用主席语录。他们整天抛头露面，企图收买人心，老说，我怎么怎么，我们怎么怎么，摆出一副老子就是党的架子。关锋等人根本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根本不知道正确意见的产生是群众中二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断互相修正的结果，他们根本不知道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找多数派，不先当群众的学生，後当群众的先生，他们自封左派，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不需要改造的人。他们根据当然发号施令，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这样做，没有不失败的。

敬爱的毛主席：

我对十六条和您的著作学得非常差，但是我有一颗捍卫您革命路线的红心，我有勇气向一切按我的水平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开火，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者，但是我不怕。难道清华大学红卫兵都是右派吗？保皇派吗？难道事物是静

止的吗？难道我们永远是错误的吗？您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不树立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实现大民主，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敬爱的毛主席：

今 后我一定要更努力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清华大学红卫兵战士 颜晓东
1966. 12. 9

批评和监督中央文革的典型意义

北航红卫兵纵队

1966. 12. 09

八一纵队的同志们最近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有支持的，也有谩骂的，什么“八一纵队的混蛋们、先生们”呀，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资产阶级的徒子、徒孙们”呀，什么“保皇死党”呀，等等。还有同志最近批判了戚本禹同志11·12的讲话，对此事出现了“戚本禹同志最坚定的革命左派”等标语。

我们认为，对八一纵队同志们的大字报，对批评戚本禹同志11·12讲话的大字报，每个人有可以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且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向中央文革提问题，批判中央文革某些成员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讲话，贴他们的大字报却有典型的意义，对这样的大字报抱有什么态度，却有着典型意义。

我院红旗战斗队的《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论）是相当闻名的，但是看来其中最精华的一节，正在被某些同志遗忘，（或者本来就没有看过，没有理解，没有深思）下面我们全文摘引这一节，以备忘和重新引起某些同志的深思。

意味深长的变更

让我们再从一个意味深长的变更说起吧。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如下一段：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对这段话作了意味深长的变更：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的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这段意味深长的修改告诉了我们什么？亲爱的同志们，你可曾深思过吗？（引自《东方红》报，着重点是原有的）

亲爱的同志，你真的深思过这段意味深长的变更吗？

我们认为，必须深刻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只有这样才能用严肃的政治态度来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关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将来真有个个地区，某个省、某个中央局，甚至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你们青年一代经过这样一场大演习，经过防修反修的大演习，也就有了胆量、有了闯劲，就

可以把它砸掉。青年们敢不敢砸掉那些修正主义，就要看这场文化大革命……锻炼青年一代成为这么一个力量：敢大破大立、敢讲敢闯，无论将来在学校里头，还是在机关中间、社会中间以至于在党的领导机关，甚至在党中央出现了这个东西就靠你们。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的最大希望，最殷切的希望。”（根据讲话记录）

我们说，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有典型的意义。对这样的大字报抱什么态度，也有着典型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到了中央文革这一级，如果认为它的工作中有点缺点和错误，它的某些成员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还能不能批评，还敢不敢造反。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问题不理解，能不能向中央文革提出问题？

我们认为：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必须坚决造反，一造到底，而不管它是哪一级，不管他是谁。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才能保证我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另一方面，从中央文革来说，它要坚持正确的领导，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听取广大群众对它提出的意见、批评和问题。

给八一纵队的同志们扣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在批判戚本禹同志的大字报上贴上“戚本禹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就是要压服不同的意见。

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批评不得吗？坚定的左派就没有缺点、错误吗？他们的缺点、错误就批评不得吗？他们过去是坚定的左派革命，就永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吗？否也，这乃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历史的教训，绝对不应该再去犯过去的错误。曾记否，在我院批判工作组时，提出“工作组是革命的”这一口号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认为，必须真正按十六条办事。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不尽可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不讲道理，不摆事实，只是谩骂，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绝对不是革命者的态度，必须反对党八股、反对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这种东西，生怕人家反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碍真理的，”“这种吓人的战术是剥削阶段以及流氓无产者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人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的：一要“敢”字当头，二要摆事实，讲道理。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学习林彪同志11月3日的重要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

主，就是党无所畏惧的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清华大学《捍卫十六条战士》

1966. 12. 09

1.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错误路线而引入歧途，后来又是由于我们的伟大领袖亲自扭转了这一错误，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请问，你们在北大蹲点至现在，尤其是《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至现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在你们领导下搞得怎样？你们是按照《十六条》这个最高指示办事的吗？你们贯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

2. 运动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造成了白色恐怖，请问你们，现在是否还存在这种局面？现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到底实行得怎样？到底是不是已经真的大民主了？

3. 请问你们，从三司透露出来的绝密资料来看，似乎你们暗地里给他们下了要他们奋起保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否有这次会议？如果你们真的贯彻了主席的指示，按照《十六条》办事，那么怕什么，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害怕别人，才见不得天，要“关起门来讲，不要记”。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对群众的任何指示都没有关起门来讲的必要，你们的声音应该让全国都能听，为什么只能让关在室内的三司的人，才能听到呢？

4. 请问你们，目前群众到底是敢字当头还是怕字当头，还是保字当头，这三种人的相对比例怎样？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

5. 请问你们是怎样引导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你们对原来的多数派、少数派是采取了同一种态度呢？还是采取了不同的有偏见的态度？你们承认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还是承认少数才是受害者，而多数派是鼓吹者？目前群众的对立情绪怎样？你们心里有数吗？群众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地出现了严重的武斗现象，不少阶级兄弟无故丧失了生命，而且发展趋势有蔓延的倾向，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原因在何处？责任由那里来负？是否还是原来反动路线影响的结果？怎么样立即制止这种事件的继续发生？

6. 从中央首长前后的讲话来看，个别首长讲话前后有天渊之别，是不是作为中央首长，没有自己的一定的见解？还是他们也受到某种压力的缘故呢？这种现象的产生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会有多大不利？

7. 三司部下的人为什么对周总理倒不是那么信任，把调和折衷的大帽子住总理头上戴，而对中央文革的人倒是如此的五体投地呢？是总理党内的职位，还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样不如你们这些人呢？

8. 请问中央文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底是否已经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已经破产，还是比以前更加猖狂了？

9. 请问你们，你们眼里的原来的多数派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人民？还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呢？第一、二司令部召开的10月9日的大会，为什么你们一个也没有去？而10月6日的会议你们全部都到呢？为什么原来的多数派要见你们，连续等待一昼夜，结果还是我们亲爱的周总理出来讲话，而你们到底没有出来？为什么少数派要见就见，还要找上门来？你们承认不承认大家都在闹革命？

10. 请问你们《十六条》中有这么一段话（第七条最后一段“在运动中除了……酌情处理”应当怎样理解？谭力夫是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吗？显然不是，因为至今尚未依法处理，那么请问你们，他是属于一个大学生吗？他在不在一律不整范围之内，还是个例外？他确实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就凭他一次讲话，是否就要定他的右派？就算他是右派了，那么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该处理右派的时候了么？

11. 请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党内一些秘密不断泄露出来？是群众钻入机要部门抢出来的，还是某些人泄露出来的？是从那里泄露出来的？

12. 请问，全国所有省市中，在你们看来，有那一个省委市委是属于四类党组织中的第一类党组织的？到底有没有？难道《十六条》中明文写着的一党组织是一句空话吗？

1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你们自己该不该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你们讲的话是具有指导性的，你们的讲话难道都符合毛泽东思想了吗？都符合《十六条》最高纲领吗？还是有所出入？还是背道而驰了呢？你们自选吧？

14. 《十六条》明文写着“各级党委……（第十六条最后二段），请问，这个指示你们执行得怎样？你们贯彻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吗？你们当群众的学生当得怎么样？你们的片面性、局限性避免得如何？

15. 《十六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第四条），请问 原来的少数派是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呢？还是由你们保驾出来的？文革小组不断出来给谭的讲话作下结论，请问这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吗？是让群众自己去认识真假了吗？

16. 中央文革小组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高领导机构，请问运动的下一步怎么走法？斗黑帮吗？恐怕办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真正胜利，决不投入打黑帮，中央文革还是引火烧身，开始触及自己的灵魂吧！

十六条是我们的最高纲领！

我们的行动指南是十六条，而不是任何一个首长的讲话！

坚决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定要使真正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不获全胜，死不瞑目！

十六条真正才是党中央的话！十六条才真正是毛主席的话！

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是要对照十六条来行动！

《捍卫十六条战士》1966. 12. 9. 新斋820

原载《反面材料》（油印，1966. 12. 14），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红十月联合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教研室支队《长缨》战斗组编。

第一把火

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

1966. 12. 10

文化革命以来，中央文革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但是运动阴暗面很大，为了迅速冲垮阻力，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认为必须炮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为了帮助中央文革整风，为了强化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提出如下问题：

一、什么目前运动搞不下去？为什么许多人厌战情绪上升，这段运动是热热闹闹还是轰轰烈烈？

二、学校中究竟有多少同学在认真学毛选？为什么不少群众用首长讲话代替最高指示？

三、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日趋严重？为什么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严重事件？

四、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吗？这两部分群众照现在这样下去能真正的解放出来吗？

五、可以不可以炮轰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一炮轰就砸烂狗头？毛主席的大民主在群众中扎根了吗？

六、斗、批、改何年何月才能开始？为什么多次偏离运动的大方向？

七、上述问题，值得深思，我们认为只要中央文革无所畏惧，开门整风，贯彻毛主席的大民主精神，就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斗争将走上更加热烈、更加健康的道路。

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大字报选》，增刊十四期，1966年12月25日，第39页。

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

北京大学《虎山行》战斗团

1966. 12. 10

近几天来，一向平静的北大突然大动起来了，大号的标语到处皆是，又开大会又开小会又发表声明又喊呼吁，好一派“繁华”景象，就连一向沉默的北大文革常委也活跃起来，首当其冲地于十二月七日夜十时许，出人意外地在《擦亮眼睛，投入战斗》的乐曲声中，广播了一个《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大学红卫兵更出人意外地号召于11·15去五四操场集合，准备游行，接着又于十一月八日，开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大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北京大学文革常委会的呼吁中说：“最近在北京，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刮起了一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和翻案的妖风，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指向坚持和毛主席站在一边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于是乎，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北京大学红卫兵，东风兵团，红旗兵团，北京公社等等战斗团体争先恐后的大施恐吓战术，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呀，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小组》呀，等等，好不吓人！而吓人最甚者，骂声最狠且最高的要数井冈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导演这出吓人战术最积极最卖力的也是井冈山红卫兵及其所属战斗团。

难道形势果真如此严重吗？难道真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你相信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吗？你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人民中的威望，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吗？你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的吗？

那么，目前在许多单位展开的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辩论，就绝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炮轰中央文革小组是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运动发展的关键之关键！目前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主流是健康的，好得很！每一个确定革命观点的人，每一个仔细分析现存形势及几个月来文化革命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应该跟着人瞎说，胡说指责当前的运动，而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并站在他们的前头，引导他们，使他们获得结果，获得胜利！

革命的同志们，都不可忘记张承先对“六·一八”形势估计的教训！

然而，北大众炮如一地认为当前炮轰中央文革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抓住大辩论中的一些皮毛小事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场严肃的关系文化大革命能否深入发展的争论归结到几个人身上……如此等等。

他们说，这次提倡炮轰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多是“保”工作组的，这不是反扑是什么？革命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随时检验每个

人，而每一个组织也都在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潮流之中。过去，井岗山曾代表着革命势力，炮轰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不是已滑到相反的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围剿这次大辩论的急先锋了吗？而过去那些所谓“保”字号同志，由于少数派夺权后反过来受到压迫发现了问题起来造反，代表革命势力，不也是很可理解的，怎能说成是“反扑”？

文化革命中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一直在进行着，并将继续进行下去。十六条指出“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怎能说人家对中央文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呢？那末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就批评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砸狗头”？！！林彪同志说：“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革命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

如果说，当前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话，那末，这种反扑，在北大就更明显，北大文革常委的莫明其妙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的示威游行，几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声讨誓师大会，以及井岗山的“砸狗头”“混蛋”的叫骂声和“上海市的保皇派滚蛋”的岂有此理的大标语，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你们不相信群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运动不明真相、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以反对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而挨骂最多的井岗山红卫兵及所属战斗团也极尽挑动群众斗群众之能事，变本加厉地执行从三司批发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每个革命者应从中吸取教训。

北大必须大乱！然而几天来，北大一直是一边倒！难道大家的意见果真如此统一吗？我们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真正发扬林彪同志所指出的大民主，敢想敢说，不要怕大风大浪，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还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不敢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趋群众运动之势，为了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就要炮轰中央文革小组！

愿中央文革小组开门整风，深入群众，听取批评意见，愿全国人民对几个月的运动来个大检查、大总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过天晴，望东方已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

同志：举起你的双手吧！

《虎山行》战斗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大字报选》，增刊十四期，1966年12月25日，第37-38页。

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二 ——要急刹车，急转弯吗？且慢！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

1966. 12. 10

红旗十三期社论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十二月四日，首都的革命学生把彭真等黑帮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对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必须斗倒、斗垮、斗臭。但是，它似乎给了某些人立即转入斗批改的信号，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批完了，进行斗批改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人正在酝酿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和跟关锋、戚本禹进行辩论的问题，于是他们进行了“急刹车”。这是错误的。

也有一小部分人，本着抓权的目的出发，打算先下手为强，匆匆忙忙地起来了，来一个“急刹车”，这也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不宣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发动群众，势必要有相当多的人要被赶出去，你们这样做是不能完成斗批改的光荣任务的。事实是，现在没有转入斗批改的条件。

进行斗批改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或是群众选举文革委员会，或几个革命群众组织（红卫兵、赤卫队、红旗军）组成联合指挥部。否则群众你斗你的，我斗我的，抓不住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当权派”也分成对立的两部分（这个对立并非敌我矛盾），给坏人造成可乘之机，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

进行斗批改又必须首先弄清依靠谁来斗。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但是前一阶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谓多数派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被说成是“修苗”、“修正主义红卫兵”、“保皇小丑”。多数派本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精神，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少数派去造反，骂人家“假批判、真包庇”，“你们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批判的权利”等等，中央文革与以默认。似乎只有少数派的领导人才是当然的左派，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的，才是真正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才有权利批判？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决不能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前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少数派”单独斗批改，只有重复过去多数派的错误，中央文革仅仅依靠少数派也同样是可悲的。

进行斗批改，又必须弄清怎样斗批改。自从工作组撤出学校之后，中央文革很支持斗批改，特别是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之后，许多学校都进行了斗批改，清华大学一下子把

“黑帮嫌疑分子”送入劳改队；石油学院也是一个典型，他们经过大辩论，定了十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各校都知道了不少打“人民战争”的经验。现在统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或者是阴谋，而坚持斗批改的组织被骂成“修正主义的假红卫兵”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样的斗批改是马列主义的？是阳谋的呢？现在这个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事实是现在许多地方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甚至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一部分人破口大骂，抢这抢那，抄东抄西，有的公然喊出“抢有理，偷无罪”“革命的强盗好得很”。违背十六条的现象在某些程度上还加大了。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群众之间的分歧不是消除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大了。这种情况下怎样正确地斗批改呢？

目前许多群众没发动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思想上尚未得到真正彻底批判，怎能急于斗批改呢？必须实行真正的大民主，而不是假的大民主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担心再大民主下去，明年四月以前完成不了斗批改的任务，实际上越不发扬民主，越不能达到统一，欲速则不达，只能是“乱无终日”。为此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和革命群众一起，进一步研究解放少数派，多数派“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犯错误的干部问题。清华现在开展解放“黑帮”的辩论很重要，要解放大多数干部，必须进行辩论。

中央文革小组对目前的形势如何估计，你们也同意“急转弯”吗？

最后赠一条语录与中央文革小组共勉：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1966.12）

与中央文革小组商榷之三

——是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还是推行谭力夫讲话的错误？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四军战斗队

1966. 12. 10

目前，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高潮似乎已经过去了，好象谭力夫讲话已经批倒、批臭，谭力夫是修正主义分子已经定案，只等运动后期处理了。

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希望“左派”给我们以发言权，有错误请大家批判。

谭力夫的讲话许多地方有严重错误，在理论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违反十六条的，在实践上则适应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需要，被其利用，为其服务，必须彻底批判，消除余毒，现在谭力夫已检查了两次，我们欢迎。

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以红五类自居，宣传“鬼见愁”对联，又以为自己与前校党委黑帮进行过斗争，就自命为自来红，坚定的左派。

另一个错处是，对待出身不好的人，主张七斗八斗触及灵魂，以此达到团结大多数。

第三个错误是，因为工作组支持了红五类子弟，使他们翻了身，处于领导地位了，有了“既得利益”了，于是对工作组就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保字当头等等。

但是，在于有些人口头上批判谭力夫讲话，而行动上推行谭力夫讲话。请看！这些人自以为是“少数派”，批判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自命为当然的“左派”，“红色司令部”。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他们到一处，不做社会调查，不做阶级分析，见了“少数派”就支持。须知少数派中也有左、中、右之分，尤其是工农兵中的“少数派”更与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内的学生中的“少数派”不一样。这种盲目的“少数派”优越感，不正是自来红的新形式吗？与谭力夫讲话的第一个错误是一样的货色。

这些人刚一解放出来，就大骂“多数派”“保皇”、“修苗”、“右派”，他们开大会搞批判，而把多数派置于一旁，或“批判”一通。他们有时也忽然提出“团结大多数”，但前提却是多数派“低头”“投降”，而中央文革某些人甚至说什么“我们要是你们，早就加入他们（‘少数派’）的组织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不能向自己低头，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谭力夫讲话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此，而他们也不例外。

这些人口头里叫喊“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但造谁的反呢？事实证明，他们只能造别人的反，不能造自己的反。他们原来在受压制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要造反”，而一旦掌了权，有了“既得利益”就“保”字当头了。现在有人竭力“保”中央文革，甚至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要求别人支持你们，你要没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何必要人“保”呢？为什么不号召大家起来“反”呢？真正批判“讲话”的错误，就应该丢掉“保”字，大立“反”字，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错误，应当着重指出，只是表现在“少数派”中一部分人身上。但是他们是无罪的，错误要由中央文革来负，为什么全国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了“讲话”之后，还会犯相同的错误呢？

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一条在于有些人不是真正批判“谭力夫”讲话的错误内容，和错误影响，而是揪谭力夫这个人。这些人热衷于给谭力夫扣上“修正主义红卫兵”、“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全国通缉，甚至利用有人给谭力夫之父谭政文（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已故）的一张大字报把谭力夫说成是“黑帮崽子”。我们看过那份大字报（再未见过第二份给谭政文的）主要讲的是生活问题，请问谭力夫的政治观点与他父亲的这件事有多少关系呢？这样做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把谭力夫搞臭。

更使这些人感兴趣的谭力夫的后台。中央文革一开始就怀疑他有后台。后来谣传四起，什么“谭力夫、刘涛在广州会议”呀（所谓秘密军事会议），什么“地下司令部”呀，什么“与刘××有特殊关系”呀，等等，等等谬论。所有这些中央文革不但知道，而且某些人也捕风捉影地说一些错误的话，起了极坏的作用。这种宣传显然收到了“效果”。原来有些根本不知道“谭力夫讲话”的人也煞有其事地把它说成是“大毒草”。一提起来就要骂几句以“划清界线”。后来他们发现无后台可追，“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是的，谭力夫的讲话代表着一种思潮，不是一个人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某些同志不应该过早地定框框，说他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更不能说“鬼谭力夫”，后来有人利用这些名词，把持有与他们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谭式人物”“鬼谭力夫们”借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为了消除这一恶果，我们强烈要求中央文革与谭力夫平反，这是关系到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的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最后，赠一条主席语录与中央文革某些同志共勉：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该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战斗队编印。

林彪副统帅也是可以批评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 刘中桓 杨川昭

1966. 12. 11

批评不是攻击，更不是反对，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两同志《致林彪同志公开信》应该肯定是一个革命行动，这个行动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在这里，他老人家明确地教导我们，提意见本身是革命的，无可非议的，至于所提之具体意见如何，那可以商量辩论。

给党的领导人提意见，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而给威信蒸蒸日上的林副统帅提意见，尤其是值得肯定的革命行动。

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区别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的一个显著标志。认真的批评，就不管错误缺点的大小。职位高低，威信的高低，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有什么深远意义呢？

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对于领导干部是有益的、必要的。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

千千万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衡量我们的干部才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这样才能确保毛泽东思想一代一代往下传，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

有人说这封公开信居心险恶，是射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我们说：“这封信表达了两个作者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责任感，通篇洋溢着革命热情。

有人说：“林彪同志批评不得，”我们认为不对，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毛泽东思想。谁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批评谁。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祖国江山万代赤红。有的同志说：“不能给林彪同志贴大字报”，我们认为可以贴，贴大字报不过是批评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对林彪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可以贴。

纵然，伊林、涤西两同志提出的意见，一些同志真不同意的，也不能由此否认写公开信的革命行动。

我们是同意两同志的一些看法的。曾记得《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客观上援助了工作组，帮助他们镇压运动。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发表讲话，随着很多地方的当权派，就利用这篇讲话，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起劲地抓起一小撮右派来，给许多革命群众以很大的压力，很多地方的学生，工人炮击省市委的运动一度处于低落，最典型的是湖南，张平化照林彪同志的讲话做了一个报告，湖南就狠抓了几天“右派”，至今还有一些人，仍利用林彪同志这篇讲话，来攻击造反派，我们看林彪同志的这篇讲话，客观效果是不好的。

肝胆之言，是否像反革命，请大家斟酌考虑。

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

1966. 12. 11

编者按：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11月3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见革命小将的大会上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是毫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我们副帅的指示，给了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我们遵从林副主席的教导，勇敢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我们的质疑；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江青同志：（注原话摘录）“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谈谈心……你们不要记录，不要抓我的小辫子。”

（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为什么怕人家抓小辫子呢？告诉江青同志，你既然对三司的左派坦率陈词，为什么怕揭露给非左派呢？你怎么看待非左派的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

“因为我们支持了你们，向你们学习，就有人说我们是你们的后台，这不要紧……我们对你们负了政治责任，而你们也同样，也对我们负政治责任。”

（按：中央文革对左派负了政治责任，对大多数群众也负了政治责任吗？是放手让他们“万类霜天竞自由”还是“踏雪寻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央文革若遗弃大多数，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你们看过西游记吗？（众答：看过。）我有点像西游记的孙猴子，身在水帘洞，心在取经僧，我心里总想着你们，九月份……听说你们静坐斗争了十几天，（问：在国防科委）不，不……何长工，对地院同学受害（声音已变），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同志们！如果我不是××××就要和你们坐在一起（激动地哭起来，全场为之落泪）。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受中央常委管制的，我们好比孙猴子，被唐僧赶回了花果山水帘洞，心里总是想着取经的僧。你们不是唐僧，是革命的先锋，我们心一直跟着你们的。”

（嗟夫！如此英雄侠义，盖世难觅；救命恩人，原在这里！你救了我，我保卫你，何惜肝脑涂地！试问教我们感激你的小组，还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你们最近出了些不好的苗子，就是分不清敌、友、我，这是策略问题；就是这里打一枪，那里打一炮，目标不太集中，就有点使人忧虑……例如清华同学，七号你们发了一个明码电报，反对我们的总理，上面还打了×××！最近农大有个叫伊林的，贴了我们副帅的大字报，你们与坏人作斗争，调子越来越高……你们辩论过谭力夫、伊林；你们为什么不批驳他，你们革命还能革到哪一步？批判他，你们有没有气度？”

（按：分清敌、友、我，这是策略问题吗？是因为目标不集中吗？——〔反对我们的周总理〕，这难道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存疑：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伊

林，那个用花更大力气？中央文革封选的左派，一切都是策略问题。“保守派”！你们的一切都是立场问题，必须检查彻底，再彻底！）

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讲战备问题很重要……

江青：“战备问题……”

够了，勿须评下去：

少数派=珍珠，多数派=鱼目（一文不值）

少数派——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冲劲，革命组织好得很！

多数派——统战对象！赶快解散，投奔“左派”，否则——“你们能够自立吗？”（戚）

同志，你仔细想一想，不批判错误的东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不到贯彻，文化大革命如何能进行到底？

清华大学红卫兵《雪莲》战斗队

1966年12月11日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

也问中央文革（二）

——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

北航红卫兵八一野战兵团

1966. 12. 12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红旗，红书，红袖章，红人，红心，红思想，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是顶天立地的红卫兵。

红卫兵是革命造反大军，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资本主义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旧意识形态的反，大造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

今天，我们就要大造旧民主的反，因为它不适应阶级斗争的发展，因为它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因为它更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它势必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它限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大破旧民主，大立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的大民主。这种民主是充分相信群众的。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这种民主比其它任何民主更为民主。人们完全有各种行动、言论（除反革命的）自由，甚至有组织政治团体，批评各级领导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必定有最高的集中，这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再高，官衔再大，谁要违反毛泽东思想，不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就要批判，就要斗争！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

今天阶级斗争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和平演变”与无产阶级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阶级敌人“宫廷政变”与我们镇压“宫廷政变”的斗争。今天的阶级敌人的特点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样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应该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力。”这样就使一切牛鬼蛇神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也逃不掉。”

今天，是人民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是工农兵群众直接走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的时代，时代要求我们进一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铲除产生官老爷的社会基础，使每一个干部都成为焦裕禄式的真正的普通“中央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什么首长之类，使群众的每一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管理国家大事。只有给予群众无产阶级大民主，并在群众中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解放生产力，继续推动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只有在思想上得到彻底解放，才有可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永远彻底的翻身，正如林彪同志所指示的一样：“中国人民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树立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革命造反精神

万岁”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算是思想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只有充分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才有可能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集中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在六个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直领导着我们为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而奋斗。

毛主席支持了北京大学七位革命同志的“北京公社宣言，”给予了人民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的权力。

毛主席撤走了工作组，给予了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权利。

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接见了串联的革命师生，给予革命师生群众拉起队伍南征北战干革命的权力。

我们红卫兵要为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争无产阶级大民主而决一死战！

无产阶级民主得到最充分的发扬吗？没有！没有！现在我们没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没有保卫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的民主，没有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动不动就给你冠以“保皇派”的帽子，动不动就给你封上“修正主义”的头衔，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又总是尊称你为“受蒙蔽的保守派”。“保皇”在我们身上挂不上号！谁对牛鬼蛇神最仇恨？是我们！谁对旧教育制度最仇恨？是我们！不畏冰封雪压英勇不屈斗黑帮的是我们！不畏风浪大，揭杆而起竖起《红卫兵》大旗的是我们！横扫四旧，大立四新，最先走向社会上的斗批改的是我们！对资产阶级当权派，我们要把他们砸个稀巴烂！对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就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未分清性质的当权派，我们就主张先揭发，后定案。我们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我们反对的是主观盲动的小资产阶级的造反兴趣，这样才能防止阶级敌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才能集中火力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造反，造反，你脱离了毛泽东思想就造反无理。所以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就要反对，就要批评，就要指正。我们要求无产阶级民主，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今天是我们还没有向上级汇报情况的民主，没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主，还没有批评和监督上级领导的民主。一给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就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牛鬼蛇神，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各级领导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应该批判，这样才能防止干部蜕化变质“和平演变”才能彻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求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我们要向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民主呢？还是要坚持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引下的小宗派的民主呢？

中央文革小组过去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而某些同在这段时间里实质上树立了小资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怀疑一切”（实质上是否定一切）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观思想，“一切权力归左派”（多数就无权了吗？）是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自私自利思想，“红色恐怖万岁”（是指向群众的，而不是象前级段指向地主、资本家）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报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所欣赏的“革命造反精神”。

真正的红卫兵战士们！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资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替换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思想任人偷梁换柱吗，任意篡改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被人断送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我们要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

只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才能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能挽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战士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大民主正是为无产阶级事业开山劈岭，铺筑大道！

风暴险关学闯道，冰山绝顶要开花。

红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大民主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问中央文革小组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

1966. 12. 13

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我们陆续贴出了《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中央文革小组中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我们坚决支持。同样，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能不说；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要坚决抵制！

我们是运动的实践者，是一个群众，对身边的事清楚，体会深。我们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问题、批评和监督，正是我们对党对人民负责，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还很年轻，主席思想还没有学好，甚至有错误。但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坚信真理，修正错误，坚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胜利！

在我们《三问中央文革小组》贴出以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但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错误的思潮。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再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下问题：

一、我们在一二三问中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当前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是不正确的吗？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直到现在对这些问题不回答不表态？是真正准备采取共产党人的态度欢迎来自于群众的批评监督呢还是反对呢？

二、在我们《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刚刚贴出以后，马上遭到猛烈的围攻，在《二问》《三问》相继贴出以后，现在又有更大规模的围攻现象，把我们诚恳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提意见诬蔑为“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写出各种各样的大标语，什么“砸烂你们的狗头”呀，“你们是反革命”呀，“八一纵队的一小撮混蛋们，你们没有好下场。”有的甚至叫嚣“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宰了他王八羔子”……满城皆是。总之，开动了大量宣传机器，大骂八一纵队……

扬言要“抄”我们，要“砸”我们，跟踪我们，绑架我们……我们刚贴出大字报，马上有人用大标语覆盖上，有的甚至刚贴出不久，便被撕得干干净净。

有人还造我们谣，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那些人为什么这样惧怕我们的大字报？这些现象你们看到了吗？了解了吗？这是正常的吗？你们是默许、支持还是准备制止反对这种现象呢？

三、目前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不是有人又在以新的形式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我们大字报有错误，欢迎批判。但目前的做法不是用毛泽东思想，不是用“四大”作武器，而是围攻、压制、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又出现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是谁的责任呢？

四、出现了这种大量的围攻现象，搞得最激烈最凶的是以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少数派”。难道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最支持最关怀的所谓“左派”就是这个样子吗？他们又一次把矛头指向群众，这种做法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五、毛主席教导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群众对领导机关的批评监督，下级批评上级，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及其重要的保证。难道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同志就没有缺点，就没有错误，就没有一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吗？就批判不得吗？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人家话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为了更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更应当热情地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评吗？

十六条中指出：“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正是说明了运动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应当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这样才会把运动领导得更好。

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指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就是必须批判

清华大学红卫兵红旗手战斗队

1966. 12. 14

中央文革小组在前段（尤其是十月份以来），支持了造反派（少数派），大大解放与助长了其造反精神，同时犯了路线性甚至有些是方向性的错误。

（一）

《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放手让群众斗争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进行斗批改。现在看：中央文革错在哪儿：

一、缺乏全面调查研究，缺乏明确的方向性指导。

中央文革本应该统筹全国，广泛倾听群众意见。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比如在不同的“派”中，中央文革则常听少数派的，而没有好好听多数派的；有的中央文革有些同志接见革命群众时，很缺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精神，而是哇喇哇喇乱发议论，戚本禹同志11.12讲话就是一个典型。在全国，基本上是坐等来京汇报，请愿，控告。张春桥同志上海之行也是等到形势危急才去的。毛主席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由于中央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故也缺乏明确的部署与方向性指导。

二、不相信群众，没有广泛放手发动群众。

中央文革竭力支持了少数派（指工作组在时被打击压制的）（如北京三司）（如关锋所说，如果中央文革垮了，他们又将会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大功劳。然而它是片面的支持少数派，而甩开多数派（指那些受工作组错误路线蒙蔽过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成了少数派的事，他们纵横全国各地开大会，出广告，下通牒，抢材料，真是杀气腾腾，“所向披靡”，可保字号的多数派只是在一旁观望，“触及灵魂”，各单位运动不能广泛深入。这里除了多数派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外，和中央文革的领导是分不开的。10.6三司开大会，中央文革全体组员参加，10.9一、二司开大会，却没有一个“光临”，平常少数派要求接见，简直易于如反掌，而多数派却难上加难，……如此等等。为什么？原来在中央文革不少同志眼里：多数派太差劲，“保呀，保呀”而且其中还有“假红卫

兵”，“修正主义红卫兵”。而少数派呢？那是革命的“主力”。就是在这个低估多数派的革命积极性，实则是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指导之下，中央文革未能广泛地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抬高少数派，客观上压制多数派，现在在少数派中，也发动的不够，不少中央文革同志（如关锋、戚本禹、王力）很喜欢抓头头，授秘计，不可避免地出现少数派某些头头（如蒯大富）神秘化而脱离群众，甚至有时运动群众。

三、不是真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甚至有些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摘自十六条）中央文革支持少数派，解放了少数派，但问题就在这，少数派是中央文革硬保过来的，而不是中央文革在毛泽东思想的高水平上给以好好的指导，使之充分地接受两条路线斗争经验，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不是吗？不少文革小组的同志惯于找少数派的头头们暗授秘计，喜欢为之解决具体问题，定框框。如司令部解散问题，名字问题，整风问题，联合问题都有文革小组同志的旨意（“井冈山”传达的11.19，11.20讲话——绝密材料就是一桩）。这样少数派（如三司，井冈山）头头貌似深谋远虑，实际上原来是一身框框，这样怎么能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增长才干，学会斗争呢？由此看来，他们重犯了多数派头头所犯的某些形“左”实右的错误是难免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几次大反复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了外力的作用，小反复更是这样。有如：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辩论刚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如陈伯达，江青，关锋）就给定了调子，后来越提越高，堵住了不少人的嘴。关于“谭力夫发言”的辩论也刚开始，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就在辩论会上定了调子，以后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也定了调子……等等。即使是调子本身是定得对，也不利于发扬大民主，充分利用“四大”武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四、严格说来，中央文革犯了方向性错误。

十六条指出“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前段“保皇派”“修正主义红卫兵”等帽子满天飞，向多数派频频袭来，促进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加剧，陈伯达同志在9.25对重大“八·一五”讲话中指出有“修正主义红卫兵，假红卫兵”就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线。“谭力夫发言”有严重错误，且传遍全国，当然需要批判，但是中央文革除了先定调子外，没有因为谭力夫是学生而引导群众注意策略，相反，陈伯达同志却说：“你们不把谭力夫批倒，你们还搞什（斗争）么革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也讲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话，由此大大加剧了不少人（尤其是少数派）对谭力夫的敌对情绪，以致引来各种各样的对谭力夫的漫骂、讽刺、挖苦，不是为了“达到既要弄清思

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泄私愤图痛快，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直接违反十六条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方向性错误。

（二）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什么前段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迟迟不能深入发展？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失败后，越来越顽固，甚至其表现形式转移到少数派方面？为什么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普遍深入人心时，两派对立情绪有些加剧？为什么全国各地武斗现象越发严重？……这里尽管有其它原因（如还有个别党委领导继续执行反动路线，有些群众还受蒙蔽），也与中央文革的某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与领导分不开的。

（三）

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会犯有这些错误？这里未能做具体深刻分析。一般说来，错误的根源是：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理解不够，或者有所理解了，但贯彻，执行得不好。而根本上还是有些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未牢固确立起来，甚至夹杂着“私”字，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有所反映，故而出现了这样，那样，或形“左”或右的错误。

最后愿以几段语录共勉。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反对自由主义）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原载《毒草集》（油印，1966年12月）清华大学汽六二：“八·八”《7623》等编印，（1966.12）。

1967 年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原载《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

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1. 18

编者按：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一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

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

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还是它，使许许多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同志至今坚持其错误。还是罪恶的它，使多少同志至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面畏缩恐惧！

同志们，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那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全市的革命造反派们，你们不是要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吗？你们不是要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共同战斗吗？那么，你们就掀起一个狂涛巨浪，彻底冲垮反动的唯出身论的堤岸吧！到了那一日，千百万群众就会冲决束缚他们的一切，和你们汇成一股不可抗御的力量。也只有到了那一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会彻底被葬入坟墓，中国的颜色才永远永远是鲜红的。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的《出身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说，它的出现好得很！它宣告了反动的唯出身论的破产，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出身论》敢于冲破社会上旧的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尚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反动唯出身论宣战，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

《出身论》的出现，不免要被一些人认为是株大毒草，但这算得了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也曾被认为是毒草，然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人民的指导思想。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深信：反动的唯出身论虽然貌似强大，但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它只是一只腐朽的纸老虎，革命的《出身论》今日虽是星星之火，明日必成燎原之势。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作者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有限，由于对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全面。《出身论》必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不完美的地方。我们热切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的武器来衡量它，并真挚地欢迎同志们对《出身论》提出批评。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我们不能不予以揭露、批判，起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面我们就从毛主席著作和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 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幅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幅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有人说这幅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毛主席说，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它起没起过好作用，要看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受到了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党的雨露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滋润着这棵新生的幼芽，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以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

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列宁就是例证。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能忽视我们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之中。我们的文化教育制度正待彻底改革。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同属于一种错误路线，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并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号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二. 重在表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理由驳倒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也驳不倒现在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也不得不赞同出身和家庭影响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重在表现”的几个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后来听说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可见他们对这项政策根本不理解。让他们来解释这项政策，就必然会任意歪曲。限于篇幅，这里只检查三种提法，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1. 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

貌似公允的同志常对出身不好的青年这样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1】这是不看对象。

江青同志解释过这句话。她说：这是对背叛本阶级的个别分子讲的。江青同志的解释是甚么意思呢？举例说，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成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代公民，成了工人阶级杰出的领袖。巴黎公社中也有一些本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委员，但他们是工人阶级公社的代表。我国革命时期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能不能因为他们成份不好而抹煞他们的历史功绩呢？不能！我们要重在政治表现。这就叫“不唯成份论。”我们认为相反的情况也使用于这个公式。对成份是矿工，但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分子，也要重在表现，也没有一点可以轻恕他的罪恶的理由。小而言之，李鼎铭是地主份

子，但他向边区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主席赞扬说：“不管什么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人害人，亦即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归为哪一范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说：“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此可知，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不见得就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这一点连阶级敌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例如，运动期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道，一个反革命富农分子，因为三个儿子检举了他，夜间持凶器砍死、砍伤了他们。又据一份传单，市内某公社工厂书记——一个蜕化的变质分子，临自杀前，亲手溺毙了自己的孩子。他在遗嘱中说，孩子长大也不会为自己报仇的。

出身和成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甚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那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份论都没有道理，那么为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有些人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地主、资本家他们长期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因此，他们要想重新做人，就必须脱胎换骨地改造，这也就是我们“有成份论”的根据。但是对他们的子女，就不能这样看了。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份”，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的同志不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份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在本文第一个问题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绝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如果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超经验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看一看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吧，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这唯一的标准是出身吗？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出身这一条吗？

十六条中的第五条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谈到要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反对什么人，有出身这个根据吗？

革命左派的三个标准，有出身这个标准吗？没有！完全没有！出身好坏与本人革命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即使出身不好，一样可以是革命左派，可以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可以是革命的依靠对象。【2】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卖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 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之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陈伯达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泽东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象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

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月饼而已。【3】

我们必须相信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说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 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吗？于是谭力夫也说 he 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上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北京日报》也大登红五类出身青年的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 “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二. “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 “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 “……”。假使这就算迫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样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之时，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此。根据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搅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

因，答曰：“我出身不好，别人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話，出身好的是影响問題，出身不好的是本质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并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出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4】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此。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5】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被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密切到这个地步，“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驳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这正是修正主义分子一手造成的；那么，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压迫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呢？这不奇怪吗？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对于实现复辟阴谋，不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哪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这些阴谋家便慌了手脚。当前矛头指向谁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他们所包庇的牛鬼蛇神。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份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份当成了儿子的成份。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不顾中央指示，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密锣紧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便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的挂羊头、卖狗肉、捣乱视听的金字招牌！党中央正确指出了他们推行形“左”实右路线，这便是其中一个渊源。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弟便只好是第四、第五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那些表现是本质的，那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这套做法，也正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奏。【6】我们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要还是从右边抹杀了阶级路线。因为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入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都感到自己是无辜的罪人，低人一等，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室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

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迫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更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 1967年1月18日

1966年7月初稿

9月定稿

11月修改

【1】《出身论》刚发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团中央九中全会上讲这个话的李雪峰及其一流人物，现在都成了怎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

【2】《出身论》刚刚张贴时，在这句话的旁边，写满了“大毒草”、“胡说八道”之类的话，发泄够了谭力夫之流的廉价的愤慨。他们有眼光，因为这正是《出身论》的主题。可是历史毕竟是无情的。今天不少红卫兵组织已经引用这句话做为自己的组织纲领了。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宣言写道：“过去的红卫兵组织只能由所谓‘红五类’子女组织和参加，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是要造它的反。”谨向这些组织的大无畏的行动，致以革命的敬意。

【3】“自来红”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4】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

【5】我们建议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做一下社会调查。可以在本单位调查一下出身好的青年多少人？出身不好的青年多少人？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是多少？党团员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因为出身不好而限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此外，还可以翻阅一下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国青年》等刊物。同志们可以看一看，在这样的被修正主义集团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阶级路线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和我们今天某些人的观点是何等相似。

【6】 在我们历数修正主义集团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状的时候，竟然有人指责我们为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直到现在还认为压迫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大功一件。要说谁迫害了“狗崽子”，按照他们的混蛋逻辑，那不是给谁涂脂抹粉又是什么？

谈“纯”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2. 02

联动是声名狼藉了，但联动的原则还被某些人奉若神明。不是常常听得到这样的怪论吗？“你们组织的成员都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回答：“什么出身的都有。”于是乎他们就会大摇其头，说：“不纯，不纯！”

“不纯”？这个词多么耳熟！

窃据了中央文革副组长、全军文革组长的刘志坚不是大讲红卫兵的出身要纯、纯、纯吗？谭力夫不是也要他们那一伙纯、纯、纯吗？联动更纯得可以。要是谁的老子没有福气当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连边也不要沾。可惜！提倡唯出身论的纯字号的人物，大都没落到好下场。不论他们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的，但我们推测，和唯出身论的思想基础总是沟通着的。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假使有功夫，同志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且不提。有趣的是：今天大力提倡“纯”的，已经不再是联动诸公了。他们的老子是英雄还是反动，实在大有讨论的必要。假使老子反动了，还偏要喊“老子反动儿混蛋”，混蛋的口号还能算数吗？所以除非是毫无羞耻之心的，多半不挂老子这块金字招牌了。实际上，今天继承联动衣钵的，往往是被联动排斥过的，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激烈反对联动的那样一伙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了。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危害大众的东西，大公无私的人要造它的反，私心杂念颇重的人有时也要造它的反。前者提出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后者的口号是“造反有利”；前者要粉碎的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说：“我们要取消一切特权阶层”，后者要取消的只是它的表面的一部分，他们说：“为什么你是特权阶层，而我不是”；前者要扩大革命队伍，并把表现杰出的同志吸收进来做中坚，后者则采取关门主义，唯恐人多手杂碰掉他们自封的乌纱帽。一个坦荡荡，一个长威威，同是造反，本质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也。

那么，你们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不是反对纯洁阶级队伍吗？非也！我们是坚决提倡纯洁阶级队伍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决不允许一个剥削阶级分子混入，但是我们的标准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你们的标准，唯一的就出身；我们的标准，唯一的就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根本的分歧。

你们认为出身相同的人都是一个阶级的，出身不同的人都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认为：是不是一个阶级的，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致的目的、纲领、方向、行动，而不是看他们的出身。出身相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相同；出身不同的人，以上这些不见得不同。出身于高干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谭力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贫民家庭的，就都是一个阶级吗？时传祥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就都是同一个阶级的吗？赫鲁晓夫也跟你一个阶级吗？出身不好的人就跟你不是一个阶级了吗？

王光华烈士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毛这些伟大的导师也不跟你一个阶级吗？按照你们的标准去纯洁你们的“阶级队伍”，势必把谭力夫、时传祥、赫鲁晓夫都拉进去了，势必把王光华这样优秀的战士都排斥走了。下过这么一番去粗取精的功夫，你们的队伍将会纯洁到何种程度，等你们冷静下来自己做结论去吧！

依照我们的标准纯洁阶级队伍，就不会发生你们的弊病。我们的标准就是一个，这就是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拥护它的，我们吸收；反对它的，我们不要。执行它的，我们吸收；抵制它的，我们不要。特别是在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吸收，不高举的我们不要。这样，我们的队伍就会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硬如金刚，纯洁似水晶。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这就会是一支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的确，我们的成员出身是不同的，不同的岂止是出身？性格、年龄、经历、性别等等不同之点还多的是。但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好象是一种元素，在这毛泽东思想的大熔炉中，经过一番冶炼，就会变成一块再也分不开的化合物。这个化合物比起以前单个的元素来，真不知要强硬几万倍。

的确，你们的成员都是相同的，但共同的思想基础却不见得相同。你们不能熔炼成化合物，而只是一堆貌合神离的混合物。你们当然可以夸口说：“我们的颗粒都是圆的。”但也只是圆的而已。雨一淋就会流掉，风一吹就会扬开。实在成不了事业。

目前，正当左派大联合，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全面夺权的时候，还有人企图图“左”实“右”地混进阶级队伍，大讲唯出身论的“纯”，我们对他们的最好的回答就是：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1967年2月2日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

——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2. 10

去年十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出现了几个跳梁小丑，这些小丑是西城、东城、海淀三个纠察队阴魂的化身，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诽谤中央文革小组，辱骂亲爱的江青同志，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查抄革命组织，散发反动宣言，种种罪状，举不胜举。这些小丑，就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们以自己的滔天罪行，招致了革命组织的共同征讨，招致了西纠、东纠、海纠等革命组织相同的命运。如今他们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在群众之中，“联动”已经成了反动集团的代名词。各种小报，无不罗列他们的丑事。唯有知音，也远在大洋彼岸，实在爱莫能助。用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的话来讲，算是咎由自取。

从联动表演的乌烟瘴气的场面里能让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在我们与之几个搏斗的回合之中，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我们不由得想起列宁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示了一个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剖析一下联动的本质呢？

迄今为止，正因为没有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从思想上击溃联动，所以他们还不服气，还在没落中挣扎，还在失败中狂吠，还在梦境中描绘凯旋的场面。正因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揭露他们，没有触动他们的灵魂，所以至今还有一批年幼无知的小家伙，心甘情愿地充当殉葬的金童玉女，并且还准备继纠察队和联动之后，成立其他换汤不换药的组织。从理论上击溃联动，显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任务。

用阶级观点分析联动，对于那些只善于贴阶级标签而不会做阶级分析的同志是个难题。假使联动分子都是些黑七类狗崽子，那也就另当别论；可是，他们偏偏是出身在光辉耀眼的家庭里，他们的老子都是十三级以上的大干部。说他们要复辟，要阶级报复？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太坏，打上了资产阶级烙印？很不容易为这些同志所接受，于是只好存而不论了。

联动成员不但以自己的出身迷惑了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他们坚持自己的本质是玉洁冰清的，他们犯错误是纯属偶然的。按照最近替联动的幽灵大唱挽歌，抛出“论《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来说：“虽然干了许多错事（即使现在仍发生），但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好同志。”没有疑问，这种不要脸的腔调“表明幼稚比表明恶意更多些”（马克思）。我们批判联动的同时，也不能不对阐明联动思想基础的“评《出身论》”进行严肃的批驳。

毛主席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我们就根据这一教导，尝试一下，怎样应用阶级斗争

学说来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课题。

※ ※ ※

联动的骚乱告诉我们：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是资产阶级复辟力量的最理想的继承人。

“革干子弟是修正主义的宠儿？”清华附中红卫兵受不住这样尖锐的论点，忍不住用谩骂代替了论证：“这些混蛋！”（显然这句话不像是骂自己）。但是谩骂摧不垮铁的事实。请看！

一. 物质上的特权阶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着教育部门的时候，给高干子弟安排了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个新型的少爷阶层。

最近被革命群众查抄的联动老窝——八一学校，就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其陈设之豪华，其生活之优越，完全是培养资产阶级幼苗的理想的温床。“他们住在花园式的校园里，校内有动物园、游泳池、假山、大观园等等。一般教职员工成了某些贵族少爷小姐的集体保姆，动辄遭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辱骂。”（据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传单）每逢周末，小轿车排成一条长龙，迎来送去，川流不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是一个小姐少爷的安乐窝。据云：每个学生除去国家负担吃、穿、住及生活用品之外，还要发给十八——二十五元零用钱。我们可以和下面几个数字做一比较。国营农场的—一个壮劳动力，每天工资八角；一个社员收入比它还要低。一个工人，能够维持生活的费用是每口人每月十二元。但是军工大读书的一个普通学生，只零用钱一项，就达二十几元！这样的青年那里懂得艰苦朴素？怎么不大肆挥霍？只要看看联动开会时，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叼着烟卷，穿着呢子衣服，乱放花炮，大嚼特嚼酱肉、点心、水果糖，便很令人痛心了。此外，高干子女可以任意挑选“理想”的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任意调校。一些培养国家特殊人才的地方，不仅剥削阶级子女无权问津，就是广大工农子女也只占极少数。一个青年人，长时期在这样脱离劳动人民的环境里生活，就必然会象毛主席所说的：“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的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我们奉劝那些主张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

联动的成员之一——清华附中红卫兵不得不承认这一论断。但他们想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不可分割”的论点来分庭抗礼。他们说：张地主的儿子接触的必然是王地主、李地主。这个狗崽子看见自己的爸爸剥削贫农，“想来”是不会感动的。这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论》的读者群主要是今天的青年人。迄今为止，还真没有看到修正主义分子开办过“地主子弟专类学校”。所以张地主的儿子从上小学起，经常接触的必然不是一些地主。而且“想来”也没有“福气”见过自己的老子剥削贫农。但是，这群联动分子的论点对他们自己倒很合适。只有他们才有权力囿于自己的集团之中，连十三

级干部以下的子女都耻于交往。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依靠父母的功勋，享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也就根本不能领会毛泽东思想。

二. 精神上的特权阶层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控制宣传和文化部门的时候，也拼命造就这些青年的贵族心理。

翻开以前的杂志、报刊，回顾以前的戏剧、电影，以教子为题材的故事多得惊人。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某甲，一个出身好的青年被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坏了。某甲的朋友（是个出身相同，而且一点缺点也没有的青年）和某甲的父亲（是个当权派）就开始帮助他了。怎么帮助呢？不是要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是要他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而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于是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前中宣部网罗成群的末流作家，大搞这类作品，难道不是别有企图吗？他们歪曲阶级斗争的规律，要人们相信：老一代死光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敌对阶级了。而高干子弟是最理想的青年，即使暂时有个人落后一些（那时无数事实迫使这群阿谀成性的作家也不得不客观一点），但只要等到打雷的时候一念血书，便可以臻于完美了。假若事情真这么理想，今天的联动问题也就用不着伤脑筋了。可能是血书丢了的缘故吧？旧中宣部如今是批臭了，可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盲目优越感却被接受下来。正如造谣者被抓住了，谣言却被相信了一样，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不少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是不够艰苦朴素的，个别的甚至到了腐化糜烂的程度，当然也有很值得景仰的律己极严的首长，但是因为他们终日为国事操劳，对子女的教育未必是深入细致的，至于一般当权派，大家都深有体会，他们过去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都是不够的，何况对子女？所以，一个青年人，长期在这种经济地位中生活，很容易养成奢侈、放纵的毛病。正如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时所说的那样：“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我们奉劝那些大讲出身好家庭影响就一定好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联动的喉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只承认别人的家庭影响不好，不承认自己的不好。要是他们不把家庭影响神秘化，那么，他们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基础”不就动摇了吗？所以，他们就用上级的口吻教训说：“我们诚心地告诫那些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要革命的青年……和家庭彻底决裂是不容易的，千万不可粗心大意。”真正应该告诫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们！出身不好的青年几年来承蒙帮闲文人讥讽嘲骂，承蒙好心的同志无休止的提醒，对自己的家庭总是存在戒心的。大多数青年是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往往老子说什么，他们就下意识地反对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青年人，是能够在他们的老子磨刀霍霍的时候，把老子揪出来的。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接受了党十七年的培养；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主动地抄了自己的家，向毛主席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是，对于相同的家庭影响，对于那些“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谁

的抵抗力更强呢？你们盲目崇拜自己的家庭，正象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所说的：“我的红爸爸、红妈妈，用通红通红的烙铁，给我打上了鲜红鲜红的烙印！”这样，当你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红烙铁的时候，出身不好的青年可以用反感去抵制的东西，你们就用同感去接受。你们就容易饮鸩如蜜，夜郎自大，放松思想改造。你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你们中间已经形成一道深沟，筑起一道高墙。你们的危险，不在哪一个莫须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拉拢你们，而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季孙之忧不在颡臾，而在萧墙之内，此之谓也！

三. 丑恶的灵魂

长期受修正主义的毒害，长期以贵族自居，长期放松思想改造，势必使一部分革干子弟的灵魂，变得十分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乃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请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吧：

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例如：

浇、烫、烧——浇：被打的人昏死过去之后，用凉水猛浇其身，使其清醒，然后继续逼供拷打。烫：用滚开的水向被打的人头部猛浇，受此刑法后，人的头皮脱落，脸色红肿，胸前背后都是烫伤，惨不忍睹。烧：凶手最初是用一根火柴烧被打人的头发，后来竟发展到用整盒的火柴烧，另一做法是把火柴燃着后，向被打的人脸上按，或向嘴里塞。

吊、踩、刺——吊：凶手有时拿人命开玩笑，将活人做上吊的试验，用绳套套在被打人的脖子上，猛力踢倒他脚下的凳子，使其悬空，吊到半死，又猛一松绳子，使其重摔于地，再找人做人工呼吸使其苏醒继续受刑。踩：被打者躺在地下，几个人轮流踩之，受此害者往往内脏严重受伤，上吐下泄，大便不能自控。刺：凶手用木枪猛刺受害者，直至刺得对方躺下为止。

跪、剁——跪：凶手将凳子翻过来，令受害者跪在凳子上，长时间不得起来。有时令受害者跪煤渣，使跪者两膝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剁：凶手用刀剁受害者背部，直剁得血清渗出，方肯罢休。

磕响头：凶手令受害者给他磕响头，如果磕得不响，就用脚向他头上猛踩，受此刑后，受害者大都脑震荡，记忆力衰退。

诸如此类的刑罚，名目甚多，举不胜举。

再看一看他们是怎样杀死十九岁的学生王光华的，而他的全部罪过，只因为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王光华被带到六中“劳改所”，刚一进屋门，西纠头目之一姜××马上抽了他一巴掌，随后又被带入里屋，令王脱去上衣，解下皮带。这时屋里屋外都有看守，戒备森严，屋里的暴徒均为西纠队员，他们兽性大发，蜂拥而上。拳打脚踢，对王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用木枪向王猛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向王打去，使之无法忍受，倒翻在地。十来个暴徒手持各种凶器进行为时三十分钟的毒打。王肋骨被打断三根，昏迷过去。这时，一个西纠队员一面踢王头部和颈部，一面恶狠狠地说：“触及触及你的灵魂”。有的一边打一边大声怪叫：“要馒头不要窝头”。（即要武斗不要文斗）。就这样王光华被打死过去几回，后经“劳改所”中“黑帮”给予做人工呼吸，才免除一死。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王光华已经面部青肿，浑身重伤，危在旦夕。去厕所时还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小便出血。事态已这样严重，可是一小撮人还不死心，而后，粟××和陈××等又曾殴打王光华，逼他写材料。写不出来仍是一顿毒打。恶毒的看守也为虎作伥。在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下，就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左右，王光华被这群暴徒活活打死了。夜晚，十二点多钟，趁夜深人静，就把王光华的尸体送到东郊火葬场焚尸灭迹。

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的老工人是怎样被活活地害死的。

退休老工友徐需田（七十六岁）于十月三日下午，被六中红卫兵领导，西纠队员王××和陈××带到淋浴室。他们说：“给你洗澡”于是这群暴徒们开始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只听老人惨叫：“冷啊！冷啊！”然后又用滚开的水向老人头上猛浇。王××，陈××等人一面浇一面狞笑着说：“老头子，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人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连声惨叫“热啊！热啊！饶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兽性更是大发，反而浇的更厉害了。老人的头皮被烫去一层。当老人勉强爬向宿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不省人事了。四日早晨，徐要求医治，但他们不许出屋，不给医治。当天十点四十分徐又被王××，陈××等人拉到后院，进行种种毒打和戏弄。他们强迫七十六岁的老工人学哭，学笑，令其吃屎，喝尿，过够瘾后，又把徐嘴堵上，带到后院厕所中，将徐吊死。这群暴徒真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扬言徐上吊自杀了。

老工人徐需田在旧社会里，没有死在国民党侦缉处的手里，侥幸死里逃生。今天，这位有三、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却死在西纠一小撮法西斯暴徒手里（以上均摘自北京六中红旗公社公布的材料）

无独有偶，一中的刑罚和刑具也足以说明与六中比美。而且打死了人，还得让“劳改犯”（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去和死人亲嘴。握手，说：“亲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见一中传单）这就是联动的前身，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称之为“好同志”的那些人！

我们奉劝那些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的同志，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中的这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少。……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

为联动招魂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摆出一副让贤受禅的高姿态，说什么“随着运动越来越触及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已经不能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了”。触及党政军的领导机关，碍高干子弟何事？说穿了，就是这些高干子弟的老子已经成了黑帮人物，再靠“老子反动儿混蛋”吃饭就该打自己的嘴巴了，只得忍痛把他们割爱。实际上，以前谁又承认你们这些“好同志”是主力军呢？这样一些嗜血成性的人配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吗？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我们打人，动机是好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你们打人，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定的“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去打所谓的“反革命”的。不管你们打谁，在客观上就起到箝制了革命群众之口的作用。你们威胁着左派，吓唬住中间派，这是多么为大众所唾弃的效果！你们为了逃脱罪责，妄想求助于别人看不见的动机，那是站不住脚的。你们真的有无产阶级事业贡献终身的动机吗？那么你们的联动就不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了，就不会大冲公安部，就不会高呼：“刘××万岁”了！今天都没有好的动机，难道当初就会有吗？很明显，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做刘邓路线的宪兵队。就是要扑灭革命烈火的刽子手！

我们要郑重地指出：“评《出身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不了整个革干子弟，更代表不了整个红卫兵。我们敬佩那些进行过刻苦的思想改造，不以出身当作包袱的革干子弟。这样的同志，总是革命子弟的多数。因为我们从来就承认社会的好影响是主流，承认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我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我们是承认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我们是反对以出身来分界的，我们没有忘记，运动初期，一些优秀的红卫兵发表过“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他们勇敢的承认自己的家庭影响不是鲜红的。我们也怀着十分的感激心情，铭记着一个来访者——某校高三年级同学的话，她对待人员说：“我是革军的女儿。我完全同意《出身论》。”接待人员问说：“有人说《出身论》对出身好的有压力，那么，你不感到有压力吗？”“不，我不觉得。我只觉得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又可以和我一起闹革命了！”听着！自以为血统高贵的小丑们！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胸怀啊！你们是不配替革干子弟说话的。让你们的大作和联动的在天之灵一起见上帝去吧！

四. 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

正是这一小撮人，在“评《出身论》”中散布流言蜚语，杜撰最高指示，造成一片假象，好象复辟力量的继承人不是他们，而是出身不好的青年。故说什么“反动剥削家庭出身的人即使非常积极，也要拼命看他们的实质。”“不管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革命的重担反正不能落在他们身上。”言外之意，重担他们是挑定了。这显然是违抗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接班人条件的。我们不能不指出，哪些人会变成资产阶级最可靠的金童玉女，也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固定是一些人的。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矛盾。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往往互相区别。这时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期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

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那么，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激化了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像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土改时期，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反右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吗？是像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吗？不是，都不是。固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自有它特定的主要矛盾。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五条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条也指出：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此可见，在目前主要矛盾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正在开展的广泛夺权斗争，说明了这个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我们奉劝那些顽固地坚持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保险，出身越好越保险的同志，大可以休矣！联动的骚乱证明了《出身论》的这个论点：“对于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复辟力量）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这真是奇谈怪论！”在联动的按魂术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这样喊道。他们或许会反问：“谁敢说我们要复辟？难道我们希望蒋介石回来吗？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吗？”替你们说句公道话吧，你们的确不希望蒋介石回来，的确不希望原来的资本家重新做经理。但是，复辟不等于扶持所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莱德有限股份公司股公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的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等篡权分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并不让原来的剥削分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够用吗？他们不是早已建筑了八一学校，哈尔滨军工大这样的复辟温床了吗？西纠，东纠，海纠，联动不就是修正主义合格的苗子吗？你们在“评《出身论》”中，一口一个资产阶级屠刀，殊不知和平演变并不希望刀光剑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王光华，砍死了徐霁田！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或为了执行反动路线的工作队的利益，最后为了你们个人和你们反动小集团的利益，行凶、抢掠、捣乱、破坏，这种种行为，就是复辟！你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不希望蒋介石回来，就不承认自己搞复辟活动。

联动就是自觉地搞复辟活动！当然，这是指他们整个组织而言。至于个别成员，总是有自觉和盲从的区别，自觉和受蒙蔽的区别，改正错误和坚持错误的区别。而清华附中红

卫兵，过去是联动瘟神的膜拜者，不知闭门思过，却等待秋后算帐，不知痛改前非，却到厂矿农村捣乱，拒不承认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平等的革命权力，拒不放弃自己得天独厚的贵族地位，今天又妄想借批判《出身论》捞取发言的机会，当作一根救命的稻草，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告诉你们；如若“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你们“抛到茅厕去”，那就悔之莫及了！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唯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你们读了我们的文章，不要以为这是侮辱你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一种怎样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并成了怎样一种荒唐的观点，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身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1967年2月10日

决派宣言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1967. 02. 10

毛主席最近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它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决派，这是革命派通过“斗私批修”，从造反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产物。决派，这是一个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它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的教导的勇敢的大军。在这个的最后分界线上，一切犹豫的，徘徊的，被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累得精疲力竭了的人决不能与决派同伍而分道扬镳。决派这是要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

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

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的运动。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反对他们，将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地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伟大的中国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活力。……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1967年2月10日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2. 21

《中学文革报》嘱咐我们写一篇悼念郑兆南烈士的文章，这个题目出得好。郑兆南同志的一生是一首壮烈的诗。她把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的英雄业绩不朽！

一、记真正的大无畏精神

郑兆南同志生前是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员。运动初期，她不顾修正主义校领导的重重围攻，贴出了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点燃了本校熊熊的革命烈火。于是她受到了更多的攻击。正当敌我双方斗争激化的时刻，工作队进校了。从此，刘邓反动路线的混血儿——工作队、黑党委、保皇派联合在一起了。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要尽阴谋诡计，分化、瓦解、利诱、威胁革命群众，孤立、诬陷、打击、斗争革命性最坚决的左派力量。文斗不行，又来武斗。他们殴打、折磨郑兆南同志，让她在非人的境地中渡过了四十七天。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才将她“释放”。但他们万没有想到，就在这生命垂危的最后四天里，勇敢的郑兆南同志仍然坚持战斗。她给党写了两封信，控诉了反动路线的罪行，对革命运动提出了不少好建议，信中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的怨艾。就这样，她以卓越的政治表现，写完自己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最后一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早就为革命烈士做出过这样崇高的评价。郑兆南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的一段历史，应该说是一个英雄的历史。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写得出来的。而郑兆南同志要达到这一步，需要比一般的同志多花费一倍的勇气。她每向前一步，都更容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都更不容易为习惯势力承认与谅解，其本人也就很容易产生自卑、沮丧、失望乃至麻木的情绪而不能自拔。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无论是传单、是标语、是发言、是议论，我们不是听熟了这样的观点吗？“黑五类狗崽子，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彭真集团一贯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这股阴魂还大有可依附的躯壳。当时炙手可热的刘少奇、李雪峰也大讲革干子弟的优越性，秉承他们“圣旨”的团中央甚至把出身好当做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可是多么奇怪！一个地主狗崽子，竟然敢于冲破层层网罗，挺身而出，给黑司令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真是想翻天了！无怪乎工作队的负责人，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有持无恐地说：“可以整郑兆南。她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有小辫子在手，就是整错了，也没有妨碍！”象她出身这么糟糕的人，不积极，是真右派；积极，是假左派。何况还不“老实”？

是的，是要老实。不过要看对谁老实。革命的青年要对毛泽东思想老实。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热和光。请问唯出身论的同志们，你们何必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此偏

爱？为什么只让他们独享毛泽东思想的光和热？你们可有这样的好心肠吗？没有！那么，你们就是要他们和你们一样，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忠实的工具、打手。这就是你们的“老实”！郑兆南同志不做这样的老实人，她就是要说，要动，就是要向你们的主子投以长矛和匕首。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冲动，甚至撒娇、骄横、耍无赖。因此很难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宁可相信后一种人而不可轻信前一种人。假如不具备炽热的无产阶级感情，假如不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郑兆南同志正是一个真正无所畏惧的人。她十分清楚前途的崎岖。她在第二封遗书中分析过当时的思想动态：“拿我来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把这些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但是，郑兆南同志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她没有被这些制人于死命的包袱所压倒，她“听了动员报告，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它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的春笋，形成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郑兆南同志就这样毅然决然地敲响了战鼓。

二. 论重在表面和重在表现

面对这样大无畏的宣战，牛鬼蛇神颤栗了。郑兆南同志在遗书中如实地描叙了这一时期修正主义当权派的活动：“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怎样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当权派从自己乌七八糟的武库里，为工作队和保皇的赳赳武夫们寻找弹药了。那便是他们过去从小汇报中汇集起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不贯穿修正主义决策人所倾心的“重在表现”这样一条黑线。

先谈谈小汇报制度。单有一群“积极分子”，这是最受反动主子青睐的“大有可为”的人物。他们以搜寻小是小非、琐琐碎碎的新闻为能事。动辄运用他们的“天才”，加以夸大、渲染，以便于他们的上级随时利用，务使人人变成不敢造反的谨小慎微的君子而后快。小汇报制度首当其冲的牺牲者，除去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坚持正确立场的革命左派外，就是无论是否是左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汇报他们的情况，是很容易被认为有“阶级感情”的。郑兆南同志二者兼而得之，问题也就更“严重”了。

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她曾用苏联画报包过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再比如：她指导学生批判某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油印时没有加按语。又比如：她曾在几年前的一堂课上说过一句错话（天晓得他们的记忆力怎么这样惊人？）有了诸如此类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独特的分析，巧妙的总结，聪明的臆测，精心的杜撰，无耻的捏造，就不难做出尖锐的结论了：“反党”！

这就是修正主义集团最得意的“重在表面”政策。这条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上面所谈的只着眼一个人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例如他们把教员和学生的矛盾，干部和工人的矛盾，低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的矛盾，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矛盾，等等，这些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到对抗性矛盾的地步，“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挑动一部分人斗争另一部分人。我们在《出身论》中谈到过，一些中下层干部和群众“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他们就是这样菽麦不分，把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的郑兆南同志打成“反党”分子！

《中学文革报》记者为我们走访了郑兆南同志的各届学生。其中有党团员，有革命造反派。看一看他们是怎样回忆烈士的吧！

一位同学说：“郑兆南同志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在我入团的时候，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最痛苦的时候。我到底在她的帮助下，检举了贪污的父亲！”

又一位同学一往情深地说：“有一幕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次我们去过队日，给烈士墓献花圈。在出发前下起雨来。同学们犹豫了。可是郑老师脱下雨衣来盖在花圈上，淋着雨，领我们走了。这次队日活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班上发生过一次丢钱的事，”一位同学陷入沉思中。“大家猜疑起来。郑老师知道了，便在晨会上给我们宣读几则毛主席语录。她说：‘请拿钱的同学再好好学习学习这几段语录。如果想通了，我劝你把花剩下来的钱不要再花了。如果彻底想通了，可以把钱交给我，我负责保守秘密，不损害你的名誉。因为这证明你提高了觉悟，还钱的勇气是大于拿钱的勇气的。’不到中午，钱就还到郑老师手里了。”

“郑老师在五年前就用主席语录批改作文了！”许多同学都这样说。这就是郑兆南！这是她多年以前刻苦改造自己的结果！这是她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结果！

这也许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是比较起五十二中黑支部所提供的“弹药”来，哪一个更能代表郑兆南同志的本质呢？哪一个应该算做“表面”，而哪一个又应该算做堪

称本质的“政治表现”呢？天下竟也有这么一帮糊涂虫，会认为政治表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或者因为郑兆南同志是个“狗崽子”吧？难道因此她就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吗？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毛主席教导的：要在大风大浪中，要在群众斗争中识别干部。我们认为郑兆南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和两封充满革命豪情的遗书，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她在大风大浪中的表现了，她完全够得上一个革命者的称号。最令人感动的是：郑兆南同志对于那些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对于那些令人难堪的造谣诬蔑，并不想申辩澄清。在她交给党的遗书中，通篇只用了三句话高度概括了那把她打成“反革命”的种种流言蜚语：“这些材料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还用得着逐条驳斥那些澜言吗？用得着涕泪横流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隐衷吗？用不着，用不着！胸怀坦荡的郑兆南同志不肖于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打官司。她充分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他们一定会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做出正确结论的。其实，她在与死亡搏斗的四天里，完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历史结论下得正确或不正确。那有什么关系呢？她所念念不忘的，是仍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学校，是整个中学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她在遗书中大谈特谈的就是这些。至于她个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她认为没有什么谈的必要，这就是郑兆南烈士的气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所必须具备的气魄！这也就是她的表现，是麇集在反动路线麾下的苍蝇们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表现！

三. 论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郑兆南同志象挺拔屹立的青松，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阴风吹不倒她，工作队的暗箭也射不垮她。于是保皇势力伙同流氓和暴徒，带着皮鞭粉墨登场了。举凡控制了群众的“多数”，还采取武斗的，都是虚弱垂死的表现。五十二中也决不例外。

郑兆南的爱人唐锡阳同志沉痛地对记者说：“这一小撮人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载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打着鞭子，象对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后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这样她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她在盆里拉痢疾，要勒索两元钱！……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只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扯谎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为了证实这些话，《中学文革报》的记者访问过亲眼目睹郑兆南同志受害的学生家长，其中有老工人，有干部，所谈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莫不唏嘘感叹！听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叙述，再想一想毛主席的话：“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任何一个革命同志都会对罪恶的刘邓路线引起愤恨，这是一条多么残酷的路线啊！

然而，在当时，那些挥舞着皮鞭耀武扬威的流氓，那些在一旁煽风点火的篡夺革委会大权的保皇分子，那些默许行凶、遥控大局的工作队，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这一群张牙舞爪的活疯子用了这么多凌辱人格的酷刑要把政治头脑如此清醒的郑兆南同志逼到和他们一样疯狂的地步！你真以为他们是在打“地主狗崽子”？你以为他们当真要让她“背叛家庭”！那才是梦呓！他们打她，是因为她紧紧跟着毛主席，打她，是因为她听了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了！而什么家庭出身黑七类八类的，那才是招摇撞骗的幌子！

但是，这些人却一口一个“朕即是党”！在这种情况下，象郑兆南同志这样的处境，很容易迷惑，张惶或者误解。但是，她非但没有为个人的安危所忧虑，反而为纯洁红卫兵的组织而担心。遗书中是这样写的：“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再让我们回想一下，郑兆南同志一个人，关在阴暗腐臭的牢房之中。她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刺激，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长夜，整整四十七天！也许她真的疯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她一直琢磨着怎样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真正能代表党的人。她坚信：“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这就是她对待阶级敌人的最好的回答！

我们再强调一遍，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是一个地主出身的人！你可以不解释事实，但无权篡改事实。事实就如此。郑兆南同志的这种感情究竟算不算得无产阶级感情？你看她对毛主席、对党、对真正的红卫兵，是多么爱戴，多么关心。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不管反动的东西把红旗打得多么高，伪装的多么好，而英雄的郑兆南同志总是最能听到党发出来的真正声音！同属于无产阶级的同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他们的思想总是沟通的。这就是：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我们简直不愿意再提起“联动”那一小撮败类。他们的出身倒不错，可是同郑兆南同志比较一下吧！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巨人；一个是粪土，一个是金石！在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出身并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决心！

四 论致死不渝的战斗精神

按照革委会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郑兆南是被他们整个制服了。由于内脏损伤，她已经浑身浮肿，遍体疮痍，白血球接近到最低点，看来没有几天活头，更不会有什么斗志了。为了减轻罪责，他们就把郑兆南“释放”了。

到医院去治疗吧？第一句话就是“病人什么出身？”听了答复，便被拒之门外了。郑兆南同志感到胸口闷，想喘又喘不出来。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躺在枕头上。她的面前放上纸笔，因为她“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安危的问题）要向党说。”她要继续战斗！她要 and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那时候外间还不知道刘邓受批判）进行浴血的战斗！但是白天她不能写，怕引起还不十分懂事的女儿的思想混乱，只有在晚上，她才向党倾吐自己的心曲。这时，她还对唐锡阳同志说：“即是市委不处理我这封信，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她就是这样满怀胜利的信心，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把这封长信写下去了。

到了第四天头上，信还没有写完，郑兆南同志的病情恶化了。她咳嗽、吐血、坐不住了。锡阳同志把她送到第六医院，大夫先是不收。几经周旋，再和五十二中交涉，最后才勉强收下了。郑兆南同志躺在候诊室里，最后和死亡搏斗。她第一次喊叫起来。她是想把死神吓走？还是想倾吐她向党还没有说完的话？这就不得而知了。她的女儿唐桦劝她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妈妈，大夫答应给你看病了！”大夫走来了，开始听她的心胸。需要安静。郑兆南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她的嘴唇发乌了，可是她还是咬紧嘴唇，有一刻没有出声。不过，这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一个年轻的、勇敢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死了！

人死了，还没有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她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败坏她的光辉的名字！受蒙蔽的群众中，包括她的女儿，十三岁的小唐桦。她对父亲说：“你不应该哭！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在她的眼睛里看来，妈妈是被“群众”打死的，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唐桦呀，你今天所以有这样的品质、好思想，其中不是也有你妈妈的一份功劳吗？你不是也清楚地记得，她在灯下和你一起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思想要求你，给你讲英雄人物的事迹吗？难道你从母亲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地主阶级的教育？锡阳同志为了不给女儿加重思想负担，几乎含着眼泪回答她：“你要和妈妈划清界线，紧跟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这就是在反动路线的统治下，革命同志的“永世不得翻身”！不仅郑兆南本人要戴着“假左派”的帽子被“群众”打死，连知情的爱人也要嘱咐女儿和她革命的母亲划清界线！

直到亲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召以后，锡阳同志才把这两封遗书给女儿读了。这天晚上唐桦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党和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妈妈的权利！

可以想象，郑兆南同志是在怎样一种逆境里战斗的。但是是什么东西支持着她致死不渝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思想，正是她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她对党无限的忠贞！联系起她平时行动刻苦要求自己的精神来看，这决非偶然了。郑兆南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女儿。革命的同志不应该再套上修正主义集团制造的死框框，因为她的出身而贬低她。更不应该象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如庸人看历史底伟人，拿破仑是一个伟人，他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许多坏事。”我们只能根据郑兆南同志的阶级立场，根据她的政治表现和她的功绩来给她的一生做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谈到的：“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得到同志的纪念。”“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

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今天，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起来了，全市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郑兆南同志得到了昭雪了。其他单位受过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同志也得到了或将要得到昭雪。这种令人鼓舞的情景，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当革命群众真正夺权以后，那些出身啦、职位啦、级别啦等等死框框是再也不会害人了。那些小汇报啦、只重表面不重表现啦等等修正主义统治手段，是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你的表现是革命的，群众自然会认可；你的表现是反动的，无论你的嘴巴多么伶俐、血统多么高贵、手腕多么圆滑，群众也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去。因为那时的天下，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天下。那时的人们，是敢想敢说敢干的真正大无畏的人们。那时的思想，是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思想！

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鼓舞踏着她的足迹继续战斗的勇士，我们悼念烈士，是为了从血的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训！

让我们把一首战歌献给郑兆南的忠魂吧：

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

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

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

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谈鸿沟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2. 27

编者按：在学校里，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造成了两派学生的对立——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对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对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并且延续到现在，阻碍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阻碍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谈鸿沟）一文是着重针对血统论进行探讨和分析的。现选登出供大家研究，希望同志们读后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论。

《出身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热心的读者便写信来问，这位首长是谁？是不是黑帮分子？可以请同志们放心，这位首长是个“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不是黑帮分子，你们查一查一九六一年的《中国青年》，就可以找到这段话。

引用这位首长的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现象不合理；第二是想说明存在鸿沟这种事实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一九六一年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存在，而且已经“不可逾越”了。这对于今天多忘事的贵人，是一个最好的答复。他们不承认彭真集团歧视过出身不好的青年，勉强承认一点，也只承认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些青年才受歧视。大概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谈这个问题，过不了一年半载，他们就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即使不说这些贵人过去曾经为虎作伥吧，不说他们今天用不承认来逃脱罪责吧，起码也可以说他们本人体会不深，不懂得在反革命集团压制底下是什么味道。

有不少同志不理解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而这些同志往往在现象面前停住了。实质是什么？他们并不懂得。比如产生鸿沟的渊源是什么？反映在哪些方面？有什么危害作用？说明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不知道，自然也找不到填平鸿沟的方法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蕴藏已久的矛盾激化了，爆发了。

“对联”出来了，谭力夫出来了，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也都出来了。面对无数丰富的事实，这些同志迷惑了。他们本来最善于责备别人没有阶级观点，但他们自己却不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事实。他们认为，谭力夫就是谭力夫，好象这么一个上了三年大学的蠢学生有本事一手扭转乾坤似的。他们既闹不清谭力夫怎么会成为谭力夫的，也不想知道为数颇多的群众在当时接受它的思想基础。直到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发表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血统论”在作祟。但也就到此为止。不少人还以为自己既不是联动的一员，也不是谭氏麾下的战将，大概血统论和自己毫无关系吧？于是，当那篇与血统论宣战的《出身论》出来的时候，这些同志便跳了起来。他们一方面高喊“打倒血统论！”（因为人民日报社这样写的，他们虽然还迷迷糊糊，但也是要喊几声避嫌疑的），一方面又高喊“打倒出身论！”（这一回他们清醒了，因为这和他们头脑里的混蛋东西大相径庭了）。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联动的衣钵，在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乱撒传单，大放二踢脚，大有联动少爷还魂之势。因此，如果说只是谭力夫和联动一小撮人有

“血统论”观念，大部分人没有，那实在该为那一小撮人抱委屈了。血统论这种东西历时已经很久了，大约有四五千年了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自己头脑里有没有血统论的烙印，倒是值得深思的。

下面我们就系统的谈一谈血统论和有关鸿沟的几个问题。

一、血统论的历史渊源

在奴隶制社会，血统论这种东西就挺时髦了。比如在古希腊，那里的人起名字，先要把老子的名字冠在前面。比方老子叫贺拉斯，儿子就叫贺拉斯的×××。这和联动张口老子闭口老子是很相象的。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雅典城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对于体育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举行一次运动会就好像过一个最隆重的节日。在这次运动会上有兄弟二人得到两项冠军，哥俩就把老子抬起来，绕雅典城走一周。于是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便对这个老头子喊：“喂，你得到这样的幸福，还不死吗？你还想得到更大的幸福吗？还想做天神吗？”于是乎老头子一高兴就呜呼哀哉了。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人看来，实在荒唐。你儿子是冠军，碍得着你的事吗？但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个思想感情。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相传那时有个叫做舜的皇帝，他的爸爸是个十分可恶的瞎老头子，几次要害死他，但他还是替自己的老子隐瞒这些事，直到他做了皇帝，也还是没有再提起。多半他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子反动，他便是混蛋了。因此还是不说的好。

到了封建社会，封建的伦理关系发展到了极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的常纲，是定而不可移的伦理道德。据说有一个牧羊的人，看到自己父亲偷了羊，便揭发检举去了，这件事让圣人知道了，他便大摇其头说：不大对头。汉朝有个皇帝叫做刘邦的，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是个大流氓，时常到他哥哥家去骗饭吃。有一天他哥哥家的饭熟了，但偏对他说没熟，好不给他吃。等到刘邦做了皇帝，应该分封诸侯了。照理说，姓刘的都得是诸侯。可是他的哥哥分封不分封呢？刘邦一想，自己的长兄表现可不好，要是按重在表现的原则，那是不够资格的。不过后来到底是血统观念占了上风，他的哥哥还是被列为藩镇，只是叫做“剩饭侯”，多少还不能忘记表现。读过《红楼梦》的人都记得，贾府有位凤姐。凤姐为了修缮大观园，得找个监工的。她明明知道贾府里的人没一个不贪污，可也偏得找姓贾的。找姓甄的不行吗？不行。因为封建的伦理观念不允许她这样做。明朝有一个叫做方孝儒的，犯了罪依我们的想法，他犯罪把他杀了就完了。但是没那么容易，得“灭门十族”，连他的老子、老娘、再加上其他的亲戚，再加上亲戚的亲戚，都得杀掉。这下子可真是斩草除根了。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的这一套伦常关系编进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孝”，内容主要就是谈儿子、老子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不是英雄怎么办？儿子也偏得说他是英雄，即便老子反动透了顶，儿子也得象尊敬英雄那样尊敬他，其目的无非还是证明自己是个好汉。今天不是还有“共产党员”给自己反动的老子树碑立传吗？多半是读“二十四孝”读得太熟的缘故吧？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谁只要讲历史，谁就是别有用心。干脆告诉你们，省得你们猜

测。我们讲这些，就是给明着暗着推崇血统论的人一面镜子，也照照你们的尊容，看和历史上的那些古董是不是有一二分相似？封建社会有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怎样的上层建筑；有怎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怎样的法律、习惯、道德和伦理观念。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阶级关系也不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样复杂。加之交通的闭塞，物物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所造成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就造成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此，血统论变成了统治阶级赖以维持统治的理论基础了。那时候出身和成份差不多是分不开的。老子打铁，儿子拉风箱。例外的情况很少。所以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说法。比如：“这位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我是学生出身”等等，那并不是说我的爸爸就是学生。封建社会不象今天这样大分化、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今天资本家的儿子已经不再做资本家，而出身挺好的联动诸位反倒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丘之貉，出身和成份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封建时代的家庭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下面摘录《共产党宣言》的一大段，供大家参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系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这些算作资产阶级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毛主席告诉我们，我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几千年来维持封建社会生存的血统观念带到了今天，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剥削阶级传统观念都要破产的关键性时刻，它们更要进行垂死挣扎。变换各种面目（甚至是极“左”的面目）束缚革命、阻碍革命、破坏革命，那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事。谭力夫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做为封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必定是被革命的车轮碾碎！至于那时候为什么他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如果我们掌握了起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由此证明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之中。诚如主席所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他老人家又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血统论，发展到了今天便是唯出身论，给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有时达到了不可逾越的程度！它在运动中自己蹦出来，让我们将消灭它的战斗部署提到议事日程上，因此，打破它的束缚，消除它的阻碍，防止它的破坏，填平它所制造的鸿沟，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亟待解决的任务之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都是责无旁贷的。

二、从三个方面看鸿沟

其一、家庭影响神秘化

一个人受不受家庭影响？肯定是受的。但是究竟什么家庭给予一个人什么影响？在一个人的表现中起到什么作用？答案是有原则性分歧的。由于家庭出身好的青年不理解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理解家庭出身好的，往往将对方的家庭影响神秘化了。

不少同志忘记了今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把家庭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一提到剥削阶级家庭，立刻就想到刀光剑影，以为这些家长每天就是教儿子怎样杀人。一提到高干家庭，立刻就想起有一份血书，每天都要给儿子讲怎样高深的道理。这些同志从修正主义分子一手炮制的小说、电影、戏剧、刊物上面承受了这个概念，信以为真。其实这些东西恶毒就恶毒在让青年人理解今天的阶级斗争的特点，不懂得和平演变是什么。假若出身不好的青年每天只提防磨刀霍霍，而忘记了糖衣炮弹；假若高干子弟只对自己的家庭一味迷信，而忘记了高等生活的侵蚀，那么，或者使他们放松警惕，或者走到极端，造成了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这都是对革命不利的。又有一些同志忘记了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以为家庭给了你什么影响，你就接受什么影响，似乎一个人没有一点可以选择的自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一种影响，有乐于接受的，有勉强接受的，有引起反感拒不接受的，也有无动于衷的。对于家庭影响也如此。今天的青年人接受了党十七年的教育，对于拿枪的敌人是能够认识清楚的。如果还有哪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在家里磨刀，那个结果是不算太妙的。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对于家庭一般说来是憎恨的，因此，对于家长的言论，他们就有了免疫的能力。他们时时将自己放在与家长对立的一方，这样，他们在克服坏的影响方面便有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少爷们，那些自认为最懂得阶级斗争，以为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就是不在自己的家庭之中的少爷们，却很容易忽视自己家庭的坏影响。一旦他们自己的家庭真的有坏影响，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划清界限，他们甚至也会当作富有营养的东西接受下来。殊不知，我们的社会还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都有市场。对自己的家庭丧失警惕无疑是危险的。

更有一些同志把家庭影响夸大了到无可形容的地步。他们以为除去家庭影响就没有其他影响了，即使有，也得受家庭影响制约。毛主席有一段话，证明了这些同志的荒谬。他说：“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教育（社会影响）是大于家庭影响，并且能克服家庭影响的。毛主席说的还是解放以前的情况，解放以后，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情况会怎样呢？恩格斯在解答“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时说：“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失。”

正象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驳斥过的政治庸人那样，今天摇头晃脑的血统论者们念念不忘家庭，念念不忘老子，活脱脱是个封建社会的遗少。革命的导师是这样批判他们的：“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你们

（资产阶级）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谈到：把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绝对的，是不合理的。这种家族形态只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

我们所以要引用这样多的经典著作，无非是想证明今天大喊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大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们是群什么东西！他们的水平比起那些用资产阶级偏颇观念灌昏了脑袋的政客还不如！看到他们对家庭这样神秘化，简直让人想起宽袖方巾的时代，十足是一群蠢货！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革命群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说，这一不是将家庭当作社会上的细胞的那种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目前我们国家的革命人民正处在一种无产阶级同志式的关系，这就象毛主席所说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反动的唯出身论妄图改变这种局面，分化革命队伍，以达到其复辟目的。

其二、政治表现神秘化

把家庭影响神秘化了，自然要把本人表现也神秘化。因为这样一来才符合封建时代的种种格言。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什么“将门出虎子”，这些陈词滥调都被血统论者奉为至宝。

他们首先认为血统高贵的人处处都了不起，行堪观止，字字珠玑，一举一动都值得记在将来的回忆录上。

这么一来，就造成这些青年盲目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贬低出身不好的青年。怀疑他们，轻视他们，处处以狭隘的偏见观察他们，把他们万分平凡的举动也看得大有申陈。搞得他们紧张、麻木、自卑、甚至心理变了态。女十二中有几位出身不好的同学，长期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竟以为自己顺心的事都是错的，自己不满的事都是对的。他们看了某一篇文章，先是觉得挺高兴，可是立刻就责备自己，回去写了篇批判文章贴出来，不过后来听说这篇文章让某位领导人肯定了，他们可大大慌了手脚！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这还有什么朝气蓬勃可言！他们的心灵简直是经受了无可救药的残害！而残害者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的血统论，正是目前大大流行的唯出身论！何其毒也！手头还有一张铅印的传单，是四个学校在运动初期联合组织的红外围。红外围的组织当然都不是出身好的。他们写道：只有革命的左派才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接下去便说，“这个组织要绝对地服从红卫兵的领导”，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格打勿论”！多么典型的奴才性格！你已经是革命的左派了，还要绝对服从一个既非党团，又非无产阶级先锋队，只不过出身好的红卫兵领导之下。大概领导你们的都是超左派了吧？以上这两个例子，说明了青年之间的这道鸿沟已经多么深，多么宽，多么不可逾越了！在学校里，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气氛，一派是专门汇报思想的，一派是专门听汇报的，前一派必然产生阿谀奉承，阳奉阴违的能手，后一派必然出现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老爷。真要问他们是怎样成了混蛋的？不是别的，还是万恶的唯出身论把他们逼出来的！

其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任何一种腐朽的思想，都会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过去修正主义集团大大利用了血统论，运动初期刘邓路线也在出身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这道鸿沟越挖越深，务使我们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想把革命队伍缩小，以利于消灭之，二是想分而治之，三是想拉拢、利用一部分青年做他们顺从的复辟工具。有一段时期，他们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真是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中学文革报》和其他中学生主办的报纸常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有一张铅印的表格，是一位司机同志托人转交给我们的。他说：“请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人看一看，给他们做个参考。”不负盛意，我们把它抄在下面，以飨同好。

学习驾驶员的条件

（一）驾驶员的培养对象：

1. 驾驶员的培养对象要贯彻阶级路线，以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烈军属子弟为主；对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原则上不培养。

2.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现，如果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经过有关部门审查确属没问题的，可以适当吸收培养一些。

3. 所培养的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好同志。

（其余两条从略）

这仅仅是培养一个驾驶员所需要的条件！这张表很能说明问题。在第1款中，是两个不问表现，一不问“红五类”出身的表现，哪怕这些人是联动的刽子手，也要被“贯彻”进去；二不问“黑六类”出身的表现，哪怕是聂元梓、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也都拒之于门外，第2款似乎是重在表现了。这一款是针对除去黑六类以外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那不用说，就是小业主出身的了。这回重在表现了。可是，一要划清（划清了还不相信），二要审查（审查到了没有问题），才能培养“一些”！根据出身这么一鉴别，于是乎再也用不着进一步审查了，便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好同志”了！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种现象究竟能不能容忍！这不过是千万个例子中的很小的一个。凡是克服了偏见的革命同志都可以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举出你亲身经历的更多事例来。

社会地位是这样悬殊，还谈的上什么团结，什么了解？更谈不上共同战斗了。有的只是隔阂，是生疏，是淡漠，出身真是压死人啊！

以上我们就从家庭影响神秘化这个方面，从政治表现神秘化这个方面，从社会地位的平等这个方面，分析了在青年之中存在不存在的一道鸿沟。我们说，是存在的。它的存在是由血统论，唯出身论一手造成的。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阻碍着我们的前进，到了彻底填平它的时候了！

三、填平鸿沟的办法

我们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血统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干革命。阶级论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这里所说的成份不是出身。比如你成份是个工人，是个学生，这都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不能唯成份，不是说是个工人都是革命的，

还得看表现。象江青同志所说的，要时时处处看一个人的观点、立场。这和出身都毫无关系。让那些死抱着家庭粗腿不放的人见鬼去吧，这个鸿沟我们是填定了。

革命的同志要在斗争中填平这道鸿沟。过去开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这道鸿沟把革命青年分开了，使他们站在天河的两岸，遥遥相望，几乎使运动夭折。现在，我们应该在彼岸此岸共同填土，让它变成一道通途。这道鸿沟只能在大联合中填平，在夺权斗争中填平，在斗批改中填平。只有共同斗争才能彼此了解，才能克服神秘化的倾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识别一个人表现的好坏，才能验证一个人所受影响如何。那些受过一些委屈躲在家里不愿出来的同志，应该鼓起勇气，重新投入战斗了！那些压制过别人，无形之中帮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忙的同志，也应该扪心自问，努力改正了。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涤荡我们脑海中的剥削阶级观念，才能使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改造成一代新人。而要使这些都不至于变成空话，要使中学革命运动不至于冷冷清清，要使今后的革命能顺利开展，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我们讲革命同志之间的平等，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要你委屈求全，恩赐给人家平等，而脑子里还认为比别人高出一头。那是假平等！我们认为一个人是不是比另一个人优越，不在于他的出身，不在于他的性格，不在于他的年龄，而在于他的表现，在于他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不高？思想改造得好不好？通过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出，决不是出身好的人一定比出身不好的人表现更好。联动的骚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党历来是主张革命青年应该平等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他亲手拟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中，并不曾提到“出身”二字。他的那篇足以鼓舞我们青年无限勇气的讲话中所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是对所有革命青年说的，不是对某一阶层的青年说的。我们的导师早已为我们指明了航程，谁要想扭转它，想阻碍它，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鸿沟等待着我们填平，血统论、唯出身论等待我们消灭。革命的年青人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在斗争中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向一切腐朽的东西开战！胜利必将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原载《中学论坛》创刊号
1967年2月27日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1967. 03. 06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室熄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云云，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 《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辩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们”一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

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分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

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

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要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 《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一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义，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义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荒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许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女儿）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鼓吹荒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十八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起、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

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

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起、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

1967. 04. 01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地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究属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分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排成了头朝下，来个彭真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

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1967年4月1日

论新思潮

——四三派宣言

《四三战报》编辑部

1967. 06. 11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的时候了！

一. 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

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逐渐蜕化的当权派。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

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 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

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

（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 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

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冈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1967.07.11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1967.6.30—7.1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热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第一届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与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供河造总战友参考

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

1967. 07. 17

……为此，该文只供河造总内部传阅。

一、刘建勋问题

我们问：同志，你认识唐伟吗？

414同志答：认识！认识！唐伟是我们的战友，他对我校文化大革命贡献很大。他是一个好同志。

（按：唐伟对河南文化大革命“贡献”更大）……

问：蒯大富在河南问题上的作法对吗？

答：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目的是实用主义的，他在刘建勋问题上押了一个宝，为的是把唐伟打下去。同时把他的一批战友也打下去，以实现蒯大富个人和其小集团的集权。因此对蒯大富来说，河南问题无所谓正确不。搞赌博嘛！胜利了是一个“赌”字，输了也是一个“赌”字。没有甚么无产阶级原则可言。但是在客观上来说，唐、蒯在河南的作法折衷一下可能对河南文化大革命更有利。

（按：两条路线斗争怎么能折衷？）

（按：恶毒攻击蒯大富，不知道唐伟在河南又押的甚么宝？）

问：你说唐伟和我们河造总搞刘建勋对吗？

答：……后来我们理解了，因此我们不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要有主要矛盾的概念，一个时期主要矛盾只有一个，搞多重心，主要敌人是会跑掉的，革命就要失败。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不祇是一次。

（按：无非说，目前不能打倒，以后再……）

二、河南革命大联合问题

问：听说中央肯定了河造总是做为联合核心的造反派，同时也肯定了二七是犯严重错误的、组织很不纯的造反派。此外传说战斗师铁军等也被肯定了，而对八大总部未有绝对否定。你认为此消息可靠吗？

答：从“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近来社论及中央处理各省、各市、各院校问题的方法分析，我认为这个消息完全可能是可靠的。

问：为什么不绝对地否定八大总部呢？

答：八大总部大部分不是甚么保守派……二七公社用敌对的办法对待八大总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第一（略）。第二造反派和他们的矛盾，特别是二七和八大总部的矛盾还会向敌我矛盾转化。武斗风会更猛。第三，……相反，河造总这个较好的造反派有可能被二七极左思潮冲垮。文化大革命就会走弯路。……

问：那为甚么不让二七当核心呢？

答：……再说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章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祇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后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三、对河造总策略的建议

问：你是否谈谈河造总下一段应采用甚么策略

答：具体的说，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问：你的意思是否先团结八大总部後 再联合二七呢？

答：形势确实如此，实质上是河造总和二七展开路线斗争来解决争夺“核心”问题。河造总的成分和思潮是能代表八大总部工农兵群众利益的。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庸俗地理解为山头之争是不对的。

问：再具体谈谈如何对待八大总部好不好？

答：……同时要向他们说明二七思潮的危害性。

问：我们和铁军战斗师摩擦相当大，再加上他们组织中也有保守的，联合不起来怎么办？

答：……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而不是为了追求队伍的纯粹而战。有一些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路线觉悟低，可以帮助嘛！我觉得战斗师铁军好像是造反派组织，人家去八大总部，是你们关门的结果。……

问：联合时权分散了甚么办？

答：……铁军很多是革命小将。要注意引导，联动起先也是革命小将。……战斗师、铁军等愿意搞拢我们就要共同掌权，对过去问题要多做自我检查。要相信他们的觉悟。……

问：你的思想方法很有意思，我们理解了，你再谈谈对二七怎么办？

答：从二七的历史来看二七要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河造总要帮助二七改正错误，清洗组织，否则以后大联合就困难了。但是我们河造总同二七联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河造总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或基本解决八大总部问题，真正使核心巩固，（原文不清……）这一点河造总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当然根据二七的特点和它的地位与八大总部的差别，策略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四、军区问题

问：你认为军区如何？

答：河南军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对的，但有错误，原因是军区党委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理解不深之故，此外阶级斗争的策略性差……

五、内部问题

问：请你对河造总提提意见吧！

答：河南问题很复杂，河造总能处于这样的地位表明河造总是一个先进的造反派，他的政治敏感力很强，他的政策观念也很强。很多地方很值得北京造反派学习的。……

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帮助工农兵掌握大方向，没有理论班子，没有笔杆子队伍是不行的。……

目前河南谣言很多，对中央不忠诚，转达中央指示为我所用，作风不正，坏象百出，二七特别严重，其他组织也有。我们要学习二七的阶级斗争观念，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要注意斗争艺术，但不要学习他们的资产阶级手腕……

由于时间关系这份座谈纪要就介绍到这里。（下略）

转载于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革联1967.7.17出的《革命造反座谈纪要》增刊第二号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首都516红卫兵团

1967. 07. 29

一、当我们回顾一年多的历史时，谁能不深切地感觉到：在大革命运动中，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多么复杂啊！（提纲）败下阵去，“五·一六”（通知）杀上历史舞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被伟大领袖批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迅速撕掉罩在外面的遮羞布，（十六条）刚刚将刘邓杀了个体无完肤，刘邓代理人便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抓”生产，压革命，依然想把革命烈火扑下去。听！林副统帅吹响了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进军号！看！百万革命造反派挥戈跃马，英勇上阵，敌人全面崩溃啦！可是，刘邓代理人负隅顽抗，以攻为守，经济主义黑风妄图动摇国计民生！二月黑风企图扑灭伟大的一月革命。四月挑起大规模武斗，六月公然动用武装及公检法镇压革命，使我们千百万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倒在血泪中。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敌人即将全部、干净、彻底地被埋葬，一切牛鬼蛇神就要完蛋了的关键时刻，狗急跳墙了！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指出的一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的反扑。”他们要搞武汉的反革命匈牙利暴乱事件了，他们要搞蒋介石4·12大屠杀了，一句话，牛鬼蛇神现原形了，刘邓代理人撕了自己头上的那层薄纱，赤膊上阵了！“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越起劲，就暴露得越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二、在七月二十五日百万人天安门集会上，北航红旗战士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武汉事件”是十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反革命事件，是早有预谋的武汉“匈牙利事件”。而继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广州、福州、新疆、安徽、张家口、宣化，东北等地都相继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联系以前刘邓一直把武汉作为他们政变的战略交通要点，把东北和中南作为围剿毛主席红色政权的要害地区，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坚信不移的。（十六条）中提到：这次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目前出现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肯定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划操纵的。他们利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指使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分子，蒙蔽一些群众走上了反动道路。而全国同时出现的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事件难道不是由某些人假借党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名义蒙蔽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造成的吗？联想到有人竟在一般

群众的接见时，随便信口开河地说：“就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名义联名写信，不叫‘打砸抢’派演出。”难道不是令人深省的吗？目前，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直接统帅下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全国的反动势力、保守势力例如四川老产，重大八·一五，湖北百匪，湖南高司，河南公安公社，北京联动等等，等等，也在互相勾结串连，联合行动，难道他们不是在另一个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进行活动吗？难道这没有表明明为暗的敌人妄图实现全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为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作组织准备吗？这难道能不引起全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倍千倍的警惕吗？

四、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注意反革命政变，林副主席特别指出：“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伺机而动，他们是假革命，假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想叛变，他们想杀人。”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个人掉脑袋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同志亲切教导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这些意味深长的教导说明什么问题，联系最近所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岂不是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吗？

五、戚本禹同志七月二十四日下午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说：“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有意见，……现在新华社黑线问题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同志和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映情况。例如‘内参增刊’，‘每日要闻’等绝密文件，可以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人，但是不发给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还有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联想人民日报前个时期为×××及其部下同僚××，×××大吹特吹，不惜贬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为×××大树威望，说×××的讲话是“最强音”等等，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想想看，戚本禹同志所说的“另一个司令部”是什么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六、戚本禹同志最近要造反派大力批判刘邓7·29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特别强调“要在这儿下功夫”，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七月二十九日谁与刘邓站在一起，一唱一和，三篇讲话如出一辙？是谁伙同刘邓攻击毛主席，极力为刘邓反动路线开脱，是谁在大肆贩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反革命破烂货的？这种人该不该揪出来批判？

七、为什么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广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联系到目前斗争形势，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有何现实意义？

八、“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看！是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左和右的方面不断地在动摇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副统帅曾经说过：“党内党外，党内为主，上层下层，上层为主，中央地方，中央为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也完全证明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请问，当革命造反派从四处冲杀出来，向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那个叫喊革命小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小将们犯了“方向性错误”，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叱咤六月革命风云，衡刀策马奋勇向前的关键时刻，那个声嘶力竭地大叫“夺权过火了”，“中央的权不能夺”，“各部党委一律官复原职”，“把权交给你们我不放心，以

后打仗，这些老将99%都要上阵。”等等的人，是不是从“右”边动摇党中央的政策？！请问，当刘邓大打出手，残酷地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时候，站在刘邓一边亲手制定执行这条反动路线，亲手将陈伯达同志打成“反革命总后台”的人，在一月风暴后，继续煽阴风点鬼火，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站出来讲话”“挺起腰杆来干”。随之，二月黑风滚滚而来，全国规模的所谓“镇反”，把多少革命造反派送进了监狱，带上镣铐，把支左变成“吃左”的人，是否正是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见风使舵，突然从右边来了个180°的大转弯，煽动群众“不管什么当权派，权都可以夺，夺过来再说！”“科长也是当权派”，“辅导员也可以扫扫嘛”，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不是从“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政策吗？那个一贯主张“要树立对立面！”，“要让几派同时存在”，极力扶植奄奄待毙的保守组织，例如重大8·15、湖南高司、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新疆八一野战军的人，是不是又在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在刘邓快要完蛋的时刻，大声疾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亿万革命群众痛批刘邓反动路线时，他说：“这只是五十五天的错误”。在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准备揪斗刘贼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时，他口口声声说：“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更甚者，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给刘邓定论后，在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后的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军区仍然胡说：“刘邓在四五年前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七大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那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了！”请问，这种人不是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么？试问，在军内高级干部会上讲这些话，用意何在？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又是什么？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邓翻案又是什么？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请大家想一想，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

革命大潮卷得正急，斗争的火焰烧得正烈！挺起胸来冲上去吧！与敌人血战之日就在今朝！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用我们青春的热血，捍卫祖国红色江山！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516红卫兵团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版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动言行的第一批材料

地质东方红 红色造反兵团，620革命造反兵团

1967. 08-09

一、反对中央文革

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攻击、反对、抵制是由来以久的、全面系统的，非常露骨和恶毒。

1、朱成昭于66.12.18对联动头头周××（北大附中）、丁××（农大附中）、彭××、顾××（北大附中）说中央文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我党历史上，每反右，必定出现一次反“左”运动。

2、1967.1.22朱成昭说：“我们反对什么？反对中央文革的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1967.1.19朱成昭说：“北京要变成第二个北大了。”又说：“中央文革已从不信任群众到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

4、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有很多问题蒙蔽了毛主席，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

5、有一时期外面谣传主席批评了中央文革时，朱说：“幸亏我们没有紧跟中央文革。”

6、朱说：“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7、67.2.28，朱对彭××说：“中央文革掌握我的材料，我也掌握他的，他抛我就抛，他整我，我就整他。”

8、程××讲：“朱成昭掌握了中央文革的材料，他还能联合许多单位和中央文革干，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人心所向不是你们（指反朱派）。军队如能闹，军委几个老帅一闹，把各军区割开来，中央文革就完了，所以中央文革不敢反朱成昭的。中央文革手中有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军队，但是军队是有问题的，各军区可以割开来。内蒙，中央只能把军区司令骗来，下面士兵是保司令的，根本不会支持造反派。”

9、“军委面里问题很大，为什么军委会议开了几天，中央文革就不让开了，而且把人都撤了。”

10、2.28朱对彭××说：“红旗三期社论的发表是我们，也包括你们（指联动）奋斗的结果，是我们的胜利，出社论说明中央文革出场了，如果再不出，这就没法收场了。”

11、2.28，朱对彭××说：“军委是司令部，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参谋部，不能把中央文革这个参谋部都说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盲从。”谈到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时，朱说：“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我才不干呢！”“中央文革根本没有什么原则性”。一次有人问，中央文革，有些地方不符合十六条精神，江青却说：“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自己的。中央文革就是实用主义。”

12、他们把中央文革分成几派，说××，××，×××是毛主席一边的……，另一派是××，××，×××。

13、“中央文革掌握政策就是没有原则，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你看，贺龙原来也只轰一轰就保，现在你看把他打倒。她就是想用群众来轰你，杀你的威风，然后就保你。陈毅你们，前一段有牢骚，中央文革就用群众轰一轰。”

14、在最近，与北大的冲突中，他们认为是实现其“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重新排队”的理论的时候。有人说他们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中央文革已经制止了，他们说：“如果不制止，中央文革就该完蛋了。”

15、有人对他们说：“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就在于你们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回答：“中央文革有什么怀疑不得，反对不得，现在就是没有大民主。”

16、1966.11~12，朱准备把地质部作为全国指挥部，说他用50台电话机指挥全国运动。

17、67.2，他们分析中央文革可能用几种手段对待他们：（1）中央文革下令把朱成昭抓起来，但这样做比较被动，可能性小；（2）挑动群众把朱成昭抓起来；（3）让人把朱成昭暗地里打死。

18、说中央文革文过饰非。（按：这里难道说是一搬的认识问题吗？仅仅是对中央文革有意见吗？不是！他们对中央文革是有仇恨的）

二、反对攻击文化大革命

1、北大的反动分子杨勋、杨柄章的反动观点是人人皆知的：“文化革命是林彪的革命，是宗派斗争……是林彪的一派把刘邓的一派打下去。”而在67.2，朱成昭们认为不能把杨勋当反革命，还说：“要搞清一些问题必与杨勋他们联系，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到监狱。”

2、67.6.22，彭××问朱的出身，朱愤愤地说是：“革命黑帮”。

3、对彭还说：“现在把老干部都斗苦了，都干完，你陈伯达能领兵打仗？都是耍笔杆子的。”

4、朱认为彭、罗、陆、杨、陶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而群众是奴隶主义，中央点名嘛，就斗，就批，就抓。

5、抓彭德怀时，抄了彭德怀许多宝贵的绝密材料，曾放在我院地下室多日，朱成昭将这些材料全部看过了。

三、最恶毒攻击江青同志

他们说江青同志根本算不上革命家，她是哪个阶级的？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一激动什么话都说，在北大把家庭纠纷都说出来了。（讲到这里，我们讲一句，朱成昭对毛主席一家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比陆定一的老婆有过之而无不及，语气之恶毒，令人发指，我们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公布。）

四、关于反对康生、杨成武、谢富治、周总理

朱等是最惯于搞地下活动的，据我们了解，它们是：

1、67年2月北京刮起一股妖风，矛头指向康老，朱成昭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朱曾派刘××、刘××、万××等到高级党校与红战团联系，朱曾派郑××到北大找樊立勤要关于康老的材料，当中央文革批评之后，杨雨忠还顽固坚持：“康生的材料有什么整不得？”

2、地院《丛中笑》战斗队曾说朱成昭整杨成武的材料。

3、在北大孙蓬一公开贴出攻击谢富治同志的大标语前，朱成昭、杨雨忠一直把谢富治同志列在北大一边的。杨曾在东方红战斗队队长会议上公开发谢富治的脾气。

4、朱成昭对总理从来是怀疑的，反对的。据揭发现在他们怀疑周总理是北大聂元梓的后台，坚决要把周总理拉下马，甚至怀疑到林总的头上。

五、对军委、对四个老师

1、朱不只一次的说：“四个老师现在满腹牢骚，被整得敢怒而不敢言。”

2、朱谈中央文革最后一张王牌是军队，但是军委有问题，各军区可以割开来，军队也能闹，几个老师一闹把各军区割开来，中央文革就完了。为什么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中央文革就不开了，而把人撤了？”

3、朱讲：“四个老师的讲话很有道理，我很想找他们谈。”

4、朱与叶向真关系极为密切，来往频繁。主要是通电话，通叶剑英这条线，想从这里通毛主席。

六、与联动关系

1、67年2月25日，朱成昭通过陈广志（东方红办公室主任，朱的亲信）找到了联动分子彭、周、丁、顾等人，与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散布了大量反中央文革的反动观点，对联动分子讲：“你们是客观上反中央文革，我是主观上反中央文革。”甚至连联动骨干也感到太露骨了，是地地道道的反中央文革，有的被吓得再也不敢找他来，找他了。周××后来谈与朱成昭的谈话不仅使他回到联动立场，而且又向前发展了，谈话中心内容是：

（1）、中央文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2）、红旗四期社论证明中央文革要收场了，不收场就不好收场了，这是他们（联动）的胜利。

（3）、联动要扒下，先别动。

（4）、现在很多事情是颠倒的，要登高望远，十年以后，主席给我平反，二十年後，给我下结论，三十年後我掌权。

（5）、中央文革不敢动我，因为我掌握他的大量材料。

2、67年3月18日彭××刚解放出来，立刻接到朱成昭的电话，说：“……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吗？”彭答：“我发现我自己有许多东西错了。”朱回答：“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发现，不过我感到是有了新发现。”对拉彭××失去了信心。

3、朱成昭叫郑文卿去搞联动，可是 后来说，现在不搞了，说不定以后还和他们合作呢。

4、朱说江青以前把联动说成小月亮，后来一激动又真抓特抓，他们小小年纪就坐班房，带着美国手铐，越挣越紧，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他们天天唱：“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此地不主张抓也没抓，送了十几个也要向上（中央文革）追责任。

5、朱成昭认为江青、中央文革在联动问题上就是犯了错误，放联动说明朱成昭是正确的。

6、四三派、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卫兵（实指联动）掌权。

7、联动可能是左派。

七、关于叶向真问题

朱在叶向真问题上的手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互相包庇，互相利用。

据四月六日田××在×× ××处讲：

1、朱和叶的关系很不正常，叶常深更半夜开着小汽车找朱，俩人谈话一谈就是一夜。叶是朱的贵客，谈话时其他人不准在场。

2、戏剧学院叶向真领头冲军事学院，我们支持了，实际上反错了，叶是保皇干将，黑材料是她自己整的，当时我反对，但是朱全力支持，说：“就是把叶向真打成右派，我也支持她。”

3、地院同学说，叶作风很坏，朱说：“你们别老抓她生活问题，我们现在要利用她，这次没有她还不行呢。”

八、关于与一些坏组织的联系

这方面线索是繁多的但我们了解得很少。

1、我们了解朱与科大雄师、北大红旗军（应为红联军）、红联总联动等都有密切联系。

2、对杨勋、杨柄章、李洪山、谭力夫、赖锐锐……之流，认为不应该抓，并说要与杨勋联系，弄清一些问题。

九、对文化革命中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1、朱认为大串联太早了，北京运动落后是中央文革把人放跑了。

2、请示中央文革，学习中央文革同志讲话，朱认为是培养奴隶主义，这样中国还会出修正主义。

3、在十二月黑风时，朱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将以红色保皇派的胜利，造反派的失败而告终。”

4、对军训是抵制的，他说：“军训对我们是有消极作用。”“军训对我们有害无益，对别人也如此。”

5、彭、罗、陆、杨是中央抛出来的，陶铸是中央点出来的。

6、516通知发表，朱等认为意味差，又要从中央文革抛出几个来，因为林彪与几个老师是一致的，要抓几个给老师出气，这就是新北大这次闹分裂中央文革的政治背景，所以北大是有大后台的。

7、认为大联合太早了，现在仍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十、对十七年、三面红旗、反右斗争……进行恶毒攻击

1、他们认为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反对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右派吗？可是就是不承认。

2、他们（指中央文革）对三面红旗就是死卡住不承认错，你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过得什么样的日子，现在讨饭的很多。

十一、朱成昭的作风

作风是阶级性的表现，没有超阶级的作风。朱成昭的作风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1、×××讲他们认为血统高贵（朱讲他对高干子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生活腐化得很，总是大吃大喝。谈情说爱。尤其朱成昭对别人像老子教训儿子，就是对杨育中也一样。

2、朱成昭高居地院西三楼，吃饭到饭馆，酒肉相待，田春林经常喝得醺醺大醉。有时朱成昭还请舞蹈学校的女同志跳舞给他看。彭××还见朱成昭喝牛奶，并叫人给他端茶送饭，不高兴起来还要训几句。

3、去年“十一”晚在颐和园互相吹捧，说什么：“我看你（指朱）就是上天安门的材料。

4、蒋良才的女朋友是联动的，过生日，他们去祝寿。

5、朱曾说：“田春林是修味了。”但他要用田春林，因为田忠于他。蒋用国家的小轿车，国家的汽油，在学校练车，经常骑摩托，轿车出入，好不风流。

朱成昭与联动

地质东方红 红色造反兵团，620革命造反兵团

1967. 08-09

关于附件的按语指示：

联动思潮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思潮，其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决非偶然。它是没落的、垂死的、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新特权阶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向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的产物。联动虽小，毒根却格外的深，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反对反动的“联动思潮”。口诛笔伐，浑恶痛绝。然而，向来以最坚定的左派自居的朱成昭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与联动勾勾搭搭，出谋划策，打得火热，这又是偶然的吗？不！决不是，这是朱成昭这个“革命黑帮”的儿子的必然表演。

现在有人借毛主席指示解放联动的英明战略措施，为联动翻案，为朱成昭歌功颂德，把朱成昭的反动捧为“预见”。为联动翻案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不能允许的。

现在我们公布朱成昭与联动头头的一次谈话调查，这是朱成昭的一个很好的自供状。希望同志们能耐心读一读，用毛泽东思想把这股反革命思潮揭深揭透，批倒批臭，使我们的“东方红”永远紧跟中央文革。

朱成昭与联动之一

67年2月27日，地院东方红总部办公室陈××找到联动头目周××（联动女司令），陈对他们讲，朱成昭想找联动，可是很难找，找不到。陈要周找些可靠的人到地院看形势。当晚有彭××、周××、顾××、丁××及师大女附中几个到地院九楼会议室。回忆当时的情况，乱谈没有意思，朱成昭没有出来，只有陈××一个劲的打听联动的情况，这天晚上就在地院住宿。二十八日早七时左右，顾××去还大衣，见彭××、周××、丁××，在他们说要见朱成昭后，到西三楼307室与朱成昭（谈话）从七时一直到十一时，主要是与彭××谈，后来一直把彭送回学校。顾××对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对朱的讲话，作了如下揭发：

- 1、首先朱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夸他们是有作为的闯将。
- 2、中央文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3、聂元梓、蒯大富投机。
- 4、现在抓联动我们不同意，我们也没有抓。主要是去年年底抓过地院附中19人，那是因为当天彭德怀扣在地院，这不能怪我们，应当向上追责任。
- 5、你们看陈伯达在红代会讲话显然不同与以前，低多了，群众有什么错误。
- 6、现在很多事情是颠倒的，要登高望远，十年後毛主席给我平反，二十年後主席给我下结论，三十年以后我掌权（彭××当时很激动地连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 7、对江青很不满意，说她运动群众，文过饰非。

8、朱把陈伯达、阎长贵给朱的信，给他们看。陈伯达同志说：你往前走就要堕入毛坑了，阎长贵同志说：我们不愿你倒的，你要倒也没法了。

9、把联动密字003号文件给他们看。

10、把老干部都整完了，到时候他们领兵打仗？陈伯达能领兵打仗？戚本禹能带兵打仗？都是些耍笔杆子的。

11、你们联动跌跤就是跌在阶级路线上，我们地质东方红在全国最早最正确，是彻底地（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

12、谈到他的检查时，他大骂：“放屁，那根本不是我写的。”

13、谈到蒯大富时，朱大骂：“蒯大富想整我，我带上一批人到清华是一趟就把他整垮了，他的××系就是我的人，他的很多人就是我给他树起来的。”谈到二十八团时，朱骂二十八团最没用。

14、你们中学先别动，先趴下，好好学习马列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

15、我这些观点也和中央文革谈过，刚谈一点就崩了。我们这里是自己人，要传出去，他们非抓我们不行。要是别人早抓了，可我们就不敢抓。还说中央文革给他一个不准逮捕他的证明。

16、陈伯达是要笔杆子而已。

17、他们说联动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我看却相反，真这些人（造反派）只会跟着人家跑，中国真出修正主义，他们就造不了反，他们是早期不敢反，晚期不敢反，中国大家都反我也反，都想当左派，都怕戴右派帽子。

18、中央文革不敢把我怎样，他掌握我的材料，我也掌握大量他们的材料（指中央文革），他抛我也抛，他整我，我也会整他。

19、朱从不亲自送人，只送过三个人，一个是叶向真，他是很欣赏的，俩人可以逛马路。一个是彭××，这次就一直送回学校。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

20、朱写反动诗骂江青同志，骆小海很欣赏，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说很想见他。

21、朱说：他很想把这些人（指彭××、骆小海）之类召集起来。

22、谈话中朱谈到，他想到青海去。

23、他怀疑不少事情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顾全福最后说：“我不是联动，我是老红卫兵所谓坚定分子。不过我见朱成昭，去你们总部一次，就再也不愿意去了。你们总部的头头太反动了我看到地院东方红的大标语“揪出联动的后台”暗暗发笑。××说：“已经夺了朱成昭的权了。”顾说：“他们的权非夺不可，不夺，你们东方红左派组织快成反革命组织了。”又说：“我看他根本没有闭门思过。他的权你们根本没有夺下来，地院大权仍由他掌握着。我在总部那天，总部就有人打电话请示他，来电话的人讲一句，陈××重复一句，最后问朱，可不可以，朱说可以，陈连忙回话说可以。”

顾说：“陈××说他原来有些观点是不同意（朱）的，可是后来都被朱同化了，越想越有道理。

朱成昭与联动之二

六七年四月六日，地院东方红×××、×××到北大附中找到周××，与他作了简单谈话，在谈话中周对朱成昭三月一日在地院东方红对周××、顾××、彭××、丁××四人谈话，作了揭发。

1、当时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不久，朱说四期社论的发表证明他的观点正确，这是大家共同斗争的胜利，有咱们的功劳，也是你们斗争的成绩（指联动），这社论发表说明中央文革要收场了。

2、朱说：军委是司令部，中央文革只不过是参谋部，不能把中央文革这个参谋部说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3、现在要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不能树立中央文革的权威，不能盲从。

4、说到群众的大标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朱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我才不干呢！”

5、群众有什么可指责的，现在把什么错误都扣在群众头上。

6、12月28日地院抓了18个联动，这不能怪我们，是中央文革把抓联动的权下放了。

7、朱约彭××去青海说：“去就不怕流血，周××问：“如果你们死了怎么办？你们事业谁完成？朱说：“自有 后来人”。

8、说到朱要检查时，朱说：“检查个屁，根本不是我写的，（指第二次）。

9、周问朱的出身，朱说：“是革命黑帮”。

10、朱说军委派人保护他，不准抓他。

最后周讲：“我以前与地院东方红作对时，那时刚认识了错误，本来想找地院东方红同志谈谈，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没想到与朱成昭一谈，而使我的联动思潮更进一步了。我现在恨透了地院东方红。我的思想还没有定型，我看朱成昭与我们不一样，他是有一套的。”

朱成昭与联动之三

六七年四月四日原联动女司令北大附中周××贴出“彻底砸烂联动，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大字报。其中谈到朱成昭对她的影响。现将部分转抄如下：

朱成昭的讲话（3月1日）不仅使我回到联动的立场，而又向前发展了，我特别佩服朱成昭的分析能力，朱的“在党的历史上每次反右，必会出现一次反左运动，中央文革犯了左倾错误。”对我影响很大，我甚至想好好学习文件，总结一下运动，证实他的分析是否正确。当朱说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我马上想到肖华问题。下午刚谣传说中央文革说肖华有问题，晚上三点就抄了他的家。还瞎说联动的后台在总政，是肖华。对于朱的把军队干部斗光了我也有共鸣。我当时也说我们那么多的老干部，对斗邱会作极为不满，我这样作是想把群众运动的缺点强加中央文革。实际上肖华和邱会作都是中央文革保下来的，江青和伯达同志亲自把邱会作【原文两字不清楚】机关。朱成昭给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联动思潮在我思想中的泛滥，经过几天的斗争（听过讲话后），我已基本肃清，但还要进行斗争。

朱成昭与联动之四

四月七日我东方红×××、×××到北大附中找顾××，核对了周××在四月五日和我院×××说的有关朱成昭的材料，顾××认为情况属实，并作了一些补充。

1、二月初地质东方红总部办公室主任第一次找周××，当时周等联动头目正想召集大会向毛主席请罪，该主任要周写关于联动的材料，说准备把联动的头目朱××保出来，周等写一份很厚的材料给该主任，让他转交中央文革，不知交了没有。

2、×××问顾，朱成昭在三月一日谈到江青同志说了些什么，顾说朱成昭在这个问题上与彭××一致。彭××说江青讲话就是胡说，感情冲动什么都讲，总理每次出来都得给江青擦“屁股”。又说：“江青说一些话简直叫人不能相信，什么王任重与刘志坚勾勾搭搭，什么她（指江青）也不知道王任重住在哪儿，怎么不知道？”（彭画签）

3、说到阎长贵，朱说：“阎长贵也不过是64年北大毕业生。

4、北大清华的很多人以后都是掌握国家机构大权的，地质也是一样。

5、朱对清华的1016的王××很欣赏。

6、周听完朱的讲话以后思想波动很大，对顾说要有作为，必须能逆流而上。

朱成昭与联动之五

四月七日地质东方红×××找到了联动头目丁××（据说丁是联动七委之一），丁揭发了一些与朱成昭的关系问题。

1、二月上旬丁××、周××、于××开始对联动问题有认识，希望找三司，通过三司找中央文革联系，准备起义，开始向毛主席请罪，这时地质东方红陈××通过师大女附中×××、×××找到周××说要联动头头，此 后陈六次与周等有联系，前四次都是周、于、丁三人，第五次（二月二十七日晚）有周、丁、顾、彭七八人。第六次有周、丁、顾、彭四人。其中有一次朱成昭出了面。3月1日下午，朱送彭一直到北大附中，对北大附中红旗一些人作了演说，丁说：“当时我们请罪找他们很急，可是看他们的样子比我们还急。”

2、第一次是在二月上旬，地质陈××要周整理联动材料，说要中央文革，并跟周等看中央机密文件，密字03号，还问我们看过没有，知道不知道，我们回答不知道。第二次记不清了。

3、第五次是2月27日，由陈××和一个矮个福建人，主要谈形势。陈××问了联动许多情况。当时，我们几个人思想大多数处于刚认识错误状况，除了彭××外，本来没彭，听说她回校了，陈才打电话叫她来。

4、第三次是东方红成立半周年。陈说阎长贵可能来了，我们三人去等，想见阎长贵，后来他没来。

5、第六次是2月28日早，主要是彭，我当时一言未发，不同意又吃惊。朱讲的问题很多，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总之，是我们认识错了，想得到他的帮助，没想到他们完完全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在场的有陈××和一个叫老狐狸的。

（1）谈到干部问题时，朱说老干部全斗完了，就剩下陈伯达、戚本禹，他们能带兵打仗吗？上海十七级以上的干部统统打倒完蛋了，这不符合主席的政策。

(2) 运动 后期了，你们中学先趴下，十年以后叫主席为我平反，二十年後主席为我总结，三十年後我掌权。这时彭××连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彭还说：“现在不干了，二十年後再谈。”

(3) 中央文革并不是很好接受主席领导的。

(4) 说聂元梓踩着别人向上爬。北大是中国的栋梁，以后北大的人上来，聂元梓没有好下场。

(5) 谈到阶级路线，朱说：“以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现在是龙生王八，凤生龟，老鼠的儿子满天飞。”

(6) 我们问，我们在中央文革眼里怎样？朱说：“没说的‘反革命’”。

(7) 红旗四期社论发表是我们的胜利，是咱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你们的努力。

(8) 你们都是人材，只是中央文革没有很好引导。

(9) 朱约彭一道去青海。

後丁谈，当时我对你们东方红寄托很大的希望，因为前几次和陈接触，他都是以下面人物出现的，可是万万没想到他是这个样子（3月1日），使我特别惊讶，特别失望，脑子也特别乱。当时我和顾××中朱的毒不很大，当时就认为他是反中央文革的，所以二、三天後我和顾开始整理朱的材料，交给蒯大富。而周××受朱的影响就很大。听说第二天一整天躺在床上想问题。又回到联动状态，而且更发展。以后地院东方红开始整风，我们以为这回可能有希望，可是一看大字报大失所望，根本没抓到点子上。所以我们就准备贴大字报揭朱成昭一家伙，可听说中央文革保他，于是没贴。我们和蒯大富谈了朱的问题，蒯很生气，叫我们整材料，贴大字报，说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告诉他，朱现在总乱跑，蒯说：“朱这样的家伙再乱跑，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地质东方红××× 67.4.7

“星星之火”宣言

星星之火战斗队

1967. 08. 01

全国广大的工农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保守”的，“犯了错误”的。直到目前为止仍有极大的“保守势力”，人们不禁要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是什么？现在的路线为什么就那么不深入人心？

也许有人解释说，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革命的任务不能叫工农兵来完成。那么，在此特殊阶段、特殊主力军的情况下，难道不会有特殊的代表不了工农兵的领导吗？

目前的情况是党指挥了笔杆子呢？还是笔杆子指挥了党呢？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难道偶然吗？所有这些一切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央文革。

无数事实证明中央文革某些人矛头指的不对，依靠的路线也不对，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提倡凡事要独立思考，鄙视那种因人而异的小人。在学校里中央文革有较大的力量和基础。但是学校内部的反对派已在走向成熟和壮大。在工厂中中央文革也有一定的力量，而反对派的力量正在积蓄和发展。在农村中，中央文革的市场不大，控制不了那么紧，相反，“保守势力”很强，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在军队中中央文革也有一定的力量，然而多次地犯错误已使广大指战员燃起了不满和疑怒的火种。总之，中央文革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国广大人民中间没有多大市场，它只是空架子，是纸老虎。只是在知识分子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北京在毛主席的身边，却是中央文革控制最紧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是那样的平静和肃穆，但是压迫和反抗是成正比的，愤怒的火焰已燃在基层人们的心中。中央文革……干群众不愿干的事，压制群众所要求干的事，他们爱群众之所恨，恨群众之所爱。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能以革命利益为重，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央文革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被反动路线迫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

《星星之火》战斗队明确知道我们的成员还很少。我们的能力也很有限。但是我们有雄厚的，坚实的，最可靠的群众基础。许多革命同志已经不再受蒙蔽了，而且已经觉醒，仅仅由于社会上某些压力而暂时不能和我们并肩战斗。

让历史作出最后的结论吧！

红卫兵联合起来，炮轰中央文革！

原转载于首都中学红代会崇文区委员会《赤遍全球》，1967年10月，第三期。

四·一四思潮必胜

——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

1967. 08. 03

（注：据了解，信的作者是四一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四一四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纓。）

XX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他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大联合的核心人物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苦奋斗中浴血奋战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一. 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任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样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阶级斗争依然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首先发明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一次的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没有这新生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与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本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派”。十七年来掌权的是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片面强调文化大革命前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会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目前来说：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分路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四一四）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二. 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那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那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四一四派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反动路线，但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一般他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南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

由此可见，四一四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四一四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以至于向保守组织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四一四这批造反派在白色恐怖下，争取胜利。不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以至于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它一万步也为造反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

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 都是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造反派中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在当前对待党、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是暂时统一的，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团派作为一种思想是一定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其顽固的代表人物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或劳动人民化。

三. 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我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会受蒙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也会有先进和后进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正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四一四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势力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到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的，只不过是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些，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结集最可能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打落水。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防修反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敌我矛盾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他们。

四. 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进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份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四一四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 and 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的障碍面前，必须出现新的高潮，四一四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四一四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份，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付统帅的对抗。因此团派的同志嘴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象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平反”。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文攻武卫”，象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四一四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 and 对待团派有错误的四一四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才是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

权，象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感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权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作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和分化、削弱造反派。

我们四一四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问题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枪杆子对权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小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四一四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权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后，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四一四派的特点，坚持四一四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群众，并使用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即没有能使受蒙蔽的群众及战士所接受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这样做了。

重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四一四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远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

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

我们四一四派应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

五. 四一四思潮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河南造总要垮台了！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武汉三新靠边站！……清华四一四派必败！全国四一四都完蛋！”有些团派同志企图把四一四派打下去，扫除夺权斗争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即使是日趋破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四一四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后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的四一四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四一四必胜！

为什么四一四必胜！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四一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成份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四一四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四一四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四一四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将四一四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善起来。四一四是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总在打击下“锻炼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时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局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他发现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代表人物也被无产阶级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主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有四一四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为核心，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

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革命化的四一四必胜！

你的战友× ×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按语

按语：

这封信是我们一位同志给他的一位战友的。

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信中的坚持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四一四思潮”。

我们坚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会取得最后胜利。

予此我们发表该信全文，以供革命同志参考。

清华大学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上海 反复辟学会

1967. 08. 05

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将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最后斗争局面的新时代！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亲手埋葬美帝、踏平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惊心动魄的时代！

这是我们创造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的如火如荼的时代！

这是历史大踏步前进。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就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最大？

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在中国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最大！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大立伟大的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顶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推进到第三个里程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阶段里，决不允许也绝不可能有第二个所谓“顶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时代，谁否认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正如列宁时代否认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下去就是犯历史性错误，堕落为千古罪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世界共伐之！

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俄国，不是德国；

俄国出了列宁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中国，不是俄国；

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怎么办？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优秀、最杰出、最坚定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是我们时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它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明灯，它将永远成为放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圣地！

时机到了！

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

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全部沸腾起来了！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反对和防止人头滚滚落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迫切任务，这是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句话，这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向何处去？是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比中国红色政权的崩溃有更大的打击了。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样：“支持人民中国，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的侵犯，是一切革命的和爱好自由的力量和人民的历史性任务和生命攸关的问题。”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那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在那里反复辟，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思想往往是动摇的，容易接受或右或“左”的反动思潮，也是青年运动拉向右转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反复辟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二十五年前，毛主席明确指出：“按照中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两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高峡雷霆之势，如暴风骤雨，起源于北京，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生动！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其现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研究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等于解决了世界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是研究世界的捷径。我们的时代，谁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世界是一句空话，不首先注意研究中国，所谓研究世界问题，一定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研究现状必须以中国为主！毛主席历来最关心、最重视。最强调中国问题，对中国的国情做了最大量的、最深刻的、最严密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最高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笔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财富，我们还只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有人借口搞运动，拒绝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正如毛主席所说：“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出合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以全部精力投入运动，对于中国最高水平的朝气蓬勃的现状熟视无睹，一无所知，只能背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未免太坏了，有愧于“毛泽东思想故乡”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进行客观世界的反复辟，如果不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反复辟，不跳出“私”字的局限性，不从“我”字中解放出来，所谓理论研究是搞不好的，其理论也一定是不彻底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反复辟事业必将导致失败！

一切服从于前线的战斗，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句话，有利于共同学习、运用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他们应当是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具有冲天革命干劲和相当研究能力的。本学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是我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全世界毛泽东思想化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大刮无产阶级强劲的东风，十级、十一级、十二级……，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光辉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哗啦啦飘扬的新世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程，无限的光明，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就在前面！

反复辟学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

(摘要)

武汉新华工敢死队

1967. 08. 10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〇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讥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

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我的检查与交待

朱成昭

1967. 08. 15

原编者按：反革命右派分子、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八月十五日写的所谓检查与交代，是一株大毒草。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以便进一步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

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
67. 8. 15

第一部分 我对错误的认识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化革命开始——红旗66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止〕。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红旗66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

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吃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第三阶段（一月革命风暴——67、7月）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

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颂“黄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中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 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

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谈心。可是对这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在闭门思过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向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1、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师，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师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起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书？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拔。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对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朝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红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

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1-2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确实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我的态度：

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朱成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文攻武卫”是反动口号！

星星之火战斗队

1967. 09. 03

“文攻武卫”口号的出现社会上起了极坏的影响！

“文攻武卫”这个口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支持“造反派”的旗号，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派的作用。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文化革命的一个特点。例如：走资派挑动群众甲打群众乙，那末，中央文革某些人应该教育群众甲，揭穿走资派的阴谋，使这两派群众不打。然而“文攻武卫”的出现却正好迎合了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目的。从这可以看出，如果“文攻武卫”的提出者不蠢才的话，那么她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文攻武卫”！

要文斗，不要武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转载于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创刊号，1967年9月20日。

揪出“五·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星星之火战斗队

1967. 09. 03

一提起周总理人们会肃然起敬，尤其是“老”红卫兵对周总理更有无限热爱的感情。

“五·一六”兵团一小撮王八蛋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

在大学生中“五·一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实力。并有相当大的思潮。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做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五·一六”兵团破案之后，中央文革的走卒大学红代会连个屁也没放，中央文革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象群众扭送公开反总理分子公安局不要的事情，更是举不胜举，这次“五·一六”兵团的全部释放就更说明了——“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轰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原转载于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创刊号，1967年9月20日。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

——陶铸……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支队

1967.09.14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伟大的转折完成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小集团暴露了他们全部诡计和阴谋相继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他们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文化……革命的权，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避开了一大暗礁，将革命的航船向最后胜利的方向急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顶峰，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先进的革命势力作最后的拼死挣扎的产物。袁世凯以他反革命两面派特别的“机智”和特别的“手腕”夺取了清朝皇朝的政权，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志士的血泊中又竖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袁世凯王朝。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袁世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搞垮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是他自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袁世凯和他封建的政权被革命的浪潮淘尽了，而袁世凯以险恶的两面派手腕而遗臭万年。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以百倍的疯狂，万倍的阴谋来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袁世凯式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原来的主子已经被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了，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要重新翻身一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就利用在党内的地位，搬出了他们老祖宗袁世凯的一套，大耍两面派手腕。在关键时刻，总是以“左”的和“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企图使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翻个个儿，重新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相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这正如姚文元同志所说的：“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的自我吹嘘，他

们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在大革命中拼命地耍阴谋，打击和贬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以至于连群众的小字报也不放过，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抽象的、空虚的。他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利用手中大权千方百计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故意贬低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些文件和口号，甚至干脆无视这些重要文件和口号；另一方面，又装得十分谦逊，以便炫耀自己，腐蚀迷惑和欺骗那种不坚定的群众以及幼稚的青年人，陶铸在中央的几个月中就是这样干的！

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篡夺党政军大权就必然削弱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至于搞倒无产阶级司令部。袁世凯式的人物第二特征是：“他们用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文化大革命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下去，这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要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怀疑自己，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此外二月以来，群众中广传着一种中央文革分派的流言，什么总理、康老、王力、关锋、林杰是一派，江青、伯达、戚本禹是另一派。袁世凯式的人物自作聪明，以为放出这种风来既能利用极“左”思潮造谣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能巧妙地掩盖自己；既能促使左派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错误，又能最好地保存自己。可是天公不作美，武汉事件和全国性的516兵团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伎俩，这般自作聪明的家伙，真象其老祖宗袁世凯一样，逃不过历史的无情惩罚！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袁世凯式人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姚文元同志说得好：“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很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的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

袁世凯式的人物不但企图垄断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垄断了一些主要的报纸的权，而且还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不仅如此，他的手伸向了军权，他们运用天空中的一点乌云，神经质地夸大，促进左派犯错误，散布“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企图打烂伟大长城，分裂伟大长城的人民解放军，全盘地搞垮毛主席和林付统帅的军权。一手篡权，一手搞“大翻个儿”，其心何其毒也！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四个特征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忱歌颂了贫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这儿毛主席所歌颂的群众运动具有最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乃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似乎比任何人都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但是在极“左”的看来热情洋溢的歌颂下面，把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等等资产阶级的东西硬塞到今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中，

以此实现其“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台”的阴谋，从根本上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付统师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违抗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以极“左”的面貌去纵容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派性，并利用这些东西加剧和另一支革命派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更恶毒的是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引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阶级阵线的轨道。陶铸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大力散布“怀疑一切”的思潮，提出极“左”口号顽强地把运动引向歧途。林杰一方面支持414，而另一方面又和团派大谈支持414的辩证法，和其集团上下配合加剧团派和414派的对立，并且煽动团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事件发生以后，袁世凯式人物大力宣扬极“左”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妄图一举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把运动拉向最右方。但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一切的一切连同他们自己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的火车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飞奔疾驶的必然趋势，也决非袁世凯式的人物所能扭转！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极右的目的。他们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极左口号来把干部、群众、军队推向敌人方面，以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目的，而且不断地煽动我们队伍中的极左思潮，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去冲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他们特别重视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似乎比别处更为重视一些，大概是因为东北三省对中国太重要了！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六个特点就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武汉事件和武汉事件后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继陶铸的换头术后创造了又一次政客手腕的奇迹。

武汉事件是袁世凯式人物的极右企图暴露以后“机智”地退却的一个大阴谋，一方面保护实力，一方面制造混乱，促进左派犯错误，进一步把水搅混，与武汉事件配合，立刻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些左派一时没有识破此口号的反动性，上了当，于是左派犯的错误被右派利用了，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危险。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袁世凯式人物的阴谋。9.1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发表大转折的讲话点破了他们的鬼计，把准轮舵，敌人的布局打乱了，面目暴露了。然而袁世凯式的人物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耍弄他们“机智”手腕来搅乱阵线，保护自己。于是林杰问题突然泄露了。炮打林的风一下子象老天预先准备好似的乱将起来，运动似乎纳入了袁世凯式人物的轨道，谭厚兰被斗了，师大似乎翻了个儿，全市两大派的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戳穿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两面派阴谋，再一次对革命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引导，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掩盖已经暴露的黑手的貌似特别“过火”的高级手腕又破产了！结果水并未搅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乌云敌不过太阳，小小袁世凯的两下子虽然能够篡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也怎能敌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怎么敌得过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继刘少奇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袁世凯”永远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航道向彻底胜利的方向，突飞猛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江青讲话发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准了革命航船的轮舵，绕过又一大暗礁！

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大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空前巩固。

看！上海市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成长壮大。所有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大树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坚决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把我们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看！军委扩大会议胜利了！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印把子，以保证文化革命后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里，以保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牢牢地纳入毛主席指引的轨道！

看！伟大的长城巍巍屹立，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支左，军爱民，民拥军。毛主席、林付统帅亲自统帅的人民枪杆子队伍牢牢地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看！全国一个上下结合的大批判高潮迅速来到，刘邓彻底灭亡之时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来到了！

伟大的转折带来了伟大的胜利！

打倒刘邓陶！打倒大小袁世凯！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字报上有许多批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 “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

（北师大井造一兵）

2. “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延河）

3. “他们分析得有道理。”（02一兵）

4. 此文作者都为《必胜》的东方红00支队。]

原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7年9月15日

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
——评陶铸之流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 周泉纓、杨忌
非

1967. 09. 17

最高指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一、陶铸之流的文章在1967年6月重版的时代背景

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夺取成果的决战阶段了，这是无产阶级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战役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阶段。它标志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的時刻来临，它吹响了把一切剥削阶级送进坟墓的大喜号！

但是敌人，正因为他们是敌人，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对派决不甘心於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因此在这个决战阶段，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比任何时刻都要尖锐万分，都要复杂万分！

把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纳入哪个阶级，哪个司令部的轨道，建立哪一个阶级的政权，乃是文化大革命决战阶段中，两大阶级，两大司令部，两种革命家的分水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代表，在这一决战时刻，他老人家向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了战斗号召：“必须善于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布署，这是决定文化大革命最後胜利的一个号令。将文化大革命坚决地毫不偏离的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文化大革命就能落实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上。不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这个轨道，那么必然会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文化大革命成果就会像辛亥革命成果那样被袁世凯篡夺。第三个轨道，第三种前途是不存在的。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陶铸之流——“袁世凯”在这里充分登台表现了。它和伟大统帅毛主席完全针锋相对。他在毛主席发出战略号令的时候，亲自命令群众组织小报抛出了他1944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大转折到来之前发表，在毛主席发出号令的同时发表，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预先策划的。

这篇文章打着读毛主席著作，歌颂群众运动的红旗，抹煞群众的阶级性，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极端化地强调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灌输和领导的必要性。这篇文章表面上也讲甚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权，骨子里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这篇文章在此时（1967.6）此地发表的要害是把全国文化大革命在关键时刻引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妄图利用人民的动力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权！从而一举扼杀文化大革命！篡夺其成果！

这篇文章是袁世凯式的反革命两面派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宣言书。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到顶峰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篡党、篡军、篡政的反毛主席，反毛主席战略布署，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战略布署，必须对这篇大毒草痛加驳斥！在此我们对此文加以初步批判。

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参加群众运动的群众也是划分为阶级的。这是马列主义对群众运动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是一方面，如果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方面，如果抹煞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抹煞马列主义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法，那即便他们比任何人都高叫政权，他们所叫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观点，运用还是抹煞阶级分析方法，从来就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打开毛选第一卷第一页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儿毛主席首先给了我们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这一革命分析最基本武器，一切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个武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也是如此。毛选的第二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典范的使用了这个武器，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情歌颂了群众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所谓笼统的歌颂，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在该文中特别强调歌颂了“革命先锋”，歌颂广大受剥削受压迫最深刻对地主阶级仇恨最深的半无产阶级贫农。把他们看成群众的主体，群众运动的主体。毛主席在该文中写到：“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的大业，革命的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可见主席全文热烈歌颂决不是全面性的群众，而是靠近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主席在该文中所论的功劳绝非全民群众的功劳，而是只有贫农这个阶级部分所能创造得了的功劳！主席在文章中对农民之富农是批判的，而对中农则是鼓励和团结他们。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阶级分析是何等英明呀！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观点是何等地强烈呀！！

可是这个野心家“袁世凯”，在他1944年写的，又在1967年6月在群众的小报上发表的用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文章里，拚命地在掩盖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以最少的句子歌颂了贫农，然而对中农富农的问题只字不提。这完全等于抹煞了群众的阶级性。他把一个超阶级的群众观点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头上，说甚么……乃是把群众的痛苦当

成自己的痛苦，把群众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他还说甚么：“毛泽东同志完全是群众方面辩护，群众、群众、群众的主体是甚么？农民、农民、农民的主体是甚么？毛主席是甚么群众的辩护？！这儿群众的阶级性没有了。馀下的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全民社会主义”观点！抽掉了群众的阶级性就等於抽掉了群众运动的灵魂——鲜明的阶级路线和强烈的阶级目的！於是“歌颂”就脱离了马列主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全民式地歌颂了群众的一切。“过火”都是好的，可赞美的，群众中的每个部分都值得歌颂，而伟大群众运动的成果也就成了人人有份了。於是群众中各阶级的目的在这儿调和了，合二而一了！

当然现在并不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他们的政治目的，过火行动的目的是有明显的阶级区别的，有的是为妨修，反修，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是开始不理解犯错误，后来理解了跟毛主席了，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只是个人自身解放。有的则为再分配阶级权力大翻个儿！“袁世凯”在此地违背现实的目的正是纵恿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迎合否定十七年，要求致力再分配的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阶级欲望，搞“大翻个儿”，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合法的！

这种极“左”的“歌颂”，全民式的“歌颂”，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把群众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为复辟资本主义作准备。

三、否定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必要性

中国历史上有上千万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运动，其中大多数是伟大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皇朝，农民战争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断前进。农民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农民推动了人类历史，这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性。

然而为什么从秦到清各个朝代里没有一个农民运动真正把受地主阶级压迫下的贫苦农民解放出来呢？为什么没有一只农民军能够真正稳固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利益的政权呢？为什么？为什么？就是缺一条没有毛泽东思想统帅的工人阶级的引导，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引导，没有这一条，就没法克服他们小生产者的劣根性，就不能取得最後的胜利。

一切群众运动尽管它是天然合理的，但是他们都不可能自发地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工农群众进行灌输！由此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他们决不可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自觉的毛泽东思想的水准！他们的自发要求决不能上升到他们的最高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他们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後解放自己。到了运动後期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果就被久居统治阶级地位的剥削阶级窃取了！他们种下了桃树，而剥削阶级摘去了桃子！一句话，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作领导，一切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代表自己阶级的最高利益，去夺取运动的成果，建立相应的政权。

这个问题在小资产阶级特别广泛的中国尤为突出！历史上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林彪同志说得好：“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切群众运动，一切革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可能永久，最后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而被纳入剥削阶级轨道！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修防修彻底根除剥削阶级根子的革命尤其如此！可是“袁世凯”在文化大革命夺取最后胜利的严重关头公然抛出他的大毒草来抗拒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引导！

他在重新发表的长达二万字的文章中，大反所谓的改良派，鼓吹群众运动的自由化。看他说的：“在物理活动的现象中我们碰到这样的规律，即事物的某些运动（这里是说运动的一种形式不是说运动的一切形式）在达到它的目的和定下它的重心之前，时常要或多或少越过它的目的或重心。在群众革命活动的现象中也有这样的规律”这儿引导不见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在哪儿，先锋队率领作用何在呢？

当然为了迷人，作者也不得不抽象地说几句：“无产阶级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群众的意见……”“纠正他们他们可能犯的错误”等等。然而由于作者抹煞了群众的阶级性，极端地“超阶级地”“笼统化”群众运动的天然性，由此必然要抹煞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他在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甚么：“调停”——这是陈独秀的根本观念，他这个根本观念，就是漠视群众、限制群众和否定群众的观念，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论。

此地他只字不提陈独秀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尖锐性，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性，从而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让资产阶级篡夺了“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结果使群众运动半途而废，其成果完全被蒋介石篡夺。这一点你“袁世凯”今天否定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要两面派手腕，把群众运动引向资产阶级轨道，企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是多么维妙维肖啊！尽管你装着给陈独秀扣上了托洛茨基的帽子。但是你的目的还是要保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实质——反对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反对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于是他们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归宿上合流了。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你抹煞了群众运动的阶级性，抹煞了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引导的必要性，你就根本不想提无产阶级如何引导群众运动了。

在任何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到来之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区分在哪儿呢？区分在于是否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去作调查研究，去作阶级分析，从而对阶级关系，阶级力量，作一个严格的客观估计，以便最准确地最勇敢地站在未来群众运动的前面去领导群众。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谈到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要点的第1点就是：“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的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总代表，他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首先提出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谈一切群众运动包括革命战争，因为没有前者，后者是空虚的，不现实的。

“袁世凯”这个修正主义者就和毛主席对立。他尽管也空谈地谈一句、两句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但是他在根本上不让年青的革命者知道怎样“引导”运动，根本上抹煞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具体性。于是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谁容易领导？谁不容易领导？引导他们的甚么？哪些东西要提高？哪些东西要预

防？哪些东西要克服？等等问题。更谈不上分析形成这些问题的阶级根源和阶级内容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政党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运动就成了空中楼阁了，而余下的是你“超阶级”的“歌颂”。“歌颂”实质上是保留和扶植运动中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影响方面，使之放任自流。在关键深刻一下子翻转过来吞没群众运动的天然合理部分！这就是你们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引导”，这就是把运动纳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轨道！

在你文章抛出的同个时期（1967年6月左右）毛主席有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主席就明确地分析了大革命中各种政治势力和阶级力量。强调要依靠工农兵。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知识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的血液中。所以，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引导是多么具体啊！阶级性是何等分明啊！而你明明知道主席的用意，而偏偏要发表你的狗屁洋文来对抗伟大统帅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真是罪该万死！

应该特别指出，整个群众运动过程实际上是代表两大阶级的政治势力，用自己的“理论”顽强地争夺“引导”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的过程！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当权派，都在毛主席指出伟大战略命令的同时，顽强地引导运动，千方百计地迎合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力求使它泛滥，扼杀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部分，从而达到篡夺运动成果的目的，复辟资本主义！而你“袁世凯”在1967年6月这个关键时刻重版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一切敌人向我们争夺引导群众领导权提供的武器！全国性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在六月后非但没有失败，反而不断滋长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你——“袁世凯”。

四、用“民众政权”口号来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任何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都相应地要解决一个政权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的步骤不外乎是两步：一是引导群众去打碎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是打碎无产阶级的一切；二是引导革命群众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演变的过渡政权。这儿第二条是衡量革命群众运动被引导到甚么轨道上来的最终标志。当然资产阶级革命家“袁世凯”站到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也必定要最顽强地在政权问题上来“引导”群众运动，与毛主席相对抗。

“一切权力归农会”和列宁的“革命民众政权”一样是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接合，在民主革命时期用来引导革命农民运动建立向无产阶级过渡的政权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强烈的革命阶级性，它只适合于民主革命时期，用以对当时农民运动的领导，使之更好地纳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轨道，而决不能生硬地搬到改善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中来！

用个这口号引导农民运动是历史性的，有条件的，暂时的。今天我们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决不是搬用这个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应当充分理解主席如何用马列主义引导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解这儿的策略性。

更重要的是在提出该口号时，紧紧联系的，必然要强调农民运动的阶级性。毛主席在《报告》中说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决依靠贫农的农村革命政权。强调阶级性的目的就是强调这个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主席就告诉我们这个口号的策略性和阶级性。

可是狡猾的“袁世凯”，就利用这个口号，运用到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来，特别是登上赫赫有名的小报，以引导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他在该文中谈到政权时，避而不谈掌握该政权的阶级，避而不谈毛泽东思想如何引导该政权，避而不谈我党对该政权的具体领导，避而比谈在该政权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而“超阶级”地泛泛地强调此政权的“合理性”“完全正当的”“是真正的革命道德”，等等等等。泛泛地谈甚么依靠甚么“实力”建立政权。更为露骨的是作者赤裸裸地脱离阶级分析人为夸大这种专政的能力，甚么“农民革命取得权力，就改变了生产关系，同时改变了农民自身。”甚么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是统治天下的第一号能手……“老实说纯粹的“农民政权”“民众政权”“农会政权”之类是不可能存在的，历史上出现的政权中剥削阶级的只有三种“奴隶主政权”“地政权”“资产阶级政权”而被剥削阶级政权只有唯一的一种那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无产阶级政权”脱离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脱离了无产阶级作核心任何一个（除了无产阶级）被剥削阶级都不可能建立代表自己最高利益的政权，所谓“农民政权”“民众政权”统统势必被剥削阶级“引导”成为“剥削阶级政权”！它根本不可能真正改变生产关系的实质，根本不可能解放农民自身！这是历史，这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由上分析，可见“袁世凯”的政权口号只能“引导”群众运动去实现资产阶级专政，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在现时的中国，抽去阶级本质提出所谓“民众政权”“农民政权”等口号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只不过换个面目，耍个手腕罢了！

应该点明，在“袁世凯”重版他的文章之前，伟大统帅毛主席早已提出了用毛泽东思想引导运动的政权口号了。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两个政权口号，一个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另一个是“革命的三结合政权”。现在强调的是过渡性的临时权力“三结合”，在提到这个口号时，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详细地论述了甚么叫“三结合”，也就是它们强烈的无产阶级性。指出它是妨修反修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新形式。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相结合提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中唯一能引导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唯一口号。是保证改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口号！这一口号比历史上的运动提出的和革命家实践了的关于政权的口号要高多少倍！任何革命家所提的口号都不能代替它！

这样“袁世凯”的“要害”，就很明显地揭露出来了。他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口号这完全用来对抗毛主席的“三结合”政权口号的，其目的为了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争夺引导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实现一个必然向资产阶级演变的政权！

这个口号以极左的面貌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无政府主义，从儿使之泛滥起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抵毁伟大长城——人民解放军，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此外也直接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权力再分配”“大翻个儿”的要求。帮助他们去摧毁文化大革命，摧毁十七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袁世凯”的心是多么狠毒呀！

回忆陶铸所谓“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对比你提倡的“抓军内一小撮，夺军权”的口号不是一脉相通吗？造反派要阶级分析，并非都是无产阶级的！夺军权，谁去夺谁的军权呢？是夺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军权！所有此类口号带来的都是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都是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统统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到此地，我们就明显地见到了资产阶级理论家“袁世凯”在1967年6月这个文化大革命大转折快到来之时，重版他1944年这篇文章当中对群众运动的三个问题的论述的有机联系了！

第一步：模糊和抹煞群众的阶级性，从而抹煞群众运动的阶级性！在“歌颂”群众运动的幌子下。扶植和保留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东西。

第二步：制造片面强调运动的合理性，由此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必须灌输的必要性，否定对毛泽东思想对群众运动的引导，从而由“袁世凯”用资产阶级理论来引导！泛滥资产阶级的东西，使之成为运动的主导反面，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

第三步：制造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口号（抽掉革命低级阶段政权口号的阶级实质，换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来代替毛主席提倡的新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从而与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顽强地争夺取得大革命成果的权力。

三条牢牢地紧扣起来，最终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以及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复辟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建立必然向资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

五、打着红旗反红旗

现代中国修正主义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行“左”实右。也就是以极‘左’的面貌来实现极右的目的。

“袁世凯”这个特别“机智”的反革命两面派，在这方面有他独到之处，在该文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片面地抽去本质地强调马列主义对某个问题论述的一个方面以攻否定马列对该问题另一方面的论述，从而阉割马列主义在该问题上的灵魂。

马列主义对待群众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二是“引导”。两个方面都有强烈的阶级性。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歌颂是歌颂其天然合理的部分，引导是使其天然合理的部分发展、壮大、完善，去缩小、克服运动中的缺点，从而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歌颂是为了更好的引导。引导又是更好的歌颂，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运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但是，狡猾的“袁世凯”以极左面目抽去群众运动的阶级性，笼统地去歌颂群众运动，实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保留和发展运动中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部分，以便到关键时刻扼杀运动的天然合理部分，纳入资产阶级轨道。这样“袁世凯”势必拿它的歌颂去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对运动的引导。而实质上还是让资产阶级引导运动。

这种手法很容易迎合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在“袁世凯”的“彻底革命派”、“左派”、“一反到底的革命小将”的一片歌颂声中，我们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忘记了时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必要性，於是他们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淹灭了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就不自觉的演变成“袁世凯”的工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

跟随“袁世凯”用超阶级的歌颂去猛烈的抵制毛主席对他们的领导。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516兵团的很多年青人不就如此吗？还有我们当中……（脱落）同志不也是如此吗？

第二，抽掉马列主义革命家在革命低级阶段提出来引导运动的策略性口号的阶级本质，使之完全资产阶级，并以此来代替马列主义在革命高级阶段中提出来“引导”运动的口号，以便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将革命拉向倒转！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其他必然向资产阶级过渡的政权，这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第三，在运动的特定阶段强调各阶段不应当强调的东西来对抗毛主席在该阶段中特别强调的东西。

在运动初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分初萌芽，必然遭到反动的旧势力的拚命的压制，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千方百计的保护这枝嫩芽，以马列主义伟大的热情来歌颂它，使它迅速地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当运动进入了中期或 后期，群众运动中天然合理的部分壮大了、发展了，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引导越来越完善了。这时反动势力在强大的新生事物面前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它由压制群众运动天然合理部分，转入扶植群众中不符合历史规律的部分即它对其影响的部分。企图以该部分来扼杀运动的合理部分，最後达到扼杀群众运动，篡夺群众运动的成果的目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是缩小、克服群众运动中不合理的部分，肃清反动势力的影响，完善运动中合理的部分，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轨道，从而夺取群众运动的成果！

每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侧面是不同的。前一阶段侧重了歌颂，引导是辅助的。後一阶段侧重於引导，歌颂是辅助的。这是阶级斗争所必须的，无可非议的！“袁世凯”作为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典型是完全懂得上述规律的，於是他们就与无产阶级革命家背道而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善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後，故意抛出这篇文章，以极左的面目，超阶级的歌颂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综观“袁世凯”的全文，乃是革命导师语录琳琅满目。而“袁世凯”在这些语录下面要反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就是“袁世凯”与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点！不同点是他的手法可能更高明一些而已！

六，“袁世凯”的反革命实践

在伟大转折到来的关键时刻“袁世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以毛主席的关键指示针锋相对的反革命理论来引导群众运动。

有“理论”必有实践，袁世凯和其走卒在一起，在伟大转折到来之前干出了一系列破坏伟大战略布署的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反革命实践。其手腕之高明，其行动之机智乃是登峰造极的。在此我们不重复在《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人物——陶铸……》一文中论述过的东西，只提一些为什么？

为什么伟大转折以后党的全盘政策与姚文元同志在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如此类同和鲜明呢？

为什么过去北京的政策那么难於捉摸？为什么它和上海革命委员会贯彻的政策差别那么大？

为什么北京中央文革的阵地很多事件还要由姚文元、张春桥同志调回来处理？

为什么在毛主席早就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以后，你从来不提这个伟大战略口号？

为什么你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会上发言和姚文元同志发言内容相差那么大？对该文件的评价差别那么大？为什么在516通知发表以后，你的一个讲话和该通知合不起来呢？为什么你的讲话那么脱离阶级斗争形式呢？

为什么你在刘邓陶未批深批透以前要大力搞教改？

为什么你对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姚文元文章估计那么低？

为什么蒯大富等同志的错误老是改不掉？老是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且硬得很呢？

为什么北京的大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而且锋芒一直向上指？

为什么你和林杰对团派和四一四的态度如此两面三刀呢？

为什么你对北京两大派的6.5、6.6、6.11与（……）谈话调子如此看法矛盾？

为什么你的亲信统统出了问题？为什么你控制的报上同时在同一个关键问题上——“军内一小撮”问题上出现了大毛病呢？

为什么北京市广传你和江青同派，而总理、康老、××、××是一派呢？你把××、××放在总理、康老的后面其义又何在呢？

为什么江青9.1讲话之後，林杰问题突然泄露到群众中来呢？而北京的天派如此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林杰问题来呢？为什么师大问题搞得如此激烈呢？同时又为什么广传谣言林杰整你的黑材料呢？这和516兵团的特点又为什么如此矛盾呢？姚文元的文章中“过火”“公正”又指的是甚么呢？

为什么516兵团的规模如此之大，人物如此之厉害呢？

为什么一月来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总是非常硬呢？而这种“怀疑一切”的风偏偏刮不到你头上来呢？姚文元同志文章中讽刺“怀疑一切”就是不怀疑自己，对光揭陶铸吗？

为什么你的亲信在武汉忽而右得出奇，忽而“左”的要命，××在武汉是救出来的还是故意放出来的？换头术指的是甚么？

为什么武汉问题之後政策波动如此之大呢？“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指的是甚么呢？9.1以后政策为什么又回潮呢？

为什么在武汉问题上姚文元借用红楼梦的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的意思是甚么？

为什么武汉问题以后，你控制的报（）抓“军内一小撮”？而同时全国都夺军权？此外你的亲信到处去夺军权。而这与你一贯对待军队的态度又有何关系呢？

为什么前段群众中广传谣言林彪同志的军委和中央文革的矛盾不调和呢？

为什么“武汉运动”论这种极端反动的理论竟流传那么广？影响那么大呢？

为什么武汉问题前後，大量学生就已纷纷外出，谁放出“第三次大串联”的风？为什么当时在底下广传“中央文革半只眼睁，半只眼闭”，默许这类流言。而後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反动的，严重地打乱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与你有着甚么关系？

为什么全国中央已肯定了的革委会都受极“左”思潮的很大冲击？

为什么你亲信的手全伸到总理的各部口呢？××为什么对外交大权如此感兴趣呢？在这里不禁要问，奇怪的洋人李敦白与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在中国掌那么大的权？呆那么长久？

为什么总理的各部口总是一团乱，没有一点治呢？而你和你的人在总理的各种常委中权力又很大呢？……

够啦，够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全局性的问题，都是最大权力的问题，都是涉及文化大革命胜败的问题，小小的××、××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他们的主子你，才能办到这一点！

对于你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看一看你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你的历史，便可从你的登峰造极的两面派手腕中发现你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黑手终究是黑手，只要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一照，就完全能识别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流血不怕、砍头不怕、刘邓陶不怕、何以怕你小小的“袁世凯”呢？

为了捍卫毛主席亲自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决心杀出一条炮打“袁世凯”的血路来！“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包括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把我们头颅系在我们的腰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倚天剑斩断“袁世凯”这只伸向文化大革命的黑手！

（口号略）

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

——我的第二次检查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周泉纓

1967. 09. 24

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一）思想过程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餘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后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祇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414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414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對於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

如有别的甚么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后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后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眼，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么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后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么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于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大字报发表后，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於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都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后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因为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於是，我断言414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後來师大问题起来，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然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此时，我祇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踢对516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无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二）尝试式的行动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

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414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a. 把全部思路讨论祇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b. 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c. 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414总部会议。

d. 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勾”的办法。

a. 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后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佳。

b. 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于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後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後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

完蛋，轰一炮！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于是我终于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我决心下定后，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祇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忠诚的。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四）背景问题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后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么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么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我的无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于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泽东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后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414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414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414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后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五）思想检查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于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以下几点：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使用集权，先斩后奏，当然事后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414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姚文元文章。终于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台阶。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后，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后，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后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部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2. 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概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3. 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么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么危险啊！

今后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剜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

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泽东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后退！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

1967. 10. 00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世界东方兴起的二十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我觉得许多人讲改造，却都是一个空泛的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最终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这几个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

我们今天参加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天讲造反，天天讲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却是一个空泛的目标，对于目前中国的社会的完整的阶级分析，对于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肯定不能称为“文化革命”，暂用此名代称）的原因，性质，目的（即这场革命的“底”等等）这些问题有研究的很少。

为什么毛主席说：“连我提议的印小册子的意见全被否决……有时只我自己同意自己的意见。”为什么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国家机器有很多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垮了没有什么坏处，垮了就让它垮。”为什么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确实是少数，为什么陈伯达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最新动态，为什么戚本禹说中央很高的负责人都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而哭过？为什么中央里几个忠于毛主席的人对中国现状都估计得如此激进？对于中国十几年的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估计？

为什么各级党委都被摧垮？为什么揪出来那么多走资派？

为什么要搞一月夺权风暴？为什么党团员、干部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趋于保守？为什么文化革命前的先进人物现在几乎都是钢杆保皇？如尉凤英、时传祥、张百发、夏菊花、刘考安、瞿太安。为什么一些敢于想问题，有头脑，敢于造反的人以前被视为调兵捣乱，如郭嘉宏，有的长期被拒之于党团员大门之外，如刘英俊等。为什么文化革命中揭发出来的事实简直与文化革命前一般人的认识相颠倒？为什么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

激进的造反派经过一年多残酷斗争的实践头脑里堆砌着许多问题，找不着答案，很多人虽不自觉，但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强烈要求产生了，滋长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大叫人感到不满，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很不活跃，新东西很少，人们的思想感到几乎要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第一个打破了沉闷的空气，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谁胜谁负并未解决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此后，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活跃，57年58年毛主席多次讲到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强调了反官僚主义。60年毛主席以他那无比的马列主义天才创造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类似既得利益集团，62年毛主席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强调了干群矛盾，指出中国搞得不好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非常反动的法西斯专政”，1964年毛主席指出：“现在的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并以他那深刻、准

确、尖锐的见解第一次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毛主席后来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号召地方向中央进攻。毛主席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伟大思想，象一小幽灵一样，徘徊于中国大地，从她一产生起就毫不畏惧地向一切反动思想界，向国内外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发动了不可抗拒的猛烈的进攻，毛主席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导师，他站在最前列，他的思想使中国的思想界又重新趋向于活跃。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套理论，思想是崭新的，由于作为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她一掌握了群众，就必将致强敌于死命，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思潮，整个反动的思想界以及旧习惯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对毛泽东主义发动了猖狂的围剿。尤其是在国内，毛泽东主义直接触犯了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中国的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毛泽东主义遭到了更加残酷的围剿。联动叫嚣拥护60年以前的毛主席思想，（六〇年以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就是这种对毛泽东主义刻骨仇恨的最好表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利用权力，把毛主席最激进、最革命、最生动、最活泼、最本质的思想严密的封锁起来，只传出一些一般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习惯势力，对新思想的不理解，在十几年中千方百计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光辉的名称搞成为一个神像式的东西，千方百计地阉割和歪曲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灵魂。

尤其在今天，在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思想万岁这句口号在不少场合几乎变成了攻击毛泽东主义的挡箭牌，长保军正是喊着这句口号残酷地围剿毛泽东主义，长高司也是喊着这个口号可耻地背叛了毛泽东主义，如今工联一小撮修正主义头头也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后边迅速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作为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的毛泽东主义，她关于中国的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论述，都是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此理解的人很少的。不少人一听毛主席讲：可能会变成法西斯党就想不通，地富反坏右还能来掌权吗？他不知道地富反坏右没有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本，但是在政权内部掌权人中却出了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会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变成法西斯党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套在中国不灵了”（毛主席的一套贯彻不下去了！）有人一听就跳起来，“十七年的成绩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有人立刻大叫，这是否定共产党，……

对于毛泽东主义，对于中国大地上暴发的这场伟大革命，人们是多么不理解呵！不仅是保守派，造反派也不见得很理解，不少造反派虽然参加了这场革命，但是对于这场革命也有不少的人很不理解（正如很多工农刚参加民主革命时对于民主革命的纲领，性质，对象，动力等并不了解一样），不少人口里喊毛泽东思想万岁，而实际上对主席的思想根本接受不了，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们也发生过动摇，目前革命出现的曲折使“极左派”中产生的思想混乱状况，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可以断定在今天的中国，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信仰毛泽东主义（真正接受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思想）的人，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是很少的。

不少人都这么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报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必去研究。结果很少人象毛主席刚参加革命那样，敢于想，敢于提出新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毛主席认为建党初期，我党是很活跃的，而解放“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

理。”由于上述的旧习惯的顽抗，目前很少有人象建党初期那样形成对于政治变革的主张的讨论风气，很少有人提出新思潮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独特见解；中国的思想界目前还不够活跃。不可否认很多报纸上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提出的理论已不够用。如“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给人启发很大。但它是从理论到理论，从刘少奇的词句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没有讲出刘少奇猖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没有具体分析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有哪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产生了发展了。有哪些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了产生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是较高级的。它提过一个重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讲到为什么时，它只说了地富没有资本，但如果问到党内产生走资派的条件，原因，社会基础，却没有很成熟的看法。很多地方都可以遇到这种社论不够用，甚至束缚思想发展情况，需要用触及本质问题的理论——毛泽东主义直接武装群众。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思想界有一种压抑感觉，从另一个问题上也得出以上的结论，为什么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可能存在呢？在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中国，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列宁在讲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条件时指出：“布尔什维克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潮和政治派别。”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共合作么！也有统一战线。”而毛泽东主义这种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派别还未在群众中形成，所以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目前还不能存在。

而毛主席教导我们：“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革命群众掌握了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义，革命群众才能产生出自己的先锋队——革命政党，也只有在这时，革命人民才能完全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段文化革命就是连造反派里最激进分子也很少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没有认识到政治大革命暴发的原因是中国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向”，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没有认清这场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最终目的。群众基本上是自发的，是中央文革下个指示才能前进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扶着我们，把着手前进的，我们还不自觉，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全国廿十多个省市前一段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革命政党。“而没有革命的政党，革命是不能搞彻底，不能深入。”毛主席的伟大声音：“形势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意味着群众运动由自发进入自觉的伟大转折，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群众发动的很充分，一家人在一起也讨论国家大事，毛主席为什么那时不讲这句话呢？因为那时革命群众中的先锋分子政治思想上还不成熟，而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革命人民不但广泛地发动起来了，而且还逐渐锻炼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分子逐渐成熟，由自发到自觉，陈伯达同志说：“现在是思想阵地，理论上，为阵地，落后于运动的形势，这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不要落后得太远了，因为理论是经验的总结，总是由实际问题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开出灿烂的花，理论的花。”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创了，且开大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接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当前最切最要的问题，即是毛泽东主义小组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过的惊心动魄的路程教育了千千万万的群众。尤其是一月风暴那扭转乾坤的伟大场面，八月风暴空前残酷的斗争和出于常人意料的变动，更是使新思潮越来越喷薄欲出。毛主席解放以后把被万把大锁锁住的一系列最精辟的讲话的印行（全部是非法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思想的传播更是最好的条件。中国各地出现了那么些激进分子，不但出现了那么些不信邪的激进分子，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好文章（这些文章根本未收齐），这些激进分子虽是极少数，但思想越来越完整。特别是由于毛主席的引导（主席今年提出“财产权力再分配”的理论给了激进分子强大武器）激进分子逐渐趋向于形成独立的政治思潮和派别了，这些都说明了目前成立毛泽东主义小组具备了一定条件。

一切决心献身于这场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战士，一切有研究政治的决心真正信仰毛泽东主义趋向新思潮，立志改革的激进分子。一切忠于毛泽东主义，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关心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注重于社会调查的实干家！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毛泽东主义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

推翻中国的新生产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我们为施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以推动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实现我们的最高纲领。（关于实现目前纲领和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必须要写文章，深入阐述这场革命起码要五年到十年）

改造中国和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毛泽东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最高的信仰！

与工农相结合——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猛地投入实际斗争并起先锋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作风！

对于毛泽东主义的真正学习，对于政治的彻底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真调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和周泉纓谈话纪要

周泉纓

1967. 10. 24

按语：在周泉纓同志被一些声称“群众”的人扭送到市公安局去以前，我们和他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于十月十九日下午将详细记录如实整理成座谈纪要。因为文章很长（近一百张大字报），从今日起我们将分批陆续发表。

鉴于清华某些人不能对事物一分为二，不分析研究，只凭看文章作者的姓名，就对文章采取绝对化的态度。不讲道理，武断撕去大字报，鉴于某些同志对“毒草”只采取“封锁”的手法，不让人家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毒草”，以肃清其毒性，而是简单地对大字报采取“一撕了之”的不恰当手法。我们特此郑重声明，不允许任何人武断地把大字报撕掉。

如果有人撕大字报，只要他不怕真理，只要他讲道理，那么必须在“撕”之前，与我们充分辩论，只要他说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也会采取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

任何人，如果他胆敢无理撕大字报，那么由此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策划者全部承担，包括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惩罚他的一切合理要求。

有材料揭发你收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你到底对大革命怎么看呢？

答：同志们对我说过的一些错话，做过的一些错事加以揭发批评，这是好事，是对我的爱护，革命小将尽革人家的命，也要允许人家革自己的命。过去，我在四一四里尽当“秦始皇”，不当老百姓，逼着同志们按我的想法办事很不民主。这回大家反过来，批评我一下。这很好嘛！特别是三七战团的同志对我的弱点批评的最淋漓尽致，我应当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脸色还比较诚恳）至于收集阴暗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每个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失去信心的人是不少的。有人动不动就要上山打游击去，我可没有嚷嚷要上山打游击吧？每当东方红战团中有的同志谈阴暗面多一点的时候，我总是说：“眼睛不要光看到鼻子尖儿，世界上的大事不要急嘛。有毛主席在，有林彪同志的一支军队在，你慌什么？”按我看，在每个关键时刻我估计形势在清华还算得上是个“乐天派”！当然战略上估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战术上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是谨慎的，按习惯语说法是：“决不让老保翻天，也不让极‘左’翻船。”战略的信念是落实在战术运用上的，两者是对立着的统一，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问题，是很大，很深，很长的问题，我按我的理解谈一点看法。有的是在东方红战团常聊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严格地说是无产阶级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用自己的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

历史上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都必须有个相当长的过程。现在毛主席的理论把过程总结出来了，分为二步。

第一步：是先进阶级用暴力从没落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第二步：是先进阶级手中的权发挥伟大的神威，反对旧的阶级利用余留下来的旧的上层建筑演变和颠覆新政权。复辟旧经济基础。坚决地变革经济制度；坚决地打烂旧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上层建筑来适应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上述两步，新的制度就完全代替了旧制度了。第二步比第一步艰苦得多，长期得多。因为上层建筑的东西，人的精神的东西，不象制度那么好变革，它很顽强，能量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旧的上层建筑完全可能反作用过来，把新的政权颠覆掉，复辟旧制度，这是历史车轮的倒转。不要太幼稚，暂时的倒转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整个转变时期内紧紧围绕政权问题，复辟与反复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所谓新政权神威首先是用来反对反动阶级复辟的神威。

历史上，每个制度的大转变过程中，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欧洲，法国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复辟过。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我国的历史很怪，奴隶社会只有六、七百年，而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则花了近千年的时间。这是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周朝依靠奴隶革命推倒了殷朝，建立了周朝，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皇朝。以后这个皇朝发挥新政权的巨大威力，变革奴隶制度，使之向封建制度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奴隶主是顽强地搞复辟的，舆论在前，暴力紧跟。（翻小本子）小的不说，最大的所谓“管察口武庚叛”的武装暴乱就是一个典型。奴隶主进行复辟的形式是利用自己在周朝政权中的地位来进行复辟。这似乎和现代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点类似之处，当然新政权要反复辟。首先是军事镇压，然后在打击一小撮的同时，用软的一手，即用金钱，物质刺激，名利等拉拢大部分，强迫奴隶制的瓦解。强迫相应的上层建筑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主席天才地全面地总结了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先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继续在政权问题上与没落阶级展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历史规律。从而破天荒地建立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进行着伟大的实践。关于这个理论的几个重要问题，报纸上，文件上讲的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仅仅从历史规律性这一点出发是难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现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复辟的危险要比历史上任何复辟的危险要大千万倍，原因有下面三点：

1. 转变的国际性：

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以后，航海事业迅速发展，这把一个往来很不密切的世界连了起来，很快就开始了殖民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不断地国际化，这样也促进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革命事业上联合起来，于是革命也越来越国际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接踵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国际性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比如：苏联修了，对中国内部就有影响，外界压力就加大，全世界的战略重心就转变东移。比如说，亚非拉革命运动起来了，我们要支持，对帝国主义压力就加大。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我认为，在资本主义联合对付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下，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但是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独立完成

伟大转折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基本上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才可能在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应该和不可以不断向共产主义转移。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现在看的比较清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存在，修正主义存在，他们对抗社会主义的影响，入侵就存在。这样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消灭的，国内的职能也完成不了。第二方面，有帝国主义就有战争，有反复辟的战争，有世界性的战争。有战争就要花很大的力量搞战备、搞原子弹。为此，各国革命要互相支持。中国要支持兄弟人民。所以，生产力不可能主要丰富人民物质生活。

这样分析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是国际化，它和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是很不同的，必须是全世界一块来，这也可能同发达的生产力有关，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相当强大，国际上各个被压迫阶级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要联合起来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对我们的进攻，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国际转变任务就非常艰巨了。伟大毛泽东思想统帅下中国人民，将要为全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来。

2. 转变的深刻性：

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封建制度是从奴隶制度上长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身上长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了，就是在一切制度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要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的转变，不仅是个政权问题，制度问题，还有一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留在人们脑子里的余毒的问题，这样转变就空前深刻了。在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接班了，斯大林同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同志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放弃了辩证法。在掌握历史规律方面，人的能动性、政权的能动性都发挥的很不够。二十年中阶级斗争规律反复问题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尽管是历史原因，但也有斯大林同志的过错，其结果使敌人暂时得了一点势。社会主义由一片缩小为“一面大旗一盏明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困难就更大些了！

全面地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现时代反复辟反复辟任务的艰巨性以后，我们再来看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好象就可能比前面看得深刻一点，更远一点，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反复辟的大革命的意义何在呢？一句话，是在世界上树起一面社会主义永远不倒的伟大红旗，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这面伟大红旗标志着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宣告资本主义反复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深刻地证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是具体的现实的。这面伟大红旗将以无可非议的权威指挥着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阶级去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激动地挥手）。

是否可以这样评价毛主席亲自指挥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给世界无产者指出了共产主义前景，如果说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向着这个前景迈开了一大步，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为全世界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开辟了具体的道路。

问：你讲的境界似乎远了点，我们想提两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的结论哪儿来！第二，你说文化大革命实现大转变的具体道路问题，那全世界到底怎样转变呢？

周答：先说第一个问题，“共产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国实现”的论断的理论根据我知道只是上面两条。其实马恩列斯毛都提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一句格言：，“无产阶级

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如果实现共产主义应该说彻底解放了吧！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国无产阶级首先解放，这是不可能的。

问：噢！你这样看的。

二. 国际战争完成国际的转变

周：我再谈谈你们问的第三个问题。

谈这个问题我先谈谈自己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

林彪同志好象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毛泽东思想一旦武装了人民，那将发出很大很大的物质力量来，马列主义不但而且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自然的巨大反作用力，这可以举个例子：大学里学哲学，老师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问题，讲得很死，人的能动性表现不出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西藏从奴隶社会急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解释呢？老师不知道是不敢回答，还是回答不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因为书本上没写这个问题吧！现在我们已能用毛泽东思想解决这个问题了。原因很简单，是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军队的伟大的能动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理论掌握西藏人民以后，产生的伟大能动性。同志们想一想这个能动性多么大呀！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这是什么速度？火箭我看也没有那么快吧！对吧！（扬眉、开朗）

世界怎么完成伟大的转变呢？这一点，首先也得从伟大理论掌握人民就能发出翻天覆地的物质力量这一点出发。

上面说到完成伟大转变分两部，一是夺权，二是用权，反复辟，夺权的理论实际都解决了，有了样板。而用权反复辟彻底完成转变的理论基本保证，有毛泽东思想保证，一定能胜利，既然这样，全世界人民都向中国这面大旗看齐，全世界人民都来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前途不是很清晰了吗？我很看重革命理论，我坚信，一旦理论问题解决了，实践是很快的，只要理论是先进的，你不会去实现别人也会去实现，人民是一定要将它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的。马克思发表资本论到今天大概一百年吧！100年在历史上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世界1/4人口进入社会主义了吧！多快呀！要知道中国完成封建转变花了近千年的时间呀！比较比较就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威力了。

问：具体怎么转变法？

周：还是两步出发，先是政权问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中国这面社会主义大旗牢牢的竖起来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就有了现实化的理论，有了世界具体的前途，有了具体的道路，这就给全世界人民增加了信念，增加了勇气。可以肯定各国人民都将去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都将向中国这面大旗看齐，革命之火就迅速从中国向世界蔓延，首先是从压迫最深，帝国主义的统治最弱的地方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始。

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文明和富饶的源泉。革命卡断了帝国主义一个又一个的源泉，那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加深帝国主义之间对抢源泉的矛盾也会加深，其结果使帝国主义的大后方本土燃烧起革命之火来，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如果估计帝国主义会让这种“连锁反应”进行下去，把他们活活地绞死的乃是机会主义的。敌

人终究是敌人，他们要反扑，要最后反扑，要作死亡前的联合，要联合起来使用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暴力的矛头肯定是指向要对准世界革命的大旗中国的。第二次大战开始是狗咬狗，后来狗们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联合了起来，向苏联社会主义进攻了，这就是先例。当然在敌人联合面前各国人民武装也必须联合起来反对敌人的武装联合。

伟大的转变必定要由伟大的人民战争来完成的，这是历史的结论，历史的规律，国际化的突变也定要相应的国际上人民战争来实现，这也是容易预料的，二次大战转变了一大片，三次能否把帝国主义送进坟墓呢？我看有可能的。革命的暴力是新世界的产婆，你不想联合使用暴力，人家要逼你用，除非你眼看着弟兄一个个被扼杀！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大联合的铁拳必将接受国际无产阶级的请求，犁掉全世界的资本主义。

余下的第二步就是防复辟，反复辟，完成转变。那时候比中国现在的防复辟就省力一些了。第一，原则，理论已经建立了，而且在中国实践了。第二，红色政权全球开花，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如果一国变了，我看可以用联合使用暴力的办法解决。当然人类还是有创造的，各国在转变过程中还有把毛泽东思想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这里国际转变的不平衡性还是很大的，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可能完成第一步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假设一下，比如通过第四次大战，完成上述一切的一切，人民定要付出代价的。

问：你这些都是推断的。

周：是的，的确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但我觉得比较现实的。我看我们这一代免不了要打一场大战，这种味道现在越来越能嗅到了。

三. 成绩的衡量法

问：意义谈了，成绩如何估计呢？逍遥派为什么这么多呢？

周：一个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意义，伟大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往往是很难估计的。用物质、用钱、用死人、用眼前利益是没法估计计算的。时间上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范围不是几千里江河的问题，有时候是上百年或千年的发生作用。这给历史家带来难题，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境界低，眼光短浅而挨后人的臭骂。

问：有实例吗？

周：有的，而且很多，例如，秦始皇这个人物是人人皆知的。但是我看很多关于秦的评论中，似乎很少有比较合理的。秦皇朝兴有十年时间，十年很短吧！历史一刹那时间。可是这个封建皇帝，在这个十年中，为最后向封建制度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机构。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制度。中国在秦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朝代中的帝王将相，基本上是在秦基础上运动。光说筑万里长城一事死了很多人，但是长城以后各代中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的人，得到的东西比失去的大得多呀！长城是人民造的，但秦始皇的组织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这位封建皇帝最后因为残暴的阶级本性和操之过急而垮台了，但是他比起镇压农民战争起家的刘邦、李渊、李世民来说是有贡献的。秦始皇十年中巡视全国多次，要知道当时只有马车！亲阅各种重要文件，我看这位天子，在封建皇帝里是够雄才大胆的了。

可是很多历史学家，不会评论农民运动，连秦始皇也评论不了，他们往往把秦始皇骂的比其他皇帝都坏，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对农民的软刀子和硬刀子没有太大差别，都应该批判，而且软的更该批判，因为他迷惑人，问题是对历史的贡献和政治事件的长远意义，有客观的评价罢了。

封建时代的政治事件的成绩，意义是如此深远广大，何况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伟大人民革命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了伟大的革命，搞掉了政权机构中如此大的叛徒集团，发动倾国人民来搞理论批判，触动着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根基，这种魄力是有史以来没有的，人民直接掌握伟大理论的时代开始了。

革命象核聚变一样在七亿人民灵魂中产生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现在震动了世界，而且将对世界的未来起巨大的作用。精神的力量化为物质力量，要有时间，有空间，有人们的实践。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在世界表现出一些来了，将来精神核能放出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种能量也可能是要放很多年，很多年，可以预料，用我这点境界去评论世界上第一次广度、深度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付出代价的成绩，也不可能有不犯错误的革命事业，问题是什么阶级什么革命家用什么立场来衡量这些事业，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则是最有气魄，最有远见，只有他们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看待革命成绩的伟大意义，主席就是典范。当然有魄力、有远见、敢于付出眼前的一切代价，去换取伟大的成果，并不等于战术上对敌人的麻痹，要知道，每当革命大风暴快要取得成果的时候，敌人总是企图夺取成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翻船的问题，要记着历史上无数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成果丧失的教训。这种气魄、远见，是辩证统一的，这是对革命人民高度负责，主席就是这样做的。对于我们，世界革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一旦颠覆，世界历史车轮将会迅速倒转，这可不是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必须学习毛主席，现在毛主席提出一系列最新指示，全国局势已定，决定了成果的取得，至于一些具体问题是可慢慢解决的。

比如你们说的逍遥派是容易解决的。

第一，要看好的一面。

我进清华七年了，没有象现在这样浓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现在许多人都在看毛选，看马、恩、列、斯著作。人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当然这些学习当中有些是“失败者”“战胜者的军队最善于学习”，这个我深有体会。一年多来，在大风大浪中游泳，许多人都喝了不少水，吃了败仗。现在，战胜者在更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极好的现象，这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具体表现。

第二，要具体分析。

逍遥派中一些人是一直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件书籍的，他们在这里下的功夫很大，他们不仅这样深入细致的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他们是“小人物”，似乎是默默无闻的，对小人物不要蔑视，对大人物不要迷信，这是我一贯法则。须知在很多问题上，“小人物”往往比大人物更容易理解和应用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何等深刻呀！毛主席有句话：“事情是小人物作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后面记不

起来了，这句话很英明，充满了辩证法。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革命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战败者”，当然，也难免有一些“悲观论”者，研究角度不一致，态度不一致，但是我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下，在大革命威力逐步发挥的状况下，这些人中，必定会有不少人将来很有创造，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当然也必定有一些人走向反面，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还有一些吃喝玩乐的逍遥派，这是少数。只要组织。引导可以不逍遥吗！

第三，要允许不平衡，不要慌，十个指头不一样长，七亿人相貌也不一样，不平衡是绝对的，大家认识不一致，很多人在某个问题上一时跟不上来，水平不同，不断的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嘛！在一定时间，一定的问题上，多数人总是可以统一的嘛！统一之后又会不统一，在不统一面前不要慌，逍遥派在斗私批修这个伟大方针指导下，总有一天会组织起来的。联合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历史上每一个大突变后，都需要一个相当的稳定期来搞平衡，这是规律。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不是一个个过来了吗？再大吗？世界大战不是也过来了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要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嘛！刚才念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到这儿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和平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儿的“和平”都首先是以不和平的暴力和政权来保证的。

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把“妥协”搞成目的，搞成主要的、唯一的手段，放弃武装斗争，搞投降，把权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印尼就是这样的，遭到了巨大的挫折，法共对资产阶级妥协、妥协、一再妥协，卖掉了灵魂，完蛋了。

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对世界的伟大转变作出伟大的贡献，人多应该贡献大，这是应该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要有苦干一辈子，紧张一辈子的精神，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改造自己，习惯于紧张、艰苦的斗争。必要的修整为更猛烈的斗争，不是逍遥，要永远使人民的锐气尖尖的，活力雄雄的，斗志高高的。平静安逸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没有好处。

四. 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

问：大革命具体怎么收法？

周：为什么要收吧。

问：这不很清楚嘛，也很简单。

周：你说说吧。（等片刻）怎么不说了呢？我替你说，你给我补充。事情的过程必须是波浪形的，有高潮、有低潮，有峰有谷。一浪接一浪向前推进。高潮、顶峰指的是平衡的突破，是前进的标志。但不能老向前进啊，人跑累了要休息一会再跑，机器运动长了要冷一冷，机修一下，于是出现了低潮、谷底。这是旧的平衡突破以后，为了达到新的平衡的必要阶段，是迎接新高潮的到来，不是浪费，这是规律，不以你的主观愿望变化的。人跑长了要昏倒的，发动机开长了要拉缸、断裂，到这种局面时被动了，再来修整补充，就已经违背规律了，修整的时间反而长，反而费劲，结果想快反而慢，想直反而曲，“以迂为真”是孙子兵法一术语，这术语大概也有这种意思。

一场大革命往往是被根本改变社会制度打开了局面，从根基上动摇了旧社会制度，但完全把旧制度变成新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叫几声“彻底砸烂”就万事大吉了，完全彻底地完成转变，要很长时间，要在革命大风暴后的很长时间里完成这种转变是一个很长期、很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转变，有条件、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群众觉悟、革命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还有轻重缓急主次的问题，它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紧急最主要，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修整、巩固、妥协”是必要的，这种时期有时需要相当长，我相信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能够加速完成这种转变，使历史更快地前进。但是人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这一客观规律。特别是“国际性地转变到共产主义”这样一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更不是人们所能改变的。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同时争取尽可能的加快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

“修整、巩固、妥协”这种词似乎是没有光彩的，其实不然，这是在大革命大变动后的巩固阶段的很必要的手段，其效果是巩固大变动中获得的成果，修整大变动的损耗，总结经验，结聚力量，以便第二个高潮更快到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对敌人来说，上述措施能够更好地分化他们、孤立他们，使我们矛头更集中，歼灭战打得更彻底，很多矛盾解决得更符合发展要求、更辩证。此外，及时必要的修整、巩固在某些场合可以防止外来的突然的冲击，或有准备应付这种冲击，比如战争长，某些时候能防止敌人翻我们的船，使他们们失机，等等，等等。

关于这些，实例很多。封建皇朝统治者有的很狡猾，很善于妥协，结果往往一个朝代要垮台，又搞得中朝复兴或朝代延长，周朝、汉朝都有过中兴时期。各朝代前几个皇帝都很懂得用一些妥协来修整民力，补充战争的损耗，以便瓦解农民武装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唐太宗、刘邦可算是他们当中这一手最高明的了。相反，秦始皇处在封建制度刚刚完善时期，他残暴过急而不懂的修整、妥协，十年就垮了，这是封建时代。现代也同样，当然事业的本质是不同的。列宁时代有过很多妥协的措施，有的很成功，是很必要的。例如，在1928年和德国定了一个条约，妥协了，退一步为的是进两步，因为年轻的苏联实在需要修整啊！否则很容易死亡，当时布哈林这混蛋反对，好”左“呀！但是”左“的结果是要翻船的。我们毛主席的伟大政策也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比如给定息，可以作为孤立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补充手段！政治上孤立敌人瓦解敌人，改造他们，而我们的代价可以少些，这里钱是次要的，很合乎我国国情，合作化后要整社，合作化后要修整，自留地保留一段有好处，大跃进后要巩固、调整、充实、提高，不能一直前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困难年间要注意人民团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修整、巩固、妥协”的政策也是采用的，目的当然为了巩固成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问题首先是一个防止翻船，巩固成果，保证胜利的问题，军队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军队是在社会中的军队，社会的阶级斗争势必必要反映到军队内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估计这些问题。要不要搞，肯定要搞。关键是如何搞法，何时搞？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如何？“揪军内一小撮”、冲军区，似乎很革命、很彻底，但是须知用这种方法搞军队，估计错误且不说，主要的是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搞是要自毁长城，军权要丧失。

军队是政权之灵，军权一丧失，不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手里。我看外国人不打进来，也被敌人翻了船。当然军权一失掉，帝国主义必然要打进来，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暂时

的失败和巨大的挫折是完全可能。不要太幼稚。伟大统帅毛主席坚决反对“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号召“拥军爱民”，这是英明的决策。这个英明的决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想翻我们船的阴谋，牢牢地保障最后的胜利。

干部问题，上天安门都是左派吗？我不大信。毛主席说“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嘛！要使用一批犯错误的干部，甚至有一些有过反毛主席错误的大干部，这样做对敌人不利，孤立了敌人，对我们有利，光靠罢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下，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他们嘛！肯定的，干部队伍不可能百分之百纯的。真空抽到了小数点后面几个九，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或更多的空气呢！宽大一些是一种妥协，一是反面人物还有暴露过程，而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了改正过程。二是党内外群众还有个认识过程。斗争是长期的，上述两个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违反了这个长期性的规律，操之过急，扩大打击面，反而对敌人有利，对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好处。

群众认识问题，过急不行，要实践，要有个认识过程，用过急的办法达不到快速的效果，突变和冲击很必要，但不能老突变、老冲击，让人民群众用“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原文如此——刻印者注）的方法，通过“斗私批修”来解决，这是一种修正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后要修整，要巩固成绩，要完成很多具体变革，要发展生产，准备战争，要使精神上的成果落实到人民革命实践中去，要总结经验教训，要聚集力量准备世界的转变或者本国更大的革命高潮。主席好象说过要修整十年，不知是否真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妥协”必须以具体条件而定，必须有大前提，即必须用政权和革命暴力来保证，“妥协”是革命的辅助，如要使之过火，使之过长，那就要走向反面。比如全国解放时，攻占北京城，团团围住傅作义交待政策，迫使他缴枪投降。

五. 思想分派问题

周：再谈具体收法中的一些问题。（看一下笔记）

问：谈哪些呢？

周：有关权的三个问题吧！一是思想分派问题，二是出身成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问题，三是干部问题。

问：好，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

周：收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加强巩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有的可能要多次大革命来解决，会有反复。我只谈这些眼前的问题，可能很错误，大家讨论。

当前世界上主要的思想体系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没落思想体系。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思想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是人人皆有的，因此两种思想的斗争，常说的“公”与“私”的斗争，在人人头脑中都存在的。“公”相对“私”而言，“私”相对“公”而存在，一直到共产主义才会没有。问题是谁为主导，所以思想本来就不是统一的东西，而是对立统一的，分成两个体系，两大派别的二种思想没有联合的问题，一个压倒一个，一个拼命的扼杀一个。

思想体系的斗争最集中地反映在知识分子界。这个问题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尤其突出，因为剥削阶级搞劳资对立，企图独霸知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两个对立的阶级的思想必

然要反映到知识界，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斗争是永恒的，这种斗争是以政治派别斗争来表现。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在社会突变时尤其明显，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代表封建主义的孔子思想和代表复古主义的老子思想对垒，比如，近代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垒等等，不但在哲学界，还如在文艺界等方面还有同类现象。

由此分析，上层建筑中思想斗争分派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既然是规律那就不以人的主观意识而转移了！

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来魄力最大，深度最大，广度最大的革命。最厉害的一点是把理论、哲学斗争全面推到工农兵中去了，让人民自觉地搞思想体系的斗争，让人民自觉来搞上层建筑，让人民在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使劳资之间的差别空前缩小，使得很多知识更群众化，这个大力作为效果是什么呢？上面谈了，是制造巨大的精神核聚变，这种能一旦转化为物质的话，那就不得了，影响大得很，深得很，既然群众搞思想斗争，那思想斗争分派的规律性也必然要反映出来。群众中的思想派别出现了，这是坏事吗？我认为是大好事，为什么呢？（思索）这样讲吧！原先，人们脑子里的东西，无产阶级的东西不一定占统治地位，小生产者尤其如此。无产阶级思想即毛泽东思想要在群众中灌输的，因为毛泽东思想先前在人们脑中很少，以至没有，血统工人也只是接受这种思想能力强的问题。十七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在人们脑中，特别是在小生产者脑中还有市场，资产阶级思想还很强，在很多地方还是占统治地位，在这个状况下若是很平静的，统一的，那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人们统一、平静，这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个问题没有狠抓。人民思想似乎不象我们大革命中那样起伏的厉害，相对来说，平静一些，统一一些，其实这种统一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统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人民最高利益有何好处呢！十月革命到现在五十年，五十年的今天，斯大林时代这种所谓“稳定”“平静”的恶果就显示出来了。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反作用起来，起了复辟的转变现象，结果挡也挡不住。一个伟大的事业走了痛苦的回头路。

现在，我们在大革命中出现了急剧的思想派别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在人们灵魂中向资产阶级夺领导权，这是痛苦的转变，所以运动起始时，对于直接关系到政权问题，对保守思想体系采取了冲击手段、强制的手段，这有好处，能促进运动，促进在人们灵魂中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反击。当政者“拉一派，打一派”，对思想体系来说，从来如此，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初学革命的小将也懂得，我们是主张在思想上拉一派，打一派，你们这里有“八·九”的同学吗？（没有！）我对“八·九”在思想上是毫不留情地压迫。去年在哈尔滨我写了一个五、六千字的传单，印了十几万份，是典型的拉一派打一派，拉革命干部潘复生，打走资派李范五，当时我提向潘复生致敬，有的同学说不能向当权派致敬，我看不见得，拉红色造反团，打“八·八”团，说“思想派别斗争一定要有谁战胜谁的问题”。有的人很不同意，说这是“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我想这种大的思想冲击还会有，来几个反复交锋，我们就能控制灵魂阵地了，这样，对政权制度起反作用之后，我们的政权就巩固起来，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造反和他斗！文斗不行，串联起来搞武装的，一点也不让复辟！这就不会象斯大林那样吃亏了！这有何等好呢，我看好的很！好的很！问题是在组织上如何正确处理，思想领域中的派别斗争，思想斗争有敌我的，有人

民内部的，人民内部有非对抗性的，也有对抗性的，性质各有不同，所谓性质不同，指的是矛盾的双方直接相关的阶级关系不同。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是非对抗性的，长期存在的，处处存在的，不能说斗争的双方是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因此解决的基本方法也和敌我矛盾不同，和人民内部的对抗性的矛盾比如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同。解决方法中在大革命时期采用冲击是必要的，但作为长期的方式是极“左”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伟大真理意思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派别斗争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性质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法。

当前，每个革命派都必须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伟大号召。组织上大联合是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思想派别问题的保证，他将有利于我们打掉小资产阶级派性，真正从无产阶级党性高度来进行思想派别斗争。比如某个问题上你的思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就要坚决向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靠拢，不要象以前那样考虑组织上的小山头了，这就会大大促进我们正常的思想斗争，使我们内部更容易一步步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样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用阶级暴力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派别斗争。而我们的力量就更容易集中对敌，这对于对敌斗争是必要的。反之如果用背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势必于人为地划分为“造反阶级”“保守阶级”，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派性泛滥，无产阶级党性被抹杀，资产阶级党性就抬头，内部斗争很难逐步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与此同时组织上对无产阶级毫无意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斗争就纠缠不休，这样敌人可以利用它来搅乱我们的阵线，颠覆我们的政权，所谓从“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动摇无产阶级专政，是有这个内容的。

运动初期和中期在群众中出现了派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派尽管是走资派挑出来的，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还真实地反映了思想派别斗争的规律，这一点不应该否定，也否定不了，这种派别矛盾又不完全反映正常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派性斗争在组织之间泛滥起来，以至于掩盖了敌我矛盾的内容，敌人、走资派很容易利用它来搞我们，很多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不但没有很好地解决，反而急剧地向敌我方向转化，结果常常出现了敌人在一旁看，自己阶级兄弟猛开战的惨象。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等工作根本没法进行，革命似乎有停滞的趋向，伟大统帅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搞大联合，组织上先联合，思想跟上，相互促进（又补充一句：当然这是符合规律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精神变革总是比组织制度变革要落后一步）这样，小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就容易逐步克服，至少使它不占统治地位，然而“斗私批修”，这样，真正有效的思想斗争就可以推进了。种种资产阶级流派的思想就可能大大地削弱了，毛泽东思想可以逐步在各个领域占领导地位，所以说，所谓思想派别斗争指的是资产阶级各种流派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人民内部，组织上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也许这个问题你我同一观点，到那个问题上就不一定了，但思想上肯定分派的，客观上看是如此。因此思想派别并非指运动中的“八九”“八八”“四一四”“团派”了。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并非“思想派别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里仍然有哪一派掌权的根本问题。（稍停，想了一下）我记得毛主席好象说过，人民内部有各种

派别，有党派，权掌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人民关系极大。思想上是分派的，哪种思想派别掌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掌权或最终要掌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政权问题上就是要寸步不让！在全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权，在各省各地，必须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掌权！单位也是如此！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究竟谁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呢？用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截然错误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不是自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革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识别选择而成的！在各个关键时刻、在平时，谁能把握好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谁就应该是掌权者！苦难的中国人民选中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花了很大代价和时间！各级专政机构和领导人物要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当然也有不断的新陈代谢，这是无可非议的。

八. 干部问题

问：干部问题如何看？

周：干部问题和看待十七年问题紧紧相关的，先得说清楚如何看十七年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多，也很大。我再谈谈看这个问题方法，具体的研究的很少。

结合教育制度这个具体问题来谈吧。

教育制度是个上层建筑的东西。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份复杂，有封建主义的，有殖民地的，有资本主义的，有修正主义的，但总的来看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然首先是搞土改、搞镇反、搞经济恢复，使年青的红色政权站住脚，才能进一步搞变革经济制度，最后才能逐步地花力量来变革上层建筑，使它适应经济制度的变革，进一步巩固政权，这样旧社会留下来的教育制度变革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后，具体如何改？如何变就有一个逐步的认识，逐步的实践，十七年来在教育变革中，广大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就是在努力完成这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

有不断实践逐步认识的过程，这一点对任何人都毫不例外，问题是在于对旧教育制度是采取什么态度，是彻底革命，彻底砸烂旧教育制度呢？还是进行改变，保留旧教育制度呢？这是两种革命家根本不同的态度，两种态度、两种目的，前者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制度，后者是为了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和制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前者的总代表，而刘少奇则是后者的代表，蒋南翔是他们的爪牙，于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

一个要变革教育制度，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一个要培养劳动者，一个要培养所谓的“工程师，专家”，一个要彻底变革，搞半日制、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亦工亦农亦兵，一个则要搞全日制，保留旧制度。

在实践上一个大力提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个则拼命吹捧清华教育质量高，大搞研究院等等、等等。

在斗争中刘少奇的斗争艺术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主席路线是阳奉阴违，随着毛主席路线的深入贯彻，教育变革也越来越触及本质，与此同时，刘少奇对主席路线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最近几年完全公开对抗主席的地步，教育革命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呢？只有经过在政权中把刘少奇打下去，夺取他们的教育大权，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历史的分析，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性的东西。第一，有过程，第二，充满着革和保的斗争，第三，斗争形式是在同一面红旗下进行的。斗争是逐步激化的，并非一下子全面开展的，敌人、刘少奇、蒋南翔有一个充分暴露的过程。第四，尽管近几年来刘少奇的路线，在教育界许多环节上似乎特别猖獗，但是，从十七年再加上大革命总和来看，主席路线在教育革命中是占领导地位，是不断推行革命，不断压倒刘少奇路线的，在这些初步的结论性的东西的基础上再来看干部问题就容易了。

第一、十七年来毛主席统帅着大部分干部对旧教育制度进行变革，变革是逐步向前的，这就意味着是取得一定成绩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靠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但是具体实践主席思想的是千百万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贡献的。

第二、两条路线斗争有逐步深入的过程，阶级敌人是处在掌权的地位，他们的斗争艺术是极迷人的，他们嘴脸的暴露也需要有个过程，因此好干部在主观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客观上恰恰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的是刘邓路线，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观与客观分离的观点，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个贯彻过程。干部对主席思想的理解、认识也要有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干部头脑中的旧东西，必然也要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主席的东西，这样就在某些时刻某些问题上执行了刘少奇路线，这是他们的主观原因。

由此可见，毛主席关于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客观现实的！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好干部身上就有两个方面了，一是忠于毛主席，努力执行主席路线的一面，二是受走资派利用和毒害、执行错误路线的一面。前者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才称得上好的嘛！这是对于一般好干部的两重性。

而刘少奇则诋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把大部分好的比较好的打了下去，直到今天解放干部的问题还未解决。而这个问题在运动后期非解决不可了，否则政权巩固不下来怎么办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分析中干部都不包括走资派）严格地说决定于干部的两重性。它分为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相应于干部的错误的一面。一切阶级敌人通过走资派扩大和保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制和法权，腐蚀我们的干部，而我们干部头脑中的旧意识又适应了这种腐蚀，于是乎就被推上了执行错误路线的第一线，压制群众，压制先进事物，逐渐和群众对立起来。这严格地说，这是产生新的走资派的原因。由此而产生的干群对立由干部自己负责。

第二方面内容：和干部执行正确路线相对应：我们的干部是毛主席培养的干部，主观上都不同程度地忠于毛主席的，努力改造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去执行毛主席路线。所谓执行毛主席路线，就是直接应用政权力量去改造群众，改造客观，当然群众中的旧东西要反抗这种改造，这样也产生了干群对立，这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群众中的旧东西。

上述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矛盾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特别注意的当然是第一个方面，这是文化革命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执行有政权，对革命事业来说，政权是主要的，政权一变色，一切都变了，保证政权的红色，干群对立总是可以逐步在斗争中解决，到了共产主义，干群对立就完全消灭了。

分析干群的两重性，那如何解决干部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总结了要以斗私批修为纲。

干部经过一年多的锻炼以后，有了进步，但是还要斗私改造自己同时批修，这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一方面。群众也斗私批修，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第二方面。

在斗私批修中，干群进一步结合起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结果有利于打击一小撮顽固的敌人。群众、干部的斗私批修虽然能解决很多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大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干部问题的解决，推动和促进“斗、批、改”的完成，然而任何一个政权问题是不可能完全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的，原因是旧的势力很顽强，这里走资派是主要的，干部群众头脑里的旧意识也在起作用，这些旧意识要自觉不自觉地反抗或阻碍新政权的建立，这是阶级斗争长期残酷性所决定的，所以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力是必要的，它和干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是相互结合的，缺一不可，所谓“强制力”当然包括武力镇压敌人、走资派和任命新的领导干部在内。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

1967. 11. 16

我对知识青年运动还刚刚有一点接触，看了一些材料（能收集到的都看了）开了一些座谈会以及个别交谈，可以说还是个门外汉，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使我非常感动。调查中，知青运动的许多道理使每一个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力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知识青年暴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使整个社会为之震动，一些反对知识青年运动或冷眼旁观的人，不得不重新来评价和注意知识青年运动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将在他们面前受到考验，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派无不为之欢呼，为他们的革命精神所鼓舞，为他们推波助澜，擂鼓助威，一切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面前撕去了他们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极端不理解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一切反革命眼见知识青年运动触动了他们的根本，他们暴跳如雷了，他们妄图镇压了。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地方发生革命暴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们强烈的普遍的感觉到，因此还不能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预示着农民革命的伟大风暴，知识青年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老爷们，你们的掘墓人的新的觉醒宣布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公开镇压，经济收买和改良主义都不可能阻止你们的死亡！

新的觉醒

湖南的知识青年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

文化革命初期知识青年受到的压迫是很大的，他们几乎只有所谓“自我革命”“互相揭发”的权力，他们的反抗也是最强烈的，是他们写出全县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们很早就起来反工作组，湖南知识青年几乎全是造反派，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比学生和工人都多。

一月革命风暴时，知青运动曾一度兴起，甚至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因为他们批判刘邓安置路线的斗争锋芒触痛了一些窃据中央的老爷，又因知识青年多是造反派，因此二月镇反时他们被反经济主义文件第三条和2·17通知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而惨遭镇压。当时大多数知识青年虽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觉悟还未提高，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因此知青运动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今年八月风暴以前，知识青年和各地造反派并肩战斗，还未显露出知青运动尖锐的斗争锋芒，因此各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知青作战勇敢、斗争坚决，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九月初知青中的少数勇敢分子开展了造户口反的斗争，同时“砸烂

刘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旧教育制度的受害者”等等知青运动的道理在知青中迅速传播，随着这种以奇特速度和空前广泛的传播，知青运动很快进入了高级阶段，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他们“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顺服的奴隶一旦打碎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就如火山暴发出强大的反抗精神。

湖南知识青年运动目前成为全国知青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中南知青运动的中心。湖南关于知青运动的理论是较高和系统的，湖南知青报纸空前的多，他们的强大生命力超过了任何小报，因此湖南知青在社会上的舆论是强大的，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通过标语、报纸等多种形式在人民中迅速传播，甚至流传到外省，唤起其他地区知青的觉悟，由于有统一思想作指南，湖南的知识青年的观点又是空前的统一，造反精神也最强，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组织起来，团结在砸烂刘氏“上山下乡”的旗帜下，向旧世界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

知识青年运动的伟大历史使命

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知青运动的兴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社会的中上层走向了社会的低层，由城市走向了农村，知青运动第一次把农民变革社会的强烈要求反映到政治舞台上来，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他们处在尖锐的三大差别的矛盾中，他们看到了极不合理的现象：城市剥削农村，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过分悬殊，十七年来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和特权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三大差别。农民对此是满腹牢骚的，不少人只想往城市里跑。他们要求在文化革命中对此来个变革，而知识青年反映了这种强烈要求。知青运动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农民革命的暴风雨。

知青运动的兴起最明显的暴露出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最实在的显示出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文化革命的引起正如伯达同志所说：“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变动的新动态”。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掌握官僚机构的特权阶层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山。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广大劳动人民与特权阶层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毛主席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革命的滚滚洪流。刘少奇所代表的特权阶层，十七年就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加剧了阶级分化。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他们刚下去是有雄心壮志的，也作了吃苦的精神准备，但是现实呢？插队的就是变为小私有者的前景，办农场的就是养不活自己的生活。最近揭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中甚至有把知识青年当农奴搞变相贩卖。知青阶层和特权阶层的怪胎——联动的那些少爷小姐是我们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最尖锐最鲜明的对照，知识青年处在这种地位，他们对社会矛盾最了解，他们发现刘少奇正在把我们国家往资本主义拉，这种阶级分化现象不就是复辟的暴露吗？因此知青要求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这乃是文化大革命暴发的真正原因和直接目的。知青关于阶级分化

的理论给那些散布文化大革命是单搞意识形态，妄图否定毛主席在一月风暴中所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家伙当头一棒。知青运动标志着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将真正被群众掌握，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进行，任务的真正完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地方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有些工厂是为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派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有些农村，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林彪同志说我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而知识青年运动把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吃人的资本主义东西和本质揭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来了。那血泪斑斑的控诉暴露出来的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十七年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吗？

为什么插队知识青年养不活自己？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问题牵涉到目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状况，农民个人收入大于集体收入，以及出现同工不同酬的剥削现象就是问题的症结。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除开那些想自己一个爬入社会上层或安于被奴役状况的奴才）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主义（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找出自己政治经济地位低下的真正原因，你们才能自觉的投入彻底的革命，只有真正的彻底的政治革命才能真正解放你们和贫下中农，工人。单纯的安置路线和单纯的知青问题是不行的，必须把毛泽东主义和知青运动相结合，把知青运动的理论提高一步，发展一步。

革命的知识青年，你们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未来是属于你们和我们的，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仅仅是安置路线而是宣传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思想，完成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毛主席语录）

“极左派”和知识青年运动 （“极左派”指红中会、高校风雷等）

只因为知青要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因此他们就成了“极左派”的同志和战友。“极左派”的斗争锋芒是直指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及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两股革命的潮流汇合了，这就是敌人把知青运动纳入“极左思潮”的原因吧！

然而“极左派”却与知青有很大的差别，每一场革命的暴发都有其经济上的原因，而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些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今几乎被一切“马列主义者”所遗忘了）说实在的，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很多并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压迫剥削。不少是旧教育制度的宠儿，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敏感性，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知青运动面前暴露了他们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而知识青年呢？他们优点和工农相似，他们是自己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深受特权阶层、官僚机器、旧教育制度的压迫。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对旧世界实行叛逆，坚决造反！

“不是在沉默中暴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因此就决定了他们比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还要坚韧不拔和革命彻底。稍举两例就可看出这种差别。

学生中的逍遥派之多，难道是因为没有复课吗？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目前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出现了许多颓废、整天无所事事，逍遥，对文化革命不感兴趣以及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投降，叛卖的行为被当成革命的妥协而得不到惩罚。而只要你迈开你的双腿，到知识青年中走一走，只要你是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你就会感到从来未有的痛快和令人鼓舞。知青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是所有知识分子比不上的，八·一九时那种沸腾的场面随时都可以在知青中看到。

另外，人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在知青中的传播是惊人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改革等问题往往单纯从时髦出发甚至是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和他们谈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引起的原因、特权阶层，他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能接受，往往把毛泽东主义最激进的内容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知识青年呢？他们是自己深受压迫剥削，为了解放他们就要找理论，以明白根本原因。他们有一种真诚强烈的学习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即使是一个对理论毫不感兴趣的知识青年，和他谈起社会中的阶级分化，社会改革，他们也是津津乐道。因为毛泽东主义把他们经常接触到的东西提到了理性认识，正如他们所说，象一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从种种社会矛盾中惊醒。一个知识青年讲出了他们要求理论的朴实性：“你们谈的是从革命的原则出发，玩弄词句术语（指那些知识分子）的造反者，我们是从吃饭问题说起革命，讲哲学。”知青经济最困难，但他们办的报纸最多，每出一种新的能解释说明知青现状的新观点，不要一天可以马上传到每一个知青。因此你去走访知青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关于知青运动的论点几乎完全一样。在知青中理论变为蓬蓬勃勃的运动，这种飞跃更是屡见不鲜。如桂林知青九月份还在农场安于现状，几张长沙知青的报纸到了那里，讲出了他们切身体会到又没有理解到的东西，他们立刻造反了，掀起了批判安置路线的运动。桂林知青告诉我，长沙知青的报纸在那里传来传去，大家抢着看，磨成了碎片还传着看。这些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动人情景，是那些住高楼吃白米过着舒适闲散生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也不可理解的。伟大的知青运动一定会放出灿烂的理论之花，思想之花。

知识分子中的极“左”派向何处去？是走颓废的道路，还是走象牙塔尖上的“革命”的道路（这是最终也会动摇以至叛卖革命），这是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到社会最底层去，到工农中去，到知识青年中去，而目前知青运动最突出地暴露了工农进行社会革命的要求。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知青运动相结合是当务之急。丢掉你的臭架子，抛弃一切剥削阶级成见，跑到知青中去，握着他们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仇恨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和他们一起研究社会矛盾，真正在调查中掌握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革命的力量，才能使改革社会，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否则知识分子高谈的“革命”。“造反”将是在一种多么空虚的沙滩上啊！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逍遥得太空虚了，想搞点复课闹改良，复课闹复辟。他们应当明白，作为旧教育制度的宠儿的他们，是不可能懂得吃人的旧教育制度的全部罪恶的，是不可能懂得被旧教育制度吃掉的那些人的心情的，知青提出了一个论点，旧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特权阶层分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辩证法，同时造就了一批奴仆和剥削对象。他们有的被赶入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也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难道不是对旧教育制度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吗？我们的教育革命必须与工农和知青运动结合起来，才不至于走上改良主义甚

至复辟的道路。复课不是把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学生扯在一起，搞一个和和气气的大杂烩，而是要把那些愿意革命的人召唤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糟得很和好的很

知识青年回城市造反，搅动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造反派右翼，无一不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舆论的压迫，他们闭眼一思想知青造户口反的“流氓”相，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知青运动的锋芒所向，乃是这次文化革命所必须摧毁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乃是十几年刘少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拼命扩大的三大差别，乃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乃是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知青运动把引起文化革命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露骨地暴露出来了。许多长期在文化革命实践中积的问题，可以通过分析知青运动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找到答案，人民对文化革命的理解将大大飞跃一步。这标志着革命人民掌握毛泽东主义的一个飞跃，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农民运动的暴风骤雨，一切真正献身于文化革命决心搞到底的人，对这样一个群众运动怎能不放声歌颂，虚心学习，和他们相结合，并肩战斗呢？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新生产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打击革命人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资产阶级老爷企图保存资产阶级的旧秩序，阻碍革命暴发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一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到知青中去走了一遍的，你必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千千万万的农奴摆脱了任人宰割，惟命是从的精神状况，他们向压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吸血鬼，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知识青年的举动好得很！好的很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的同志须知，文化革命需要一个较彻底的社会革命，需要推垮特权阶层，官僚机构的统治，一切改朝换代，改良主义，结构改良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拥护革命的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

所谓经济主义问题

革命都是有经济上的原因的，恩格斯说经济斗争到处发展为政治斗争。群众在推翻旧制度的初期提出经济要求决不是经济主义，而为了维护旧制度，用金钱来收买知青，妄图使他们停止斗争，这就是经济主义。目前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刘氏上山下乡运动，大讲什么“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大搞经济收买，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主义。而广大知识青年呢？他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他们所进行的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斗争。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任何人都苦！但他们的革命斗争的热情比任何人都大，这是经济主义吗？

知识青年中也确实有败类，有些人对砸烂加剧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安置路线不感兴趣，急于自己爬入上层社会，脱离知青阶层，他们这些人是想当新生的资产阶级份

子，他们将成为知青的贵族。他们决不代表知青阶层的利益，决不代表知青运动的方向。相反知青的利益决定他们决不能妥协，决不能搞经济主义，经济主义将断送他们。

那些动用大批工厂资金的工贼，那些整天逍遥的知识分子，你们花费成十万数的国家资金却在那里贩卖机会主义，妄图使革命就此止步，你们在知青推动历史的革命运动面前指手划脚地咒骂经济主义不感到可耻吗？

彻底打倒反动的血统论——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

血统论为什么被文化革命的仇敌利用成为反动的理论，是当今许多用漂亮的批判血统论的言词继续贩卖血统论的说客文人所不愿回答和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干部子女在文化革命中暴露出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反动性比其他非劳动人民子女要厉害得多呢？什么是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是不是被某些人所认为的分析阶级出身就是真正正确的阶级分析法呢？不，阶级分析必须看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文化革命的政治态度。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十几年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在中国的统治。对这场革命反抗最力的是新资产阶级其子女。而知青身受特权阶层扩大三大差别的迫害，他们处在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中，他们最了解社会，他们是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不错，他们有不少人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这就造成了他们革命时身上背了很多包袱。但这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不该被人遗忘吧！以前学校里所谓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培养新资产阶级，使干部子女青云直上，这就是它的本质和总宗旨。所以以前学校并没有真正向工农开门，而是向高干子女开门，有的地方的团支部甚至干部子女夺工农子女的权，反动血统论是压在知青头上的一座山，必须推翻。知识青年决不是什么“狗崽子”，而是革命先锋。

所谓宣扬社会黑暗面

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腐败而担忧才发动了文化革命，看到我国社会的矛盾才能革命，才具有起码的当造反派的资格。保守派保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社会矛盾，或不愿看到这些矛盾尖锐化必将导致革命暴发。而知青最懂这些社会矛盾，最明白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这恰恰是他们的优点。恩格斯讲到巴黎公社的意义时说：“1864在全欧洲，即在群众中间，运动的理论性质还很模糊，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为工人党存在……连美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按照规章所陈述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大成就应该是破坏各派的幼稚……，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个成就。”前一段当文化革命的理论性质还不很明确时，我们和各种机会主义者也有一种幼稚的合作，而知青运动的大成就就是很不明显也是第一个打破了这种幼稚的合作，把各种假革命，反革命的面目暴露无遗，知青运动使文化革命看到了新的希望。

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毛主席说：“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的认识而定下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时节。历史以从来未曾有过的

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造反到底，我们黄金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拼命向前啊！

（注）补充一点——知青的利益与贫下中农是一致的，农村中走资派的压迫剥削的花样（如在工分上玩的花招）都是对富裕农民有利而不利于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知青对国内存在的变相剥削异常愤慨，他们的这种情绪也反映了贫下中农在农村中进行文化革命的要求。

知青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了社会的对立面。”这句话反映了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我们的纲领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1967. 12. 00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以苏修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及其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面对着现实的严重挑战，面对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动派的严重挑战。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胆略接受了这场挑战，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发动了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列宁在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毛主席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

在新的历史阶段，衡量革命者的标准不仅仅是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当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极少数是自觉的，多数是不自觉的。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中多数觉悟了，是会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觉悟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这是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然地会有反复。极少数自觉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是要推翻的特权阶层。

对于我们的国家机关，摘列宁的一段话是十分适用的：“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认真的改变的旧的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而作为国家机关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监狱、法院、警察，则除了军队在六〇年后由林副统帅主持，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外，长期被罗瑞卿盘踞的公检法已经完全烂掉了。

特权阶级的出现标志着部分的生产关系已经变质，虽然经济基础总的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障碍作用，于是在中国已经进行的对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改造是不彻底的。对上层建筑的触动更少。因此，这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开始。

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只是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群众的发动，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用他们仍然把持着的权力，愚弄群众，干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传播；由于反动的社会习惯势力的影

响，很大一部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还很不理解，对特权阶层的反抗往往还停留在改变自己受压抑的地位上。

尽管在去年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但是批判局限于对个别人的罪恶的揭发，而很少接触到反动路线产生的阶级根源和为反动路线服务的官僚机构。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尽管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但是一般的只认为这是武斗，而没有看到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因此，一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广大群众对文化革命有了感性的认识。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四、林副统帅对湖南所作的十·二四指示，江青同志对文艺界作的十一·十二指示展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

文艺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十二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彻底的胜利。

林副统帅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

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

五、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

六、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出了它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机会主义思潮瓦解革命队伍的斗志，使反击成为分散的甚至不可能。

必须摆脱受机会主义思潮腐蚀的头头的束缚，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必须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不肃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会肃清革命。

七、在转折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要把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运动提高到高级的阶段，要实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也就是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的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学习，理解、运用、掌握毛泽东思想，终将揭穿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愚弄群众而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歪曲，终将抛开习惯势力的束缚，把革命进行到底。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开展给我们展示了这光辉的前景。

原作日期应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 原转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北斗星学会宣言

（概要）

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

1967. 12. 10

我们试看矿岩的分布，铁矿、煤矿和云母各自云集在一起，这是千百年自然界运动的结果，是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的队伍，也时时有人退隐，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更有人结集在一起，奋勇地前进，这是一年多来运动的结果，是大革命的威力，这种威力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学者们写史，十有八九无血无肉，不是历史创造者的呼声，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名家，是黄鹤楼的秀才，不象长江水里的弄潮儿，懂得波涛是如何汹涌，浪潮是怎样澎湃，回流是何等险恶。一个普通的工人，巴黎公社社员笔下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就远远胜过了好多历史学家关于公社的论述，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总结它，如何承受它，难道还需要等着那些黄鹤楼上看帆船的大人先生去进行，而不是由我们这些多少在运动的泥巴里滚了半天的毛小子和工人同志一道来完成吗？

要当官的就让它争席位去罢，要保命的就让他搞什么鸡血疗养法罢，自有一大批自强不息的革命小人物永远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们从来都把这场空前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更为空前伟大的世界革命风暴的引子和序幕，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历史证明了，未来不是属于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大喊大叫一时的风云人物，历史还将证明下去。只有那些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方是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

至于北斗，乃宇宙间七颗排列似的星星，在奴隶的歌中的象征，只有全人类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诞生在世上，人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北斗才被赋予最新最美的时代内容。我们的学会取名于此，就是要求永远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把紧航向，北斗北斗，未来的几十年的中国，世界将是谁主沉浮！

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倘离开了五亿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在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将严格区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最彻底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洗中国农村几千年堆起来的垃圾脏物，在我国农村大树特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伟大的农民运动，已经有狂风在为他开道了，

决派将在这暴风骤雨中受到农民运动的洗礼。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将使得决派获得空前巨大的力量。巴黎公社社员喊得多么好啊：“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炉火，你燃烧吧，铁锤，举起来吧，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高唱起国际歌，决然地抛掉派性、私心的束缚，到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集合，向旧世界发动狂飙般的进攻。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1967. 12. 21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这是一个将永远载入湖南文化革命斗争史册的光辉日子，就在这一天，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旗手毛主席来到长沙，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号召我们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

在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的号召下，在这光辉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作为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集合体，她出世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围剿。

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在这场反动势力的空前围剿中显示出了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场围剿中发展壮大了。

今天，是我们向全省三千八百万人民公布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战斗纲领的时候了。

1. 大好形势与逆流

毛主席在巡视华北、中南、华东等地途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精辟地概括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形势大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从不动摇的信念。

但是，我们所说的形势大好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而决不是资产阶级老爷和他们的走狗所鼓吹的取消阶级斗争的“形势大好”。

我们不仅从正面，从革命群众的充分发动来分析形势大好，而且我们还从反面，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垂死挣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湖南）来理解形势的大好。

当前，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自上而下的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使我们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必然覆灭更充满了信心。逆流的出现，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回光返照，“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

一边高唱凯歌，一边迎接反扑。在二月逆流中我们是这样，在今天，还是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决不能因为形势大好而放松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拼死反扑的警惕性。

“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在大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2. 新的进军号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肯定了湖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的初步胜利。应该看到这个初步的胜利还是只是打乱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阵脚，湖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没有被摧毁，《决定》的发表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结束。而只是预示着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夺权斗争的开始。

林副统帅十月二十四日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指示是这场新的夺权斗争的进军号。

林副统帅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南的烂摊子大，三条黑线又粗又长，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副统帅的指示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个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必须大乱，乱敌人，乱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湖南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林副统帅10月24日的指示，划分了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不同的时期，贯穿其中的是一条不断革命的红线。

3.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盾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推动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林副统帅10.24指示中指出的反革命三结合，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湖南旧省委没有被广大群众冲垮之前，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通过旧省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旧省委被冲垮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又利用省革筹的招牌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复辟资本主义。尽管省革筹这种三结合的形式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但是，内容才是事物的本质。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一九六六年《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

彻底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林副统帅给我们提出的战斗任务，新的夺权斗争就是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炮制的长沙、株洲、邵阳等地的市革筹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的重要的据点，这些市革筹必须连同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起彻底摧毁。

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维护上台黑线人过关，他们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把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斗争引向揪革命组织“坏头头”的错误方向上去，对于他们的诡计必须坚决戳穿，必须立即引导革命群众投入摧毁反革命三结合的革命风暴中，彻底埋葬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4. 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

由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策动的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反极“左”运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的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所谓反极“左”的实质就是反革命，反极“左”运动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在革命阵营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极“左”思潮，所谓批判极“左”思潮就是批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是阉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灵魂。

所谓反极“左”运动，这是省革筹中黑线人物为了保护自己过关，维护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镇压。

所谓反极“左”运动从对革命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过火的行为的无限上纲，横加指责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历史的歪曲和否定。

“反极左运动”控制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必须迅速批判这股“反极左”的反革命逆流。

5. 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联合必须服从于革命原则。

放弃原则的“联合”，是迎合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胃口的杂烩，它必将断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拿原则去作交易，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线人物为了掩护自己过关，为了使他们已经窃取到手的政权具有更加完善、更加合法的形式，他们收买了胡勇、叶东初这样一批工贼，利用大联合作幌子，取消革命原则，软硬兼施，用反革命的凑合代替革命的联合，吞并、瓦解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工代筹”的产生只不过是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计划中的一个部署。

对于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背叛革命充当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狗的工贼，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坚决揭露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也只能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其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联合，他必定在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

在反革命凑合“工代筹”的破旗前高高地树起《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力量必将粉碎省革筹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计划。

6. 坚持文攻武卫的正确方针

在湖南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之后又出现了反革命武斗组织工联八·一九主义兵，八·一九主义兵的出世正象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的出世一样，标志着工联少数决策人及其后台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的失败。

挑起武斗，是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黑线人物穷途没落的一手。对付反革命武斗组织，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他们的任何挑衅。

7. 肃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省革筹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交替使用镇压和收买的两种策略，并且在收买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功。机会主义思潮已在革命队伍中蔓延，成了一种危险的病症，以湘江风雷总部一小撮叛徒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投降只是更加大规模的叛卖革命的序幕，革命阵营的分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准备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无情的斗争，在反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想……不进行这种斗争，不预先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开展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毁灭性的进攻，为了获得对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必须看清受机会主义思潮严重腐蚀的头头，〔越〕过他们去进行革命。

8.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胜利发展。

这场斗争仅仅是开始，更伟大的革命决战还在前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关键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出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正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形式来挽救他们的灭亡。斗争的形式在变更，但斗争的阶级内容丝毫也没有改变。

任何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只有乘胜追击，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紧跟最高统帅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原转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概要)

鲁礼安

1967. 12. 30

过去时期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都是对农民运动的一个发动。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是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正以无限的生命力磅礴于全中国。不仅在浠水，而且在麻城、广济、当阳，更远一点，湖南、江西、福建、延边、广西等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据我们所知农民运动都在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日报》社论说：群众运动的动向，决定事物的本质，各地农民运动的兴起，决定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狂风暴雨不可避免地到来。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后走向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我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的这一般规律，毕竟全部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巴河一司进城占驻红旗大楼，封了《湖北日报》，因为革联会《湖北日报》九·六社论压巴河一司，革联进攻巴河死亡六人，抬尸游行]

是仍然依照第三个五年计划那样按“调整政策”在慢慢推动农业的发展，还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一个五八年似的大的革命热潮向二级甚至一级所有制进军。贫下中农迫切地希望着后者……在巴河五州地区，伎匠集中，办合作社，搞综合厂，是群众早有的愿望。历来因为公社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阻挠而不能成功。五州总部成立后，立即拨款八百多元，加上匠人自动筹款共一千多元，建成了一栋房子，匠人集中管理，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

巴河组织了“文攻武卫团”。巴河一司五州总部的一张布告说：“当此决战紧张阶段，凡是在巴河五州境内从事阴谋破坏，肆意捣乱，勾引煽动，武斗暗杀等破坏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行为，经当地人民告发，就地查处，一经证实，严惩不贷。”

随着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步的深入，“文攻武卫”应该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提出来。历史将证明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离开了“文攻武卫”农村运动决无彻底胜利的可能。

“新农村”拆除了原有的房屋，集中地盖起了平房便于管理，便于生产，而且首先照顾了最困难的贫下中农，深受贫下中农欢迎。那么富农呢？我见到这一个富农，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原先的房子又大又宽，如今搬到这里，好，好个屁。”公社的一个干部的家属则向我们诉苦，“我们去年才建的新砖瓦房子，就保不住了，他们折合再多钱我也不走”，我们看了这家既得利益者的瓦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如今坛坛罐罐就要打破了，他们怎么会不痛心呢？当地的贫下中农则高兴地对我们说：“社会主义道路人人都要走的，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

“先走了一步”。五州总部成立之后搞起耕牛集中，牲畜集中，匠人集中等强化集体经济的工作便是一个明证。牲畜集中时，社员利用农闲时间，捡石头，买少量水泥，大修猪栏。贫下中农交猪生产队集中喂养，立即付钱，而对地富则分批付给。少数比较宽裕的

落后群众和干部害怕家庭负担受影响而反对。后来的保守组织“雄鹰”总部和五州总部的分裂，最后就是在三集中这个问题上开始的。

“新农村”，小队并大队实行三集中，农民们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贫下中农拥护，中农跟着跑，富裕农民反对，干部都跑光了”。何等分明的阶级阵线。

[武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巴河一司。12月24日又围攻进驻红旗大楼的巴河一司。]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67年12月30日

1968 年

中国向何处去？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 01. 06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稿，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

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

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

“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〇”，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

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多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玷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并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大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1.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2.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3.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

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

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转载于《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

1968. 01. 25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消灭两大派的对立，它只不过是新的两大派别压完全不同于过去钢新斗争的崭新的矛盾，用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取（革命群众组织）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

但是，与其说是这种革命委员会，不如说取而代之的是以革命委员会中某些人为代表的强势力，与另一支崛起的新军的斗争。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么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于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决派”则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得到锻炼，上升为统治集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炮轰派”，还是贵州的“四一一”，他们对临时权力机构的斗争，不管是否意识到了，都是在为完成“决派”的历史使命在进行英勇的尝试。

我们分析工人中造反最早的也多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多半掌了权。在他们面前也有一个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取得工人阶级的代表的资格的过程。否则一定会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那些曾经一时受过蒙蔽的工农群众，一经改正，可以很快地成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宣扬“左派转化论”，我们承认这条罪状。

以“赤总工二司”、“民办工人”等为代表的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英勇斗争，很大程度是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出发，为维护并且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奋斗，这一大阶层被空前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进了运动。他们最希望革命越彻底越好，因此留恋他们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这中间有相当一批人会参加决派的队伍。

1968年1月25日

一切为了九大

上海中串会《红卫战报》编辑部

1968. 02. 00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在这急剧转变的峻峭关头，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

这将是一付多么振奋人心的壮丽图景。这将是世界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东方巨人——红色中国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伟大导师毛主席是驾驭整个历史进程的最高统帅。

历史的车轮推进了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较量，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它必然带来世界上阶级矛盾的集中暴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在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现实，已经开始吹响了这场世界决战的进军号，揭开了这场大决战极其激动人心的序幕。

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决战前夕意味深长的激励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惊人的豪迈气魄，空前的鼓舞人心。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世界革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组成部分，这是整顿和巩固世界革命根据地以利于在整个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果断英明的战略措施。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着雷霆万钧之势呼啸前进的中国英雄铁军，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大，将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再一次的交锋，仍是极为激烈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敌人不甘心死亡，正在焦急的拼凑残余力量，妄图在九大上反攻倒算。

九大，也将直接影响着世界决战的成败。关键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条被毛主席所阐明的历史定律，在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今天，在九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可以澄清许多游离政权斗争的糊涂观念，丢掉不少敌情观点淡漠的和平幻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再现，在整个斗争中，尤其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在九大召开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革命的阶级队伍，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向着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进行猛烈的进攻，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政权，在党内用组织形式巩固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错误的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尽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同志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这条规律，在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显著特征就表现为：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斗争矛头主要地指向革命的一般对象，甚至自己的战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掩护走资派的作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在争夺党权的关键时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再也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连串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变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对阶级关系变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对于如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当很好地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队伍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夺好党权、迎接九大作好舆论准备。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在以上几段论述中，毛主席结合1957年以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抨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关系问题上散布的腐朽神话的强大理论武器。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举动，就是阶级关系突变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白炽化的暴发点。社会大变动，社会大革命，是由于长期阶级斗争而引起它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来得深刻。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已经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成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某一阶级的胜利或消灭。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对谁实行专政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着和最集中的代表着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阶级关系不断的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剧烈的分化，这些就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讲的：“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怎样发生的阶级变动。”锋利的词句直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窝，剖开来看，全是谎言的污水，哪有一点血！

诚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用意是回避了一些部门一些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掩盖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七年来猖狂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倒要问它们，解放前几千年来的阶级阵线是否是基本稳定呢？他们没有说，大概还没有这么蠢，回答起来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解放前一直是剥削阶级掌权，工农兵一直是受压迫的，掌权阶级没有变，被压迫者也没有变，阶级阵线怎么会变起来呢？请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介石由某一段时间的统战对象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阶级阵线大变动的重要标志。同样，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教育界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上。

“研究走资派主要的是依靠谁在教育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再决定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教育界走资派本身尚不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的眼里，已经不适用了，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然后再“决定”。人们万分惊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四个里程碑。

研究结果如何呢？敬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含蓄的透露了：教育战线上，“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这里，这位革命派先生装起糊涂来了，把毛主席尖锐抨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弦外之音自然是：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兜了半天圈子，还是老一套。剥去保护色，就可以看到刻在他们身上烙印的显著特征：转移斗争大方向，掩护走资派。稍有一点教育革命常识的正常人们，就会清楚回答：毛主席这里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主要是指那些早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最典型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指他们十七年来的反革命统治。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离开了阶级大变动的新特点，离开了政权问题上斗争的新动向，来咬文嚼字，来玩弄概念，是最低劣不过的手法了。某些天真的同志，会觉得很奇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专门喜欢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疾恶如仇，

阶级感情不是很深厚吗？岂但是深厚，还极真挚呢！我们实在惊叹“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话的确凿性，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几分抵触情绪，就会表现几分，自己的言行就是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一分一毫也不差。漂亮的言词，慷慨的姿态，也无法掩饰自己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真实举动。

政权问题

最初，我们看到前十条里毛主席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觉得很理解。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全面阐明了每次重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在革命中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和实质。这条规律，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反右斗争，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文化大革命，天地间发生了无穷的变化，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阶级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了。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里，走资派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心怀叵测地混淆黑白，搅乱甚至颠倒了阶级关系。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毛主席也发现和组织了一批左派队伍，这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文化革命中涌现的新生骨干力量。出于对教育界基本状况估计的不同，也就得出依靠不同对象的结论。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依靠对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了是一场悲剧，是历史利用了造反派，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造反派都是群痞子，“只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划了几桨而已”。“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真正掌权的还得靠十七年来的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老左派”。他们在这套所谓的“理论”的武装下，就向我们毫不客气的伸手了。其实，他们还是比较蹩脚的，他们这套理论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他们的鼻祖刘少奇、安子文早在1947年绥远土改时就发明了这套理论，什么“土改一开始积极斗争土豪劣绅的都是地主二流子，以后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贫雇农”。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就是一根琴弦上弹出来的调。可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生们，难道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多大的精力去批判刘少奇的陈词滥调吗？

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关键在于政权，在于教育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不是这样的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种种现象，就一点也触动不了教育界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的问题，教育革命只不过是酣梦中的空想而已。

林副统帅在总结复辟和反复辟经验时指出：“这种复辟的危险是综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

他们的种种言行，都是反对我们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走资派，转移视线，不把精力集中在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问题上，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

这种表面上回避政权问题，回避夺走资派的权这一要害问题的手法，这种不断把斗争引向脱离政权的邪路的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夺权的。

林副统帅指出：“政权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班子的问题。”

砸烂旧班底，一方面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另一方面要肃清他们的错误思想，时时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令人不觉察的方式进行反夺权。要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加以彻底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教育界的走资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发现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很得心应手了，加上名声又不好，他们本人的政历问题又太复杂。于是，就在青年干部中物色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走资派里比较狡猾的角色下的种子，必须认真对付。那批修正主义苗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派的极重要的工具。在夺权过程中，对于他们应当严加防备。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改好了的也可以依靠，仍在时时窥探方向，对造反派耿耿于怀者，就有可能成为窃取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继续为其主子效劳。正象张春桥同志指出的那样：

“他们对造反派有看法，反对造反派。……看你们在这里开会就不舒服，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人，他看着就不顺眼，……如不注意教育，这些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住，到那时就有事了。两个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砸烂旧班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过程。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从领导班子着手，从巩固政权着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观。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为着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班子。

革命，从根本意义来讲，就是先进的思想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实现。当然，要战胜旧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里，得首先并且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推出了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这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将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大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必须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不疲倦的斗争。

整顿思想 打倒派性

在当前，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并且是提高这支队伍战斗力的重大措施。为了召开九大，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准备。政治上我们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了，并在更深度地进行大批判；组织上，我们清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造反派队伍及教育界队伍；思想上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

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铁军。有了可靠队伍才能夺取最后胜利。能不能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就是能不能树起队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这是夺好党权，迎接九大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元旦社论尖锐地指出：“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已成为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如果再不自觉克服派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来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终于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文化大革命发展至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经济上反革命经济主义进攻这软硬两手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原先的“妙用”，他们采取了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新策略。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成了当前他们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是不奇怪的，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利己主义，历千年之久，根深蒂固，在小资产者阶层里是颇有市场。解放十八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在不断更新，但是余毒仍然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缘故，更应该注意的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十几年来，他们把持着文化、宣传机器，不但不去触动剥削阶级四旧的一根毫毛，还大肆宣扬帝封资修的臭货，更恶毒的是象疯狗一样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了篡党篡政造舆论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篡夺了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所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余毒是更深。

马克思说过：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原因与结果是互相替换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路线、政策的分歧，并最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最高形式。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资派，又反过来扶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理论和著作上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及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妄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蒙蔽、毒害更多的劳动人民，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扩大反革命阵线，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林彪副统帅说：“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先进思想影响与反动思想影响之间的本质差别。

反动的旧思想的阻碍作用，有时并不被人们所十分重视。当反动思潮控制、蒙蔽着一部分的人们，起着恶劣的阻碍社会发展作用的时候，那部分人们往往是毫不觉察的。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总是走曲折的道路。正是这样，每一曲折，就是先进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合。

林彪同志说过：“在一个短时期，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子。

去年八、九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又是一个例子。

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影响了我们队伍中那么多人，已成为阶级敌人利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是更可说明的了。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来注意反动思潮的阻碍作用，并用先进思想与之斗争。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集中地，阶级敌人是非常敏感，非常狡猾的，非常善于利用形势的变化来进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活动的。目前，围剿派性已形成了高潮。在高潮中，某些表面上隐下去的矛盾大有发展的趋势。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在派性泛滥时，保守势力，反动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这是一条规律。因为派性斗争是大量的，主要的，就以此来完全否认路线斗争，包庇反动势力、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历史将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还会重演一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吸取教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犯错误，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才清醒过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些人自己认清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有一个好法子，就是深入阶级斗争实际，注意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奴隶主义，不要右倾保守，要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才能为造反派掌好权。否则，总有一天要淘汰的。

结束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以惊人的气魄，挥动着巨掌，指出了浩浩荡荡的亿万工农群众的红色铁流唯一正确的方向，辽阔的战场上，战尘迷漫鏖战急，鼓角悲壮，马蹄声咽。新的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空前规模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在迅速发展，革命在飞跃前进。我们正处在伟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科学预言，在今天，在两条路线深刻反映到人们灵魂深处的重大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即将来临前夕，显示出神奇的作用。时间是多么宝贵呵！现在我们顽强地奋斗，坚持不懈的努力，待到二三十年之后，待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世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显得极为要紧，极为关键！

有志气有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

原载上海《红卫战报》（中串会影印版）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杨曦光

1968. 02. 01

按：

这几封反动信件，是从（夺军权）成员孙小兵身上获得的，沈坚即杨曦光的化名，现印发供批判用。

四十七军支左办公室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运用批判十七年的刘邓路线的办法，向人民说明刘邓不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十七年的各个方面（建党。军队。工厂制度。社会制度等），各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资本主义的东西，然后较自然地把新思潮灌输到群众中去。

给战友们的一封信

这几天的每一分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响。

让我们交流一下思想吧！

反革命的大镇压给人的教育太深了，群众在这种时候革命觉悟提高的高度和迅速达到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平时迫切希望但又达不到的程度。革命人民对这场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或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在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后，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认清了革命的对象。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于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后，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于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

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分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分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敌人实行镇压的原因是因为新思潮的传播会要了他们的命。敌人镇压的高级水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主义的强有力。

这封信写到这里因我写了目前时局的声明，把我想要说的内容的大意都讲了，因此就不想写下去了，已写的一段还是请你们注意，因此通过一·二四，革命人民反对中央政权的情况在革命中起的作用，进行分析，以便估计在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政权要实行怎样的变动，这确实比分析省革委会的临时性要重要得多。

除开声明所要说的各要点外，请同志们看一看“改造我们的学习”那里面把新思潮的缺点讲得很好，新思潮的缺点是：夸夸其谈，抓住只言半语，满足于一知半解等等，应该努力克服这些缺点，象毛主席主张的那样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毛主席、马、恩、列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应把他们当作一个生动活泼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去研究，决不能看一个片段，如列宁所说，要知道国家的作用性质等等，就要分析国家是怎样起源的，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等等，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就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叫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认为中国社会从来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等等……不多写了。

此致

毛泽东主义的敬礼

沈坚（杨曦光）

二月一日

小孙：

你好！向你致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很想与你保持通信联系，你是否能把最近的感想写信告诉我。工厂里的情况以及极左派工人的思想都请谈一谈。

你们很注意理论学习我是很赞同的，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和颠覆，就是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产阶级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学说，没有具体分析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的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剩余价值怎样产生，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有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分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帮助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努力。

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根本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哈尔滨炮轰派，贵州411的

结局就是证明，革命的理论成为当前斗争的关键，因此一·二四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集中点。

希望你能在分析工厂的生产关系，经济情况方面给我寄材料和写些你的看法。

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斗争给予敌人致命的威胁的时候，一定要挺住！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

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

还请你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意见写给我。

不多写了。

沈坚

（以后就这么固定称呼）

一月三十日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
乃是世界的真理！
（来信请托送信人带给我）

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长沙一中“夺军权”钢812分队 杨曦光 刘小兵

1968. 02. 05

一、“一·二四”的伟大意义

任何一种新思潮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并不靠我们自己标榜，而靠敌人内心异常恐惧而进行大规模围剿。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是从来未有过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发进入自觉地投入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间，在当前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那革命永远不能成功。在这一关键时刻，引起全中国全世界注目的“一·二四”事件发生了，它标帜着革命人民是否能掌握毛泽东主义，由自发转入自觉，这成为中国当前整个革命是进一步深入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也成为国际共运发展的关键。这个转折，它将被光荣地下记载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虽然新思潮很早就产生了，但是象一·二四那样大场面，宣称一个群众组织有其纲领，并且给予一顿毫不讲理的怒骂，这是史无前例的。这证明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一·二四就是从反面说明毛泽东主义一旦掌握了群众将多么强大，简直是天下无敌。

“省无联”的革命战士们，全国革命人民，全世界毛泽东主义者注视着我们的斗争，我们决不要辜负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啊！

二、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阵地

目前，必须坚决地抛弃关门组织“理论研究小组”的思想，谁要是想关门进行理论研究，然后幻想有了完备的一套后，再去传播新思想，顺利地掌握群众，那他不是一个十足的蠢才那就是存心骗人。

斗争逼得新思潮不可能十分完备和彻底，然后再去指导革命，而在反革命围剿和实现指导革命斗争中新思潮必然自将迅速成熟。

三、炮打司令部

在对待新思潮的态度这个要害问题上，中央内一直隐蔽得很好，因此欺骗了湖南革命人民信任的反革命两面派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一·二四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上教育了革命人民。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省无联广大群众也心底感觉到，仇恨新思潮的是镇压省无联的人，敌人使他们认识到新思潮是省无联广大群众的朋友和同志，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其说敌人万分害怕新思潮，不如说敌人万分害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革命纲领掌握群众。

革命人民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或论教中来的。

四、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

如上所说，省无联的命运不能和新思潮合在一起了。

在当前的转折关头，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就不能引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黑龙江炮轰派和贵州四一一的失败就是证明，谁要是妄想举起他们的右手打倒章、梁，举起他们的左手打倒省无联“坏头头”。他无异如在抗日战争时，又要抗日，又要反对共产主义。正如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朋友一样，新思潮是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朋友为有毛泽东主义，任何小资产阶级左翼都不可能指导任何革命到胜利。一个又一个省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斗争都失败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而湖南的斗争在这方面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因此这一步是否能巩固和发展已成为全局的关键，湖南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能犹豫，要不惜牺牲坚持和巩固新思潮阵地。

而在目前要使新思潮由知识分子的空想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学说成为关键的关键。

新思潮有极大的缺陷，但命运逼得它不得不过早地投入战斗，革命人民要努力填补缺陷，纠正错误，但是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任何“退却”而言的。

因此省无联的大旗能否打下去成为举世触目的问题。

在这种时刻，任何逃跑和沉默都是可耻的行径。

省无联的坚强战士们为革命的全局和根本利益，不惜用热血和生命保卫省无联，而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这个文化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真正革命组织中没有你们的立足余地，趁早从省无联中滚蛋吧！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二四告诉我们，革命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处在一个启蒙阶段。革命是长期的，对于革命的长期性，我们应该反覆重述使革命人民有所准备，可以断定这场革命起码要三十年以上。

但这场史无前例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积累了苏联等国几十年的教训，并且自己是在几十年的残酷战争中打出来的。革命胜利最大保证是——中国有了个毛泽东，请记住中国有个毛泽东！

任何悲观的论调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一次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中国首先胜利。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根着毛泽东如同民主革命一样走过曲曲折折的漫长的道路夺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

目前处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焦点的湖南人民准备为夺取这场革命的最后胜利献出自己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

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毛泽东主义万岁！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

1968. 04. 18

时候到了！法庭开了！现在是把大叛徒、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的时候了。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不除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我们要提醒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时刻听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让张春桥引上邪路上去。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从一月革命以来，反对上海市革会的逆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赤卫队、红卫军异党臭联司，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反革命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复旦的变色龙，胡守钧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还有人会跳出来否定反逆流大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臭类，胆敢妄动，坚决镇压。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揪出张春桥，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普照全球，举起你的双手吧，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上海将更加威武雄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 (摘要)

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

1968. 05. 16

我们把那些在文革初期，以中派的面目出现，而终于在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时沦为右派的先生们，称为考茨基派……如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余秋里。

他们无视从中央到地方所存在的右倾分裂的严重实质，而荒唐地提出什么观点不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他们还将右倾投降主义笼统地解释为“只保不批”，而首先给人一个对走资派立足于保的概念，他们当中有一员大将，4月4日跳出来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力，也是右倾保守主义”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上海有家“权威报纸”则在这场反派性的比赛中成为了伟哉一世的英雄。……根本否认各个派别，各种派性，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结集，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极力鼓吹派性均是超越阶级性，无原则性的。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毛主席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可是上海有家报纸却公然删去了“在革命的原则下”这个极其根本的前提，而代之以“无条件”三字……什么无条件联合，就是向资产阶级保皇派投降，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条件倒旗散伙。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最近这么一个要为刘邓翻案，要为二月逆流申辩的不大不小的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不是给“革和保不存在了”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了吗？

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考茨基]的几种奇谈怪论：

“批右可以，批极左也可以。”

“批右时，如果‘左’的又跑出来了，‘左’的也一齐除。”

“批右时，不要忘记了反左。”

“批右要大胆谨慎，要对症，要系统批判，允许核实，领导批判。”

有人说（张春桥）为了避免在某地引起误会，《北京日报》一篇“打倒右倾保守主义”的社论万万不能在当地报纸上转载，有人转载了，便是典型的“右倾分裂主义”……原来社论中指出了“有些人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跳出来为二月反革命逆流翻案。”而此地正是批判极“左”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仅仅在一所大学里就抓出了具有极“左”思潮的“右派学生”两千余名。

我们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继续引申：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路上的障碍。……”这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战争观。

毛主席最近又告诉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争的继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的事实已经，而且正在继续证明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铁的法则。

革命人民是从太惨痛的教训中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

庸夫俗子们不懂得这一点，或者是不愿意懂得这一点。它们只知道喊叫：文斗，文斗，而不知道“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是指我们大权在手时批判和斗争党内走资派时应取的方法，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候就是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战争来对付反革命的战争。

这时候宣扬“放下武器”就是对革命人民犯罪。否定国内战争并不能欺骗资产阶级，只能麻痹无产阶级，使它们遭受突如其来的牺牲。

彭勋5月9日在新华工作了一个内部报告，提出：一曰武汉批极左不力，留下了后遗症，现在应该补补火了。二曰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斗争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的高潮。

王任重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和王任重勾勾搭搭的“左派”例如赵文成先生（新华工）；陈再道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那些在革命低潮时和“陈司令员”拉拉扯扯的“左派”精华；刘少奇我们是要批判的，我们同时也不会忘记批判工人运动内部的维护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家。无论他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也无论他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潮流，冲破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革命收场了的幻想。去年九月至十月的联合高潮，在我们看来，不是革命运动的终点，而是这个运动的起点……运动中的一些政治派别也会急剧而尖锐地分化开来“直至它们跟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而无产阶级会在一系列搏斗中相继博得各个阵地为止。”（马克思语）在这中间保守派们将迅速地倒向机会主义派别或者带有浓厚的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派别里面，来向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战，我们几乎用不着担心它们会愚蠢地独自树旗。

原载《扬子江评论》总第八期

1968年5月16日

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1968. 06. 12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战斗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的党。

要革命么，必须要有革命党。

从共产党宣言至今的一百多年斗争中，有过许多革命党。

随着革命的推移，党也必然要发生变化。第二国际在大战中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了。列宁缔造了新的党——布尔什维克。

苏联出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又使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随着这样一支队伍的形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这样的一批“中派”。经过批判，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可以站过来，另一部人，必定会最后走上向党闹分裂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后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毛主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写到：“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要生存，就反抗。当革命者也拿起武器的时候，战争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谁敢否认67年出现了国内战争的事实呢？谁敢断言一旦中派里的顽固分子与党最后分裂时，他们不会挑起战争呢？

希望和和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期 1968年6月12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1968. 06. 20

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革命造反派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绌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1968年6月20日

1974 年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

1974. 11. 07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

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

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

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

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 product 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公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1974. 11. 07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 (三) 关于林彪体系
-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 (五) 谈反潮流
-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

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 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坊。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

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1968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

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1960年到1971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〇）），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〇）），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

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

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李一哲

1974. 12. 11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不讲道理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年12月11日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请君入瓮

——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李一哲

1974. 12. 16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

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来。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6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一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明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本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是一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小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

支持李一哲的干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盗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层”、“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一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竟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吧。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一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年12月16日

杜岗的把戏

——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李一哲

1974. 12. 31

(一)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一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二)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们，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九一三”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1968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三）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了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出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它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竟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

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们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